

K250.3
1
2:6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六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055573

K250.3
1
2:6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六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055573

目 录

- 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张楚琨(1)
- 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金 丁(25)
- 在最后的日子里……………郁 风(39)
- 访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马 力(41)
- 郁达夫生平事略(上)……………于 听(49)
- 回忆商务印书馆……………陈叔通(81)
-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纪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徐伯昕(91)
-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所认识的黄自……………廖辅叔(105)
- 附录：抗敌歌
-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和高剑父……………黎蒿民 走汉永(133)
- 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曹 禺(157)
- 南开剧话拾遗……………黄宗江(162)
- 往事追忆——上海租界捕房的狱卒对我的“训诫”…黄药眠(165)
- 落花生的品格——许地山先生生平散记……………熊寒江(171)
- 五十年曲艺生活的回忆……………张寿臣(176)
- 相声的起源……………张寿臣(185)
- 我的舞台生活(五)——七年坐科生活(续完)……………袁世海(189)
-

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张 楚 琨

我和郁达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期间，一道工作，一道流亡，瞬息四十年了。他离开我们也三十七年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轰炸新加坡，在马来亚哥打峇鲁登陆。当时，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兼《南洋商报晚报》评论员；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主编《晨星》等三个副刊兼主编新加坡英政府公共联络部（俗称情报部）办的《华侨周刊》。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这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热潮。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的领导下，为负起对广大群众开展精神动员的责任，决定成立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者有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代表，包括南来的知名人士郁达夫、王叔暘、沈兹九、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选出来了，即胡愈之、郁达夫、庄奎章、王叔暘和张楚琨。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暘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着全星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陈嘉庚，下辖劳工服务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到街头去，到工厂去，到码头去，到防空壕去，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战局越来越严重，英军节节败退，热血沸腾的新加坡华侨青年，由刚释放出来的政治犯（绝大多数是马共党员）带头一再要求武装起来，参加新加坡保卫战。英当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没有忘记对待殖民地人民的那些老框框和老套套，压制、压制、再压制。柔佛暹新加坡岛的长堤自动炸断了，丝里打军港的防御设备自动炸毁了，贮油池自动放火焚烧了，总之，准备放弃新加坡了。只有在这时候，才开始发一千枝十九世纪的旧枪给三千名星华抗日义勇军，把他们送到最前线当炮灰。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勇敢的突击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店员、工人、舞女、学

生等。每人拿了四毛钱的“起身费”，斗志昂扬地开往最前线去了。我们青训班有不少学员如罗骚等当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写作人陈如旧从青训班指导员变为流星队指导员，但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传到抗敌总会和战时工作团来。我们在晋江会馆（抗敌动员总会总部）听取前线回来的青训班成员的汇报时，郁达夫大队长急切地问：

“英军究竟发给你们什么样的武装？”

“不知从那里搬出来的旧枪。打打鸟还可以，打日本可不灵！”穿着蓝色制服，头上盘着黄色布，右臂上缠着一块三角的红布的青训班学员（现在是义勇军的政训人员）高声回答。没有钢盔，没有军帽，没有英澳军那样的全副武装，倒像农民游击队员。

“我们强烈抗议：干嘛发这样的武器？义勇军司令官、团长英国人打里上校回答：‘这里没有现代武器，等到新的运到再换吧。’大家知道，丝里打军港把大批新式弹药填海了！”另一个学员差点没骂出声来。

“我们要求和英澳军一律平等的待遇，英总司令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生活水平不一样，平等待遇办不到。’我们志在抗日杀敌，渴望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只好将就了。”一个排长叙述了他们和总司令交涉的经过。

这时，郁达夫细小的眼睛突然发出愤怒的光，额上青筋一条条浮起来，扯着嗓门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重演！”

他从切身经验看透了英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真面目，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使他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插曲表现了郁达夫的另一侧面。

郁达夫在星洲三年多，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日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尤为脍炙人口。新居格氏是日本文艺批评家，由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一封他致郁达夫的公开信，表示“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日除去”。郁达夫站在民族立场答复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心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郁达夫相信，“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行文得体，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此外，郁达夫在扶掖马华文学青年方面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然而郁达夫主编《晨星》开头第一炮却打得并不漂亮。1939年1月21日，即到达新加坡的第四星期，郁达夫在《晨星》发表了题为《几个问题》的杂感文，谈的都是南洋文艺青年所关心的、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鲁迅风问题，南洋文艺的创立问题，新

启蒙运动问题，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郁达夫在原则上肯定了问题的重要性和提法，而立论的轻率和给青年泼冷水的态度，却使大多数读者感到意外。郁达夫对于“学习鲁迅风”这样提：“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又说：“持这一种态度的问题提出者和讨论参加者，我们只有对他表示敬意，即使那问题是一愚问。我们只有惊叹着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谩骂和轻薄。”华侨青年尊敬鲁迅，要求学习鲁迅的杂文体，学习导师那种反托派、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而郁达夫一笔抹煞，指为“愚问”而且“其愚不可及”，“不必这样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读者的失望是很自然的。关于南洋文艺的创立，郁达夫的论点更为大胆：“南洋若能产生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这么一说，马华（马来亚华侨简称）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和文艺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只要等待“产生一位大作家”，南洋文艺就“成立了”。郁达夫也赞成新启蒙运动，但是认为“首先还应大家来选出若干部书，开一个书目出来，教育青年去读。”按那时马华青年读书风气很盛，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抗战文艺作品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再翻印，读者们很担心郁达夫又要搬过来施蛰存的庄子那一套。况且把新启蒙运动和“教育青年去读”等同起来，未免太狭隘了。

反应的强烈可以想见，青年作家和广大读者在我主编的《狮

声》上纷纷发表商榷的文章。我在《编者附言》中写道：“郁达夫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沦》、《迷羊》虽然充满了肉的颓废的气息，却也反映了当时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闷青年的倾向，在文学史上占着相当地位。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冀的原因。不过郁达夫先生开场第一炮，便使我们失望。”（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4日）

郁达夫从抗战正酣的汉口，而福州、而杭州，到香港乘船于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抵星不到一个月，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与马华青年广泛接触，没有摸清文化界的脉搏，只听了槟城个别的人的反映，便贸然发言了。文化界强烈的反响，使他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在《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一文中说：“楚琨先生：承蒙你们不弃，把我当做一个讨论目标；天天座谈之余，写些‘颓废’、‘迴避’、‘默认’、‘历史装饰’的话来表明态度。……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讨论’不是‘抗战’。我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觉得用不着五窍生烟。”（《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7日）

我的答复有这么几句：“《狮声》这次检讨郁先生的大作，完全是为了爱护真理，毫无恶意杂在里头。我们对那些无耻的文化人和托匪之流固然不惜‘迎头痛击’，而对尚不失正义感的郁先生则雅不欲如此，也不应该如此！”（《南洋商报》《狮声》

1939年1月28日)

论争的第二星期，郁达夫在一篇答辩文章中追述在上海时曾对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说过：“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反应更大了。《狮声》的投稿者和《狮声》编者认为无论在革命年代或抗战时期，作家都应该是战士。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作家，可以等待。

论争是这样结束的：《晨星》出了一个专号，文章很不严肃。《编者启事》说：“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三者们来稿极多。……这一种文字愈积愈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晨星》1939年2月7日）

《狮声》编者唱了收场白：“昨天《晨星》出了一个谩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是《狮声》及编者个人，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论问题，就得抓紧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狮声》1939年2月8日）

论争结束的第二个月，3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发表了郁达夫的绝唱《毁家诗纪》。当时王映霞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对他家庭的悲剧深表同情，同时又为他国难当头，自扬家丑感到惋惜。

在新加坡积极备战的1941年，郁达夫又由一位李小姐的推荐，在英政府公共联络部兼了一个职务——《华侨周报》主编。我们再次为之惋惜：为什么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要在英政府当雇员？

由于思想有这许多隔阂，虽同一条街(罗敏申律)工作，我们却极少过从。

不久，战火烧掉了这道墙，郁达夫成为一个战士了，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了。

马来亚战争和所谓“新加坡防御战”是一场丢尽“大英帝国”面子、出尽没落帝国主义洋相的滑稽剧。战争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开始，以投降将军白思华率领十万大军向三万日军“齐解甲”告终。为时两个月零一星期。最后一个星期，即所谓“新加坡防御战”，实际上是自动撤防，不战而降。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充满战争迫近的紧张气氛的星期六，在星期日(8日)午夜后四点钟，我突然被一连串的爆炸声惊醒，是雷鸣还是防空演习？推窗一看，草地上挤满了惊慌的人群，远处一、二建筑物升起浓烟，但是灯火辉煌，有如平日，警报是后来才吼起来的。战争临到马来亚了！几个月来，天天搞防空演习和灯光管制，敌人真的投弹了，既无警报，又无灯光管制，这就是英帝国主义所谓“警惕的眼睛”！

“大英帝国”自夸新加坡是“攻不陷的要塞”。丝里打军港有世界第三的大船坞，有可供大队军舰使用半年以上燃料的贮油库，有足以打穿世界最大主力舰甲板的海防大炮，用在军港的建设金额达五亿叻币(二亿五千万美元)。

英国派遣镇守新加坡的两只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及击退号极尽耀武扬威之能事。屡获战功，名闻全球的威尔斯太子号的船长对我们一群采访记者微笑道：“大家放心，我坚信新加坡

不会失陷！”

当12月3日，日本船队集中越南，大举南移的时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对出勤在非洲的澳军司令孟纳发了一个电报：“此间平静，没有战争即将发生的景象，不必急于回来。”

五天后，日本在马来亚的哥打峇鲁登陆，炸弹落在“平静”的新加坡。12日，两主力舰在马来亚关丹海面同时被日机炸沉，统率两主力舰的远东英海军总司令菲立斯海军中将失踪。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缺乏飞机护航的起码军事常识！

马来亚战争打了五十三天，第五十四天(1942年1月31日)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日军不从正面进攻，而是用从屁股绕过来的迂迴战术得逞了，新加坡成为四面被围的孤岛了。

日军2月1日开始从海峡北岸轰击新加坡，日本航空部队同时进行第五十六次轰炸。

轰炸越频繁，炮弹越多打到市区来，抗敌工作越加紧进行。抗敌动员总会总部的晋江会馆沸腾起来了。救护队员、保卫团员、劳工服务团员、义勇军成员、宣传队员……像长龙翻腾在这座三层楼房，这里和陈嘉庚主席居住的怡和轩仅一楼之隔。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这时也集中到总部来办公，战斗在这座楼的人们对频繁的警报满不在乎，直到炸弹在附近爆炸，才从容不迫地到后院堆着沙包的小圈圈休息一下，仰看头上飞过的敌机。

在最初的日子里，郁达夫团长同我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侨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和爱同学校(青训班所在地)之间，精神抖擞。新加坡被围后，考虑到他的年龄大些(46岁)，身体瘦弱，不能再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处跑了，决定让他坐镇总部，

联系各方面。他按时上班，会议很少缺席，可是1月30日那一天没有来。

“我把孩子送走了，现在我是孑然一身！”第二天，他对我们说，他把十三岁的郁飞交托朋友转道送回国了。

他似乎有些抑郁，不大讲话，脸色苍白，什么心事缠住了他？从王任叔那里得知（他和王任叔很熟，什么话都说），李小姐已随英方官员撤往巴城去了。他在流亡初期作的《乱离杂诗》第七首，便是抒发这时心情的：

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
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
漫学东方耽戏谑，好呼南八是男儿。
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爱情，对郁达夫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有时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不可抗拒的魔力。“萧郎”虽然“鬓渐丝”了，但在生命随时可以在敌机轰炸下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直追忆着“高楼诀别词”。他梦寐以求的是：“乱离鱼雁双藏影”，“鬓影烟波共一庐”，但是现实十分冷酷：他只是英政府公共联络部的临时雇员，《华侨周报》是“临时附属刊物”，不在人事编制之列，不能随英方撤退，李小姐费尽口舌为之交涉，只能徒呼奈何。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如此，对殖民地人民呼之来，使之去，习以为常，他们连抗敌动员总会领导人陈嘉庚主席都极不尊重，对郁达夫哪放在眼里！

请看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如何对待华侨领袖：

丝里打军港的自动炸毁，英妇孺的总撤退以及一系列放弃新加坡的迹象，使得陈嘉庚主席不得不向新加坡英当局问个清楚。

1月30日陈主席约定抗敌动员总务主任叶玉堆、分配船位委员陈振传等往见新加坡总督詹姆斯爵士时问道：新加坡防御如何？紧急时刻能给抗敌工作人员的撤退提供什么方便？重庆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有无提及侨领和抗日工作人员？对此，早下投降决心的詹姆斯的态度极不负责，他一面哄骗，一面支吾其词，甚至不耐烦地说：

“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好了！”舢板是一种木造的用手划的小渡船。在轰炸中，在布雷的海面上，划着舢板撤退，开什么玩笑？

“重庆来电是有的，但没有提及君等。”

陈主席非常愤慨，召集一些身旁的工作人员谈话，说明英当局没有坚守新加坡的决心，新加坡很快就要失陷，各人要有准备。最后用激昂的声调说：“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

陈主席对于英当局发枪枝给毫无训练、仓促成军的华侨青年，让他们去当炮灰，极不满意；2月2日晚上对我说：“大祸临头了，残暴的日寇一定报复！我已打定了主意，你们也走吧。”

陈主席于2月3日凌晨四点多钟和刘玉水（抗敌动员总会总务部副主任）、陈贵贱（木材商）和陈永义，乘陈贵贱运载木材的小火轮，悄悄地离开铁巴杀码头，转移到苏门答腊的英德其里港去了。

胡愈之召集文化界抗敌工作人员举行一次二十分钟的紧急集会，大家决定从围城撤往荷属苏门答腊山芭（丛林），因为最后一班轮船开走了，别无其他出路。时间定为第二天（4日）凌晨，

集合地点在怡和轩或中街后面大舫码头。

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我们大夥儿从怡和轩来到中街后面大舫码头，那里停着一只我和刘武丹接洽好的破旧的摩托舫板，还有一批人焦急地等着。大家都不约而同：一手皮箱，一手小提包，袋里装着没有荷兰领事馆签证的中国护照。队伍当然不大整齐，老的老，少的少，共二十八个。其中有胡愈之、李铁民、邵宗汉、王纪元、唐伯涛、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王任叔夫妇、刘道南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李振殿一家老少，还有郁达夫和我。年纪最大的是李振殿（南侨筹赈总会财政），七十多岁；最小的是谁家的幼儿记不清了，只有几岁。这一天，日军的炮兵正从海峡北岸大规模地集中轰击漳宜后港一带。头上的飞机在轰炸，大夥儿的生命随时可能化为灰烬。没有喧哗声，默默地坐在无遮拦的船舱里，把命运寄托在这一叶扁舟上。

摩托舫板沿着狭小的新加坡河疾驶，两岸尽是我们熟悉的建筑物。这条弯弯曲曲的驳运小航道，我前后三次旅居新加坡从未游过，风光很不错，可是谁有心思来欣赏呢！不到一个小时，出了河口，过了红灯码头和防波堤，著名的马六甲海峡的内海展现在面前了。尽管是内海，却是一望无际，白浪滔天。胡愈之感慨地说：“别了，新加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再见呢？”由于小船船身只有四公尺长，吃水几十公分，安全驶过了布满水雷的海面，躲过了敌机的侦察。

从新加坡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开往荷属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 (Selat Pandjang) 不过几十哩，正常班的小火轮一个上午就到达了。我们的小船却行了两天两夜，原因是海上第一站就经受一场虚惊，临行匆促，来不及细细检查那破旧的摩托船板，一路老停下来修理，真急死人。好不容易到达峇来吉里汶，已经是傍晚了。这是最接近新加坡的廖内群岛的一个荷兰人管辖的小岛。草木皆兵的荷兰武装人员以为日军登陆了，朝空放了几枪，经过解释，允许上岸，扣留了两天才放行。中华学校校长连啸鸥是我们的文友，会同商界福建同乡们热情招待一番，甚至留我们住下来说：“这里是转运站，不设防，不妨事！”

我们继续前进。

六日中午到石叻班让。这是一个仅有数千人口的小岛，数十家华侨商店，还有数家“沙莪廊”（沙莪粉加工厂）和“峇来廊”（木材加工厂）。南洋女中学生的家长也有好几家，他们对老师汪金丁、高云览、刘道南等表示热烈的欢迎，素昧平生的华侨商人和廊主抢着招待我们，腾出房间来让我们住下。他们的亲热、慷慨、好客使这班举目无亲的文化难民感到无限欣慰。闯到这个平静小岛来的，不只我们一只难民船。在新加坡十五日沦陷之前，几乎每天都有摩托舢板、机帆船、小火轮川流不息地载着侨领、富商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到这里避难。还有漏网的没有当俘虏的少数英澳军，服装不整，一副狼狈相，神色沮丧地从此地转往苏西。这个平静的小岛，闯进这许多难民，变得熙熙攘攘了。

荷兰官在日军压境准备逃之夭夭的关头，对这二、三百个闯入的难民，却一再刁难，对要求签证转往爪哇的，坚持说必须到另一个大岛望加丽去，那里有荷兰分州长做得了主。胡愈之、郁达

夫、王纪元、沈兹九、邵宗汉、张绿漪等希望转道爪哇回国，于九日先行。我和其他同志暂住下来观望。

胡愈之、郁达夫一行到了望加丽，没有达到签证的目的。新加坡于2月15日沦陷，望加丽的荷兰分州长逃跑了，难民行动再不受限制了。但是一切重要船只都被荷兰人扣留，插翅难飞。热心好客的金门籍华侨陈仲培（电船公司经理，还经营峇来廊）把他们接到望加丽对面的山芭（丛林）名叫保东的小“釜公”（村子）住下来避风。

原始森林的景色十分壮丽，高达十数丈的阔叶树林几乎把太阳遮盖了，成群结队的猴子飞跃其间。潺潺流着的小河映着倒挂的椰树影，被偶尔划过的独木舟打碎了。有时小鳄鱼会爬进小河同洗澡者打起架来，大鳄鱼则躺在海边懒洋洋地晒太阳。保东便是这样一个“乱世桃源”。

胡愈之、郁达夫等六人在保东住了一个半月。周围尽是印尼人，学印尼话的条件很好。为了匿名隐蔽，学印尼话成为他们的必修课。郁达夫每天写一首诗，至今尚留下了残缺不全的十一首《乱离杂诗》。其中留别陈仲培是第七、第八两首：

多谢陈蕃扫榻迎，欲留无计又西征。
偶攀红豆来南国，为访云英上玉京。
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
河山两戒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

陈蕃即陈仲培，盛情欲留无计，只好西上巴东寻求缥缈的云英（即李小姐）。他相信河山必能重光，与陈蕃重会金门的盟约必能实现。

迴肠九转，他又觉得“蓬山”未必有路可通（李商隐无题诗

有“蓬山此去无多路”之句），可是“乱世桃源非乐土”，保东不可留，不得不“扬帆从此去”，像“征鸥”一样飞向渺渺的长天。

飘零翠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
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
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第九首在彭鹤岭作。巴城荷印总督3日9日向日军投降。巴城的路断了。日军接管廖内群岛已是时间问题。保东的风声很紧，胡愈之等六个人决定分为更小的两个小组。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纪元化名汪国材，隐匿到另一个荒僻的小岛彭鹤岭去。在那里，两人拿出二十元作本钱，借当地热心家之力，开了一间“吉来”（小副食店），卖的是：一分钱盐，一两椰油，一块“峇来煎”（臭虾酱）等等。这两个突然出现的老板和伙计都不会说闽南话，印尼话的口音又很怪，东西卖得十分便宜。一阵小小的轰动，货物就抢购光了。汪国材劈柴煮饭，赵德清洗碗。吃的是番薯叶，喝的是腐叶水，这种诸葛亮式的“隆中抱膝”的日子，其实呆不下去。诗人遥望烽火，国难方殷，家仇未报，身陷炎荒，伊人已远，不禁心潮澎湃，慷慨放歌了。这是首儿女情牵和书生意气相结合的佳作，主旋律是激昂的：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
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
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新加坡沦陷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本法西斯恨透了敢于

抵抗的新加坡人民，以“检证”为名进行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成千成万的无辜人民，捆绑成串，载到郊外活埋，或用机关枪扫射，或投之大海。日本投降后查到尸骨和被杀害证据的达四万人。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由于交通的恢复，不断传到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内地来。1942年4月间，“昭南岛”日本宪兵派了两名附敌分子，到石叻班让“邀请”知名侨领回昭南岛。第一批四个人回去了，还要“邀请”第二批、第三批……（回去后被关起来）

石叻班让和周围小岛，充满恐怖气氛，彭鹤岭的郁达夫一组和巴唐岛“木材廊”（即末旦）的胡愈之一组随时可以成为搜索对象。眼看无法安心住下去，除了沿硕克河西上，从卜干峇鲁转往无人认识的苏西（苏门答腊西部巴东一带），别无选择。郁达夫一不会讲闽南话，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初时颇为犹豫，但又找不出其它办法，况且王纪元又病了，如何是好？他终于想通了，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武装自己，独自一人搭乘孤舟，勇敢地前进了。下面一首即在途中口占的：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我和妻、女一家三口，还有刘道南夫妇、蔡高岗等，逗留在石叻班让的闽南同乡家里半个多月。因为风声紧，一个月来，凄凄惶惶，转移了三个点儿：“峇来廊”、陈辅来“吉来”所在地和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峇来廊和陈辅来所在地，都是遍布原始森林

的小岛。前者只有一家福建人经营的伐木加工厂，从祖国被贩卖出来的“猪仔”，曾在这里劳动，老死，并埋葬在这里。现在“猪仔”不存在了，数十个“自由”的伐木工人对我们说：“先生，瞧我们怎样生活在这磨死人的地方？”后者是个小码头，两家“吉来”，卖粮食、副食，收购零星土产，代雇舢板，供应三两个客人的伙食。陈辅来头家安慰我们说：“放心吧，这是小山芭，日本鬼子不会来的。”这些小岛的四周纵横着犬牙交错的港汊，鳄鱼出没其间，红树林无穷无尽地排列在海滩两岸，似乎永远走不完；岸上古木参天，阒无人烟，很难想像吴柳斯一组和王任叔一组就住在里面。

我和妻女单独成为一组了，把命运交给渺茫的一线希望：投靠巴东亲戚，即妻吴梅的姨母。“渺茫”在于不知道她家的状况，连住在那一条街也弄不清。

我们沿着弯弯的硕克河前进，在寇文成的普罗峇迪呆了几天。寇文成是福州人，原是华侨学校教师，后来改了行，开一片“吉来”。一见面他就认出我来，像老友重逢一样喜出望外，普罗峇迪濒河而居的水上人家的风光，颇有威尼斯味道。但是日本已接管了石叻班让，很快就追上来，我必须和他们赛跑，到卜干峇鲁搭车西往。

我越过赤道村孟金浪，进入后来我们数十个文化人聚居、郁达夫发生悲剧的地方巴雅公务，询问讲福建话的侨胞：“到巴东怎样乘车？”真凑巧，碰到了侠骨义肠乐于助人的金门人许乃昌，那时他买卖做得不大，是行商，经常往来于巴雅公务与巴东之间。我们素未谋面，他马上猜出我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以兄弟般的情谊，表示愿意带我同行到巴东去，说他认识妻的姨母一家。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许乃昌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兴办酒厂，他帮助很大。）

我至今犹抱着感激之情的是：我和妻女受到姨母吴兰、姨丈林振庸一家富于道义和情谊的接待和掩护。姨丈是店员，兄弟众多，全家几十口人，过去和我这流亡的远客没有丝毫联系，只凭一番自我介绍，不怕担当干系，便把我三口安置下来。谁知道日军和我同时进了城，第二天醒来，日军“和平”接管这苏西最大的港口。有些无知群众，像看热闹似的去看“皇军”，结果挨打的，被拉去强奸的，被抢去东西的，接连发生，才知道魔鬼来了。我目睹当地一家荷兰办的印尼报，前一天还在报道联军准备反攻的消息，过了一夜，便高唱欢迎皇军的调子了。我化了装，改名张止观，同姨丈一家一起，安然领取了“居民证”。一有机会就偷听收音机。一天，隔壁中华学校校长张紫薇（四川人，爱好文艺。后来以了娜笔名写《郁达夫流亡外记》）突然问我：“你听过这个消息么？有个姓赵的，有胡子，会讲很好的日本话，来到巴雅公务，住在海天旅馆，自称为古董商人，人家说他是大间谍呢！”我回答：“我也听说过，但不明真相。”姨丈在侨长（甲必丹）吴顺通公司当店员，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心里突然一亮：莫非郁达夫来了？何不到巴雅公务走一趟探探虚实！

过了几天，我到巴雅公务去，已记不清是哪一天在哪一家同郁达夫相会了。相会的情景是难忘的。他大我十六岁，我也年届而立了。这时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又握手，又拥抱，我低声说：“原来是您！达夫先生！”他露出因抽烟而发黄的牙齿笑道：“想不到又相会了，小兄弟！”

他向我叙述了三个月来传奇式的经历：怎样在卜干峇鲁第一

次碰到日本兵，说了日本话；怎样在访问巴雅公务侨长(甲必丹)蔡承连家，遇见日本军官说他的日本话比他说得还雅；怎样见到巴东州长官藤山，藤山留他在巴东做事，他不干；怎样被武吉丁宜宪兵部硬拉去当通译等等。

“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干怎么办？我已声明是义务职，有人代替就走。”（后来他只干了七个月，就借口“肺病”脱身了。）我注意到，在他平静的神态中，日本式的小胡子有些抖动：“愈之、兹九、任叔、宗汉都在这儿哩！”

谁曾想到，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又在距离日本军政监所在地武吉丁宜三十三公里的巴雅公务碰头了！但是身份和形象有了变化：胡愈之改名金子仙，剃了光头，留了胡子，印尼理发师称之为Tuan Besar（大人、日本人的意思）；邵宗汉改名为张德生；王任叔则成了郁达夫的厨子，大师傅打扮。这回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这不驻日本兵的巴雅公务隐蔽下来，大家找个什么职业掩护。

胡愈之夫妇通过药店老板曾玉印的关系，在市镇近郊拉母西朗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为难民搭起来的“阿答屋”（茅庐）。椰林婆娑，环境幽静，又是一个“乱世桃源”。屋主曾连发是个受过中学教育的爱国青年。他觉得这位“大人”有点面熟，找出巴城新报的纪念刊的文章和照片一对，哦！原来不是什么金子仙“大人”，而是以写国际问题文章出名的胡愈之先生！

郁达夫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呆下来。这是米南加某（Minangkabau）地区常见的高架木屋，门前有个小小的花园，种着一些热带花草。凉台、前厅、后厅、厢房俱全。在巴雅公务这样三等市镇，就像个“富商”住宅，颇为排场的了。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和我听了大笑起来，觉得他演得真妙。

实武牙筹赈会几个爱国分子给我们苏西流亡的文化人赠送四百盾，由内兄吴蕴山拿到巴东让我转交。我再一次到巴雅公务。大家认为这笔款可以办一个什么行业，让居住巴雅公务的人不至于无业。那时市面酒很缺，一家日本老太婆酿造的又不吃香，郁达夫愿意出面申请一个酒厂执照，赵豫记酒厂就这样开起来了。老板不用说是赵廉，经理和酿造师的职务落在我的肩上。赵豫记的厂名是郁达夫起的，没有什么出处，正如赵廉这名字也没有什么出处。

厂的创业十分艰巨，四百盾要办个酒厂，对文化人来说，比合著一本巨书难多了。哪儿找厂址？哪儿找技术人才？怎么搞基建？怎么购置工具？课题是新的，考验是严峻的。

依靠爱国侨胞许乃昌的支持，解决了厂址问题。在拉母西朗胡愈之茅庐的对面还有一片难民园，空地数亩，茅舍数椽，一口井，房子空着，没有人住，随时可搬。技术人材找不到，只有自力更生。

我们花一百盾盖了一所“阿答”（茅草）工棚，花一百多盾订制数十个发酵用大木桶、大玻璃瓶和土法蒸馏锅。其余作为购买原料、瓶子、木箱的流动资金。许乃昌的内兄欧阳允成教我一点酿造米酒的方法（荷兰统治时期不许私人酿酒，允成是在国内农村酿土酒的），又钻研从日本翻译的一套《工业大全》的酿造一章。我在大学是学法律的，化学工业一窍不通，这时也只好试验、试验、再试验，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了。

第一锅酒的诞生，是在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等人的围观中完成的。郁达夫第一个品尝，喝了一口说：“还可以，不够浓。”我那时用两斤米酿一斤酒，不懂加糖孢子，醇而淡，成本很高。

我又死翻《工业大全》，然后又试验。郁达夫每次到酒厂看我老捧着这本破烂的大书，总是笑着说：“啊啊，你又在钻《工业大全》。”他把酒厂当做一桩正经事业来办，每次从武吉丁宜来，总是在酒厂呆半天。

两种酒上市了，一种叫“双清”，一种叫“初恋”。沈兹九在日本留过学，取了日本人喜欢的酒名。

我押货到巴雅公务市上分给零售户，也常常上武吉丁宜推销。武吉丁宜离巴雅公务三十三公里，有火车可达。郁达夫在日本人中大事宣传，又很认真地委托那里的商家代理。商家看“赵大人”的面子，颇为卖力。

武吉丁宜（意即高山）又名“花的国”，位于海拔9,488英尺的麦拉比火山之麓，风景优美，是日本苏岛军政监所在地，驻有重兵。最有名的奇观叫做“那崖”，是数万年前的火山口遗迹，深数十米，口径数公里。崖中长满椰子树、槟树、王棕和不知名的

阔叶树。我推销完了，郁达夫常常带我到那里散步。他没有吟诗，感叹说：“这样美好的河山，却让人糟蹋了！”他悄悄问我：“如果我不暴露讲日本话，你看情况会怎么样？”我看出他的思想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尽管外表是那么平静，这种斗争一定延续了好几个月。矛盾和苦恼从第一天进宪兵部就噬着他的心，那种环境当然不便谈话，我轻声回了一句“也许麻烦少一点。”

郁达夫是个旷达不羁的诗人，好交游，好活动，好到处转转。他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买书、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杭州“风雨茅庐”藏书三万卷（遗嘱称五十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怎不喜形于色呢？他颇为得意地带我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柜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我看：

“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酒厂办得有点起色。胡愈之的成本会计算得很精，逼得我非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不可。我把酒糟用了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每次加大量的棕榈糖，于是成本低了，酒精度数高了，味浓烈了，利润猛增了。凡参加工作和干活的都拿二十元工资（当地物价便宜，维持生活不成问题），老板的应酬费不在此限；沈兹九、邵宗汉干轻活，装装酒；吴柳斯、汪金丁、林醒黄等不久也来到巴雅公务酒厂凑夥，当了酿酒师；杨骚、高云览则在酒厂暂作“寓公”，准备转移。巴雅公务真是沸沸扬扬了。

郁达夫利用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嗜好，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

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会说高雅的日本话，写通顺的日本文，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到巴雅公务自修学会的），印尼文倒不甚高明，发音不准。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高云览为了一件小事被扣，就是他保释的。也有印尼人，犯了联军“间谍”嫌疑，经“赵大人”当着宪兵面前训斥一番，也放了。犯人和“赵大人”说的印尼语，宪兵听不懂，宪兵的日本话，犯人听不懂，“通译”是可以“大显神通”的。

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胡愈之认为应该排除“速胜论”，看到战争的长期性，胜利取决于欧洲战场，即苏联和英美联军转入反攻的到来。后来形势发展证明了他预见的正确。

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没有让他参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处境。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必然使他不便，成为负担。但他是看出来的：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他对我们的态度十分谅解。

然而一年过后，震动听闻的消息终于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郁达夫从武吉丁宜来，一下火车就到胡愈之的“椰庐”来：

“宪兵部来了一个翻译叫洪根培，他是昭南岛受过训练的特务，当然认得我，我弄个小计把他稳住了。”他表面上很镇静，大家都看出他内心是焦急的。他停了一下说：“一时也许不会出

事，但是应该逐步化整为零。”

在座者都同意郁达夫的看法：巴雅公务一个小地方集中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日本宪兵并不睡大觉。我们同时都感到郁达夫的善良和友谊，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真挚动人，不啻是《水浒传》里舍着性命奔往东溪村晁盖庄园报讯的宋押司。

邵宗汉、王任叔早些时候到了苏东棉兰，我和高云览、林枫疏散到苏南去，同杨骚、温端方会合，不久胡愈之、沈兹九也上苏东马达山了。

我和高云览、杨骚、林枫、端方分别在巨港、直落勿洞靠制肥皂的手工业躲过日寇的魔掌。日本投降了，我欢庆将和郁达夫等聚首一堂，开怀畅饮，但是他给日本法西斯杀害了，永远看不见了，留下了热情、善良、厚道、正直的爱国诗人的形象在我的心里！

1982年11月

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

金 丁

近三年来，陆续读到有关郁达夫先生的传略、年谱、回忆录、评论，乃至电影剧本，其中不少涉及他在南洋的经历。有的因仅凭传闻，与事实不无出入，所以对达夫的论断，也多有失之片面或偏颇的地方。我认为胡愈之同志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是有关达夫在南洋经历的一篇翔实而珍贵的史料。1980年，我写过一篇《记郁达夫》（见《读书》1980年5月号），目的是为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的线索，但有些问题，未曾谈及，因特做补遗。

—

我和郁达夫先生都是1938年到新加坡的，他到那里比我较晚，大约是12月了。这年秋天，新加坡永安堂（以制销万金油而驰名）的经理胡兆祥，受《星洲日报》胡昌耀的委托，邀请郁达夫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星洲日报》是胡文虎办的。当时另一新加坡有影响的报纸是《南洋商报》，由福建侨商集资办的，董事中有陈嘉庚先生。这两家报纸不但有营业上的竞争，而且属于不同“帮派”，代表各自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态

度、倾向，也有所不同。

在新加坡、马来亚以及印尼的华侨社会当中，有所谓“帮派”。“帮派”基本上是根据籍贯划分的：有福帮、广帮、潮帮、三江帮等等。因此，新加坡各地华侨的会馆林立。在旧社会，一个在国内无以为生投奔海外而又举目无亲的人，能找到个把同乡，攀封建关系立足，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新加坡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各民族的统治是“分而治之”。他们依靠政治力量，利用经济上的权益，在不同民族间离间分化，并把这种分化，让人视为习以为常的不成文法。我曾在《记郁达夫》一文中提到：“一到新加坡，我们不难看到：闽南人在做土产生意，潮州人多是米商，而广州人则经营洋广杂货，咖啡店一般是海南人开设的。”

入境问俗，类似这样的现象，它可以提醒我们“帮派”在华侨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郁达夫到新加坡，正是祖国出现严重投降分裂危机的时候，汪精卫这年12月逃离重庆叛国。而投降分裂的逆流，也波及南洋，不少以“吃摩擦饭”为业的人纷纷出现在新加坡华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连国民党的海外部长也亲临新加坡策划、部署。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是严禁华侨抗日的。新加坡没有一个抗日救亡的爱国团体是合法的。陈嘉庚先生主持的南侨筹赈总会，也只被认为是筹赈慈善性质的机构才得以存在。在华侨学校里，师生不得有任何反日活动，甚至在学生的作文本里，如发现反日词句，而教师又未予删改，则可能被认为失职以至解聘。

但事实是新加坡的华侨抗日救亡活动，远非殖民地政府的禁令或暴力镇压所能制止的。不少爱国华侨可以通过以不同名义注

册的社团如体育会、音乐社、话剧社公开集会，或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自然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和一些特务，也利用他们掌握的一些公开的书报社、俱乐部制造“摩擦”，阴谋破坏华侨的团结。

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時候，投身到他并不熟悉的充满矛盾斗争的殖民地社会生活的。

1940年间，他曾写过两首诗，是足以说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的。

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
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万里倦行役，时穷德竟孤。
关门无令尹，谁问老聃书！

从第一首诗里，人们不难想见他所以去南洋的原因，而第二首，则显然是他得郭老等同志诗柬后，不能自禁地发为感慨，以表个人的孤愤。

我曾在《记郁达夫》一文中说过，达夫到新加坡后，“相知的朋友很少”。但这里也应补叙一句，和他来往的新交却颇不乏人。旅游途次，宴饮之间，他曾与这些新交题诗相赠，据说“和者如云”，但可虑者是新交中有几人确为他所真正了解呢？

记得这时楼适夷同志有信给我，他谈到了在新加坡的达夫。国内的友好是怀念他的，爱好文艺的华侨青年对他的希望也是殷切的，然而，确实是啊：用要求于郭老的去要求达夫，显然是未尽其宜。我曾想过，是否不经介绍找个时间向达夫谈谈我所知道的华侨情况呢？

达夫和我当时都住在中峇鲁居民区，是近邻，不过他报馆里

的同事告诉我，他正因为家庭纠纷闹成僵局，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很难在家里找到他。于是这期间，也有些情况就无从和达夫谈起。例如金山、王莹的剧团最初竟不被允许上岸，而几经交涉，能够公演之后，却又受到一些不应有的过激的非议。总之是想同达夫畅叙的愿望，竟一直延搁到杨骚同志到了新加坡之后，但那已是1941年7月了。

胡愈之同志比杨骚同志早到新加坡约半年多，是1940年12月，但比达夫约迟两年。愈老不得不离开桂林，国内的反共逆流，已达高潮。他是1941年新年开始接任《南洋商报》社长和主笔的职务的。1月20日和25日愈老发表了两篇为读者称道而难忘的社论，一篇是《团结则存，分裂则亡》，一篇是《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在这两篇社论里，（一）他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约束部下有功，明令予以嘉奖。”而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又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已由军事当局紧急处置，将该军全部解散编遣，该军军长则抗拒命令，已被捕交军法审判。”（二）他指出“南洋华侨在了然皖南事变的真象之后，则应从这次事变的教训，寻求内部分裂的根源。”记得同月17日和20日，《南洋商报》还刊载了《斯诺访问记》和《斯特朗的谈话》，这样就使关心祖国的广大爱国华侨，对于这件“千古奇冤”，如拨云见日，而《南洋商报》的内容，从此也使人感到焕然一新。

国内文化界的同志到新加坡的陆续多了，杨骚同志到后，特意去看望达夫。他们是老友，七七事变后，也还在一起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通过杨骚的介绍，巴人同志和我认识了

郁达夫。我们之间的来往从此多了。也许这以后是达夫在新加坡心情最感到开朗舒畅的时候吧，他这时并兼任起《华侨周报》的主编。这是个四开张的小报。到他家去时，也往往遇到他新结识的女友蜜斯李。人很年青，样子秀丽而干练，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达夫曾高兴地谈到，李的思想比较进步。但太平洋战争把他们分开了。现在留存的离乱诗中，有几首就都表达了达夫对李怀念的深情。

二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在北马登陆，到1942年2月15日，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马来亚和新加坡便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2月初，陈嘉庚先生看过新加坡的总督，得知英国人在准备投降。我们这些在抗敌动员总会工作的同志是否撤离？转入地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沦陷后“检举”期间的大屠杀，也完全得到证实，日寇、汉奸曾搜查过我们的住家），而英军又已炸毁了沿岸的船只，海上完全封锁，情况紧急，我们只得自想办法。当时是由张楚琨同志设法租到了民用的小电船，上船的地点是集中后临时通知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会集体撤离，我们也在事先通知了达夫，他愿意和大家一起走。当时同船的计共十九人，胡愈之、郁达夫、邵宗汉、张楚琨、蔡复生、王纪元、还有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刘道南夫妇，我的爱人和我还带了两个孩子。沈兹九同志、绿漪同志和楚琨的夫人是前一天坐另一只船走的，杨骚、张企程和吴柳斯等同志是9日搭第二支船离开新加

坡的。

这里也顺带说明一下，1970年新加坡出版的《海外庐诗》作者，在一篇题为《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的短文中，提到我们离新加坡时所乘小船，是因为他听达夫说“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将小电船座位尽让与之。”经最近我再同楚琨同志核对，此事不确。

我们到达印尼的石叻班让（Selet pandj ang意即长港）时，统治当地的荷兰殖民官，不允许我们离开，后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荷兰人仓皇逃走了。不久，新成立的昭南（日本占领军改新加坡为昭南）市政府派李玉荣与王铁汗到石叻班让，声称“请”几位避难的侨领回新加坡。我们感到善者不来，决定立即疏散到附近各小岛去。达夫当时是和愈老等一起避居保东的。

现存达夫的离乱诗前九首就都是在保东写的。在保东他们受到主人陈先生的热情照顾，过着“拢帮”（受助于人之意）的日子。达夫自己在这里虽能写出一些惜别忆旧的诗，但终非久居之地，所谓“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他和王纪元同志于是离开了保东到彭莪岭，但遭到房主人的敲索，所以达夫便隻身到了北干峇鲁（Bekan Baroe）。

北干峇鲁是去苏门答腊的入口，地方不大，但华侨却有两千多人，而且比较团结，无所谓“帮派”的分歧，不过气候极热。达夫到这里时，许多华侨都希望他留住那里，但他觉得熟识的人多了，总不会安全，所以决心去苏西，这里有直达长途汽车去巴雅公务（Pajakumbuh）。

从北干峇鲁搭车出发不久，路上遇到迎面驶来的日本军车。日军拦住了长途车，向乘客们问路。由于大家都不懂日语，日军出

言又很蛮横，人们感到非常惊慌，有的逃散，有的挨了打。在这紧急的时刻，达夫下车给问路者指点到了北干峇鲁的去向。

乘客中多是印尼人，眼望着日本军官向达夫行礼致谢，都感到很惊异：这个身穿蓝布工人装的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那些日军匆匆上车走掉？他究竟是个什么人？车上的华侨也听不懂他那带有浙江口音的国语。

这也就是达夫一到巴雅公务，就被视为特殊的客人，甚至视为日本大间谍的原因。

巴雅公务的华侨很少，而且即使是“唐山”（即中国）来的，也多能讲印尼语。达夫开始住海天旅馆，人地生疏，几乎找不到可以谈话的人，很想找到个江浙同乡，因为这时他更担心住在这里是否安全。而且这时他也确实是当地华侨议论的中心人物。

在张楚琨和邵宗汉等同志赶到巴雅公务之后，当地华侨才知道，这位被大家疑为大间谍的人物，原来是从新加坡同大家一起逃出来的难民。

郁达夫当时化名叫赵廉。

被日本宪兵发现在巴雅公务有个很会讲日本话的赵廉，是由于巴雅公务的侨长（Captain）蔡承达先生请他做过一次翻译。

达夫去武吉丁宜（Boekittinggi，从巴雅公务坐火车约两小时左右即可到达）为宪兵做翻译时，为自己编了个假履历：父亲曾在日本做古玩生意，认识一些日本的显要人物（这些人物他讲起来，如数家珍），母亲是日本人，他自己也是古玩商，懂得琴棋诗画，战前到的苏门答腊，可是生意还没有做起来，战争便发生了。

赵廉住的是一座幽静精巧的荷兰式房子。屋里外文书很多，屋外花草怡人。有个时候，除请了印尼人的男女仆外，任叔夫妇

也以佣人的身份住在他家，俨然是富商气派。

但伪装也着实不易，听着他在生人面前，谈笑自若地叙说他的家庭如何富有，在日本时逛过哪些名胜古迹，父亲母亲又如何如何，有时的确令人也感到很痛苦，我们怎能忘记他沦陷的家乡富阳和惨死的老母呢！

在这同时，我们这些避居印尼各小岛上的难民，经济上都大成问题，不能再继续隐居度日，为长期打算，不得不设法找个谋生之道。凑巧楚琨同志的亲戚，送来了几百盾（元）钱，后来当地两位同情我们的侨商给凑足五百盾，由赵廉出面，办起了赵豫记酒厂。

酒厂设备很简陋，房子是用草席和 Atap（棕榈叶编成的叶片）搭起来的。蒸酒的锅子是旧油桶。问题是最初试酿的结果，酒味虽香，但成本高于售价。从采购糯米、食糖、酵饼和收购空瓶，直到推销营业，事务很多。在当时可说是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要办一个工厂，困难很多。我们请的工人，主要都是印尼人。楚琨是经理，又是做酒师傅，里外都由他当家。赵廉只是名义上的“头家”（老板）。胡愈老管账，他每天都要到酒厂。账是复杂的：有原料账、产品账、现金账、营业账（包括批发、零售和因不得不偷捐漏税专门应付税务员的假账）。我初到酒厂时，是向胡愈老学习管账，懂得了什么叫经济核算。记得学会管账以后，我们就不再三天两头盘点产品和原料了。

此外是方君壮同志到巴雅公务后，开始试验用灰水煮成肥皂，产品颇有销路。这样酒厂和肥皂厂的收入，足以维持我们这些难民的生活，赵廉的手头也宽裕多了。他在宪兵部做翻译，不曾接收过日本人的分文。虽然日本人也曾说过要给他加薪，但正

如达夫所说，宪兵部没有谁不曾伸手向他借过钱。甚至主管巴雅公务的日本文职官员，也习以为常地向他变相地敲索。利用日本人无厌的贪婪，他确实为当地一些侨商在百业萧条的困境里，创造了能做赚钱生意（如贩运土产）的方便条件。

达夫是在1943年春，借口有病辞去宪兵部翻译职务的。其时，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占领军准备在苏门答腊的武吉丁宜设立军政监，可能要从新加坡调来一批日本人和他们的爪牙、汉奸，情况将会更加复杂。

郁达夫终于又回到巴雅公务的朋友当中来了。他不必再像做翻译时在精神上时刻感到紧张不安。后来他搬了家，搬到沿大街的一套完全是侨商住的铺面房，他真像个商人了。不过他并不会做生意，也不想做，每天除同一些侨商打牌，应酬一些串门的来客，主要就是看书。在日常生活上他感到急需有人照顾。他常到酒厂和肥皂厂来，也过问一下营业情况，但他发现我们做工都很忙，有时去到胡愈老家闲谈，但当看到几个熟朋友在座，好像大家正在议论什么，于是他便说声：“你们谈吧！”就又走了。他是感到寂寞的。当时，我们从新加坡流亡到印尼的一些朋友之间，曾有个秘密组织叫“同仁社”，人数不多，每星期大家聚会一次。有个人的生活报告，读书研究的体会心得，而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形势的讨论分析。最初能看印尼文书报的只有胡愈老，经胡愈老介绍，我们对研究印尼问题的兴趣增强了，兹九同志和我还找了一位可靠的印尼教师教我们印尼文。我们并把研究的心得，复写下来，订成小册子，分送到各地社友中传阅。当时任叔、宗汉等同志在棉兰，蔡复生和陈仲达在石叻班让，后来杨骚和楚琨去了苏南的楠榜。我们通过这个秘密组织，同各地流亡到印尼的朋

友（包括更多的非同仁社的同志），保持联系。

是不是这个秘密组织也该请达夫参加？记得他到巴雅公务不久，曾同任叔有过争论，问题是“不是消极的逃难又该怎么办？”后来他也同我说起过他同创造社和左联的关系，他觉得他自己不行，不如鲁迅或者郭老，确实他很像郭老所说：“遇见什么棘手的事，便萌退志。”他这时可能猜想到我们会有个什么组织，但他从来没有探问过，我们也没有征求过他什么意见，不过他感到他是和大家一起的，并且可以无所不谈。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他同一位叫何丽有的巴东少女结了婚。

三

苏门答腊的日本军政监部成立不久，约在1943年下半年，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里，有个新来的叫洪根培的翻译，是在昭南岛兴亚所受过训练的汉奸，他很快就同达夫相熟起来，并且表示他好像也是“自己人”。达夫对人虽有时多疑，但有时又很不介意。凑巧这姓洪的看中了巴东一位姓黄的侨商的女儿——原新加坡南洋女中的学生。在一次酒宴席上，他央求达夫为他做媒，达夫不加思索就贸然答应了。等到达夫知道这位黄小姐正是在我们酒厂做工的林先生（也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的未婚妻时，达夫对自己的失言，感到非常懊丧。他说他可以再去找洪根培，把情况讲清楚。依达夫的估计，这家伙无论如何无法无天，总不至于强迫行事。

次日下午，达夫从武吉丁宜回来，没回家便先到酒厂。他说上午他已找过洪了，干脆回绝了为他做媒的事。我问洪有什么表示？据说洪显得极不高兴，不过没有说什么。我又问起“你看洪

会怎样？”达夫说：“他能怎样？我不怕他。”接着他说他要去看老金他们（他指的是胡愈老和兹九同志，愈老当时化名金子仙），“我看他们要及早离开。”

接着是有人很快地通知我们，说洪根培在大放厥词，非把那姓黄的弄到手不可，还威胁说：“他赵廉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设法办理通行的手续，凑巧又有辆运货车去棉兰，于是在一天夜晚，愈老同兹九同志，由一位当地青年陪同，悄悄顺利地离开了巴雅公务。在这同时，在酒厂工作的林先生，也去了巴东，同他的未婚妻仓促完婚。

大约是1944年2月初，达夫从巴东回来，破例没到酒厂来，我赶到他家时，他神色很坏，一个人在饮酒。他告诉我：原在巴雅公务华侨小学做校长的孙某，头一天晚上到武吉丁宜他住的旅馆去找过他。孙某在宪兵部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是去那里为洪根培做旁证的，说是他也是不得已，并且还请达夫帮忙。达夫说：“我把他臭骂了一顿。”

看来洪根培已经向宪兵部告发了。

接着，记得是在旧历除夕，林先生在巴东家里被宪兵捕去了。

达夫听到这意外的消息，立刻赶到巴东，在了解被捕的经过之后，他到宪兵部为林去担保。林先生很快地被释放了。

我曾到巴东去看望老林，他说被捕后宪兵还没有审问他，达夫便去保他出来，林估计可能这只是一个威胁。

然而预料可能发生的事，并不曾发生。往常宪兵部到达夫家里吃吃喝喝的那班家伙，有几天都不见来，这使达夫增添了疑惧。不过以后又来时，仍是客客气气。只有一次达夫发觉，一张

旁人请客的帖子，他放在桌上，待到宪兵走后，却不见了。

巴雅公务和达夫平时接近的一些华侨，有的被宪兵捕去，而释放之后，却不再去达夫家，当时有的生意人还传说不要和我们这批人接近。

我们从新加坡逃难出来的朋友，当时还留在巴雅公务的，除家属外，一共是八人。

达夫有时日夜打牌，有时整天看书，偶然也去武吉丁宜宪兵部，探听敌人的动静。

他曾问起胡愈老他们是否有信来？巴人的近况怎样？他希望苏东方面不要再发生什么问题。

有一次，是在宪兵从达夫家走后，他兴奋地跑到酒厂，说是一个宪兵伍长对他说，他们宪兵办事就是这样，一个案子，发生在熟人身上，也许大事变成无事，发生在不认识的人身上，小事也可能变得很严重。他怀疑这伍长是不是有意对他暗示什么，但他又觉得不该麻痹大意，接着他颇为感慨地讲起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段情节：“我们真像被网在水里的鱼，偏偏那渔夫并不拉网，我们暂时就只能在浸在水里的网内活动。”

有三个多月敌人方面都不见有什么动静，我们征得达夫同意，计划再来一次疏散，并让住在他家的小杨（原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干部训练班学员），到苏南另觅转移的据点，但小杨还未出苏西境，就在萨瓦伦多车站被宪兵扣留了。

到过达夫家的宪兵，是认识小杨的。最后他们放回小杨时，要他转告赵先生，他们对他的情况都已经弄清楚了，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他们过两天将要看望他。

当时我们住在巴雅公务的朋友，由于情况的这种突然的发

展，对日本人下一步将会怎样，都感到捉摸不定，我就约上方君壮同志一起去看达夫。达夫认为当时的问题已经很简单了，“无非主要是让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另一条是，反对南京伪政权。”他说得斩钉截铁。

果然宪兵部派人来看他时，他们带来他不少的著作，说他瞒得他们好苦，他们如何调查他，到过多少地方，用了多少钱。达夫为他们的告一段落干杯，送了他们一千盾钱。

日本人并没向他提出什么要求。

宪兵部的人仍经常到他家来，不外是喝酒、聊天、借钱，达夫似乎又有些担心，为什么他们没有再向他正经地谈到什么。我们也在时刻警惕，敌人是不是还在设法侦察其他的线索。

这样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大约过了整整一年。

1945年8月初，达夫听说日本人要借口检查卫生来一次大检举，他很为大家担心。16日一清早，达夫突然跑来酒厂，很兴奋地说：“日本投降了！”他说夜里在蔡承达先生家里听到了广播。

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都如释重负。不过从巴东传来的消息是，有的华侨的房子被贴上了封条，三青团已公开地在那里捕人。是不是有什么坏人在混水摸鱼？达夫这时除去和几个当地熟人打牌消遣之外，很少外出。但是没料到，8月29日傍晚，达夫正在家里和几个朋友闲谈，有个讲印尼话的青年约他到外面讲几句话，有人看到他们边走边谈。但这天夜里未见达夫回家。据目击的印尼人说，他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和另外的人坐上了等在那里的汽车，他被敌人绑架了。

朋友中少了达夫！中国失去了达夫！

到我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确已于1945年9月

17日为日本宪兵所杀害，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

关于《补遗》内容所要说明的问题，主要的我想就是这些。我希望读者能从郁达夫先生一段短暂的晚年经历当中，多少了解一些大战曾席卷全球的那个灾难性的时代，以及发生在殖民地和敌占区的一些具体真实的情景。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地方，一个中国五四以来的大作家，是如何临大节而不辱，牺牲了自己，捍卫了民族的光荣和尊严。他是可敬的烈士。尽管他一生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我们将永远带着景仰的心情怀念他，同时我们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敌人的狡黠、卑怯和残暴。

1982年11月于北京

在最后的日子里

——读《访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

郁 风

郁达夫于1938年12月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三年之中写了许多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分析时局促进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评论，国内尚未见介绍。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新加坡成立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郁达夫担任执行委员并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2年2月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等抗委会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由于某次在车行途中遇日军，为同车人安全，用日语和日军答话，因而暴露了能通日语，从此被迫充当翻译，并化名开办酒厂。后来虽然设法脱身不当翻译，但为掩护爱国志士和华侨，不得不时与日宪兵周旋。终于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9月17日被日宪兵秘密杀害。

对于像达夫那样一生放浪不羁的作家，处在远离亲人、敌情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坚忍不移的斗志应付一切，其痛苦可以想见。这最后的时期，他留下的只有凄怆悲壮的诗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录有海外作品四十余首）。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守在他身边的，只有一点也不了解作

为作家的达夫的新婚两年的妻子何丽有，这篇访问记就是她的朴素的比较真实可信的叙述。(原载1982年8月香港《广角镜》)

近两年国内对郁达夫的研究成为热门，然而资料非常缺乏，许多出版社一再重复出版他的小说，对于国内从未发表的他晚年在海外的散文评论，却没有人搜集出版。还有不少报刊出版社热衷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一段婚变纠纷，甚至翻出当年香港某刊发表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后，又邀约王映霞在气头上发表漫骂式的长信，“以飨读者”，扩大销路。这不是认真严肃的介绍研究资料的做法。

1982年9月24日

访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

马 力

最近，笔者有机会在香港访问了当年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两年的夫人何丽有女士，请她谈谈她所知道的郁达夫。

一、结 婚

何女士是广东台山人，小时候跟随她的姨丈去印度尼西亚，她的姨丈姓陈，所以去印尼时就改姓陈。1943年，郁达夫化名赵廉在武吉丁宜（BOEKITTINGGI）的日本宪兵部做翻译，由于他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而且当时他又向日本人表示他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坚持不收受日本宪兵部的薪水。当然，在宪兵部做翻译可以暗中营救一些人，但是郁达夫始终不忍心眼看许多华侨、印尼人被拉到宪兵部去毒打，所以一直设法要离开。开始时，他装作害肺病，但是日本宪兵因为找不到日语的翻译，不准他辞职，后来郁达夫买通了宪兵部的医生给他开证明，希望借此脱身，宪兵队长还是不准。后来，终于找来了个通日语的女的，才请了她代替郁达夫做翻译，适值宪兵队长换人，郁达夫也就辞职了，但日本宪兵部仍然要他随叫随到当翻译。

郁达夫离开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就回到巴雅公务（PAJA-

KOEMBOEH)，和朋友合伙，开了赵豫记酒厂，由他做老板。当时有朋友劝他最好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样一方面生活有人照顾，另一方面，结了婚，日本宪兵就不会怀疑他是中国来的。九月，郁达夫去巴东，经友人介绍，和一个年轻的华侨姑娘结婚，她就是何丽有女士。

何丽有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时媒人告诉她说，巴雅公务有个姓赵的老板想娶个新娘，她自己也没有意见，于是就和赵老板结婚了。何丽有并不懂得国语(即普通话)，只会讲台山话和马来话，所以她和赵先生的沟通很少，平时也是用马来话交谈。赵先生的朋友来找赵，说的多是国语，她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结婚前一天，郁达夫拟了个结婚证书的稿如下：

结婚证书	
男 赵廉	
原籍 福建	
年 四十岁	
女 何丽有	
原籍 广东	
年 二十岁	
右①二人于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东结婚因在战时一切从简	
此证	
证婚人 吴顺通	
介绍人 戚汝昌 吴元潮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① 原件为竖行。

一式两份。结婚时，每人各持一份。仪式也很简单。当天晚上，郁达夫作了四首诗：

无题四首用《毁家诗纪》中四律^①原韵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編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都因世乱飘鸾凤，岂为行迟泥鹧鸪。
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八聘罗敷。
从今好效风云笔，试写滕王蛭蝶图。

贲秦原不为身谋，揽轡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箭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滨。
酒从两月庄中贳，香爇观音殿里熏。
水调歌头初按拍，摩诃池上却逢君。
年年记取清秋节，双桨临风接紫云。

从这四首诗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当时的真实情感，对于故国，

^① 指《毁家诗纪》中的四首律诗。

他还是十分怀念的。

婚后，郁达夫把新夫人带回巴雅公务。当地的朋友知道郁达夫新婚，也纷纷来道贺。郁达夫对这位新夫人也很好，雇了几个佣人供她使用。有些经常来赵家吃喝的日本宪兵，也觉得郁达夫是个很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何丽有嫁到赵家，看到郁达夫有许多书，也很奇怪，因为郁达夫虽然是酒厂的老板，却不常到酒厂去，一般是每周去一次，其他大部分时间，不是看书就是和朋友打麻将、闲谈，再不就是应酬日本人，应酬日本人之余，又常常替人向那些日本宪兵求情，何丽有也感到赵廉像个读书人。就这样，在对丈夫没有什么了解的情况下，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两年，生下了一男一女，长子名叫大雅，次女美兰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才生下的。

二、丈夫失踪

一直到了郁达夫失踪以后，才有人告诉何丽有，她的丈夫赵廉，在中国是文化界的名人，叫做郁达夫。但由于何本身没有什么文化，她也不知道什么文学家郁达夫，只是大概知道丈夫原来在中国是个有地位的人。

郁达夫是怎样失踪的呢？据何丽有回忆说，日本投降时，郁达夫就常常离开巴雅公务，到别的地方去偷听盟军的广播，回家以后就告诉何丽有说日本人快投降了。有一天他回来说，中国赢了，日本投降了。他很高兴，说现在日本人再也没有权抓人打人了，他还说要到武吉丁宜去看看情况。又说，如果中国派人来，他要请他们吃饭庆祝，他也准备回中国。过了几天，郁达夫又约了几个中国朋友到家里开会，商量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何

丽有将近临盆，很不方便。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来找郁达夫，说有朋友要和他谈话。郁达夫就跟着那人出去了。出门时，佣人告诉何丽有说：“先生出去了。”何说：“出去就把门关上，你等他回来再开门。”岂料一直等到第二天，也不见赵先生回来。何丽有就叫佣人到街上的露天茶座去找找，看看先生是不是和朋友在打麻将，结果也没找到。许多朋友本来到赵家帮忙的，知道赵先生不见了，也帮着找，整个巴雅公务都找遍了，也没找着。当晚，何丽有就生了美兰。

第二天，日本宪兵还到赵家，问何丽有赵先生哪里去了，何丽有就问日本宪兵：“先生不见了，是不是你们把他抓去了？”日本宪兵回答说：“不是，赵先生对我们很好，我们不抓他。”何就说：“那么请你们帮忙找一找吧。”日本宪兵就说：“好！不过我们快回日本了，恐怕找不到。”日本宪兵队长还亲自到赵家，慰问何丽有。有个朋友还到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去查，看是不是抓了郁达夫。日本宪兵却劝他别问了，说让何丽有先顾自己要紧。宪兵部又派人告诉何丽有说找不到赵廉。

后来，新加坡的报纸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何丽有才知丈夫被害。当时日本宪兵取道新加坡回国。有人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走以前抓到了郁达夫，并杀了头。新加坡的报纸报导了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在巴雅公务的人，知道后才告诉何丽有的。许多华侨和印尼人都替何流泪，说她丈夫是个好人，曾经帮助许多人。

大概在1944年初，就有人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说赵豫记酒厂的老板赵廉就是郁达夫。后来有一个日本宪兵到赵家去吃喝，就称他为“郁达夫先生”，并向他勒索金钱。郁达夫知道身份已经暴

露，也就承认自己是郁达夫。奇怪的是，以后日本宪兵却没有把他抓起来，还是照样到他家来吃喝、赌钱。有时还告诉郁达夫说宪兵部将准备去抓谁。郁达夫也感到自己会有不测。1945年元旦，他就立了个遗嘱，交给好友蔡清竹保管。遗嘱说：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及地一，长有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巷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三子：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日本宪兵既然早已发现了郁达夫的身份，却等到日本投降后，才把他绑架杀害，大概是为了要毁灭这个日本宪兵罪行的目击证人。郁达夫曾在武吉丁宜的宪兵部做过翻译，许多宪兵又常到他家去吃喝，所以郁达夫掌握很多他们的犯罪资料。为了防止他日

后写文章揭发日本宪兵在印尼的罪行，就找人把他骗出来杀害了。后来，日本宪兵又散布说是共产党杀了郁达夫，但何丽有也肯定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三、先生是个好人

何丽有虽然对作为作家的郁达夫没有什么认识，其后也曾听别人说郁达夫是个坏人，替日本人做事，她说：“先生其实是个好人，他很恨日本人。”何丽有回忆说，郁达夫虽然和日本宪兵来往，请他们回家吃喝，甚至拿钱给他们使，但郁达夫却常对何说，日本兵很坏，对中国人很残忍。钱财只是身外物，只要他们少点抓中国人，花一点也是值得的。有的日本宪兵和郁达夫熟了，也会告诉郁达夫他们准备去抓谁，或者问郁达夫的看法。有一次他们和郁达夫商量要去抓蔡清竹，说蔡私印钞票。郁达夫就告诉他们说蔡是好人，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可以人头担保。后来郁达夫和他们去查，结果原来是蔡清竹借了钱给人，那个人不知从哪里得来伪钞票，买东西时被发现，就说钱是蔡给的。日本宪兵要治那人诬告罪，也是郁达夫说情放了的。还有一次，郁达夫看见宪兵在街上毒打一个中国人，就问宪兵他犯了什么罪，原来是偷了日本兵的香烟叫卖。那个中国人告诉郁达夫说，是有两个日本兵向他买吃的，没有钱，放了香烟代替，他自己不抽烟，所以拿出来卖，不是偷的。郁达夫向宪兵解释，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宪兵才放人的。由于郁达夫和日本宪兵有来往，又肯帮助人，许多华侨或印尼人有事都来找郁达夫帮忙。

郁达夫遇害后，人们知道郁达夫的身份，许多人都送钱给何丽

有表示慰问，因为赵先生以前救过他们。也有拿钱来还的，说赵先生在他们困难时接济过他们。这些何丽有一直不知情，但她却认为，她虽然不清楚丈夫的行动，如果丈夫是个坏人，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说他好话，拿钱来送给她了。当地的华侨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办郁达夫善后，蔡清竹大概也是其中一人。一直到1960年何丽有离开印尼，蔡清竹还照顾郁美兰的生活。

现在郁美兰在南京教书；何丽有和大雅都在香港。

今年5月，何丽有女士回南京探望她的大女儿，又到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去旅行，会见了郁飞及其他亲戚。女儿告诉她说，以前人家说她父亲是个汉奸，现在中国又重新印她父亲的书了，还称她父亲为烈士。在富阳，当地政府为了纪念郁华和郁达夫兄弟，还造了题为“双松挺秀”的亭子。富阳就有一条街道名为郁达夫街，也可见家乡的人对郁达夫的怀念。何丽有看到这些，也得到了安慰。不久以前，郁美兰还来信说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郁达夫文集，还寄给她一部分分给郁大雅和她的版税，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

（原载1982年8月16日香港出版的《广角镜》

第119期，本刊略有删节）

郁达夫生平事略(上)

于 听

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少小时还有小名叫荫生。他的中学修业文凭上就称“学生郁荫生，原名文”。他的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上称“郁文”，英文证书上为：“T.D. Yuewen”。他从开始向社会发表作品以来，除少数例外，一直自署作者郁达夫。以后成为著名作家，外界遂只知其字，不称其名。他是浙江省富阳县城人，生于1896年12月7日。他的祖父郁圣山字仰高，当时曾是这个县里很有点名气的中医师，但早故。他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早年为私塾教师，兼行家传之中医，后在富阳县衙门户房当小职员(司事)。他有二兄一姐：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他出生后的第三年，父亲就去世了，家贫少产业，只有祖遗三开间住屋一所，薄田六亩。年老的祖母尚在，一家祖孙六口，两代寡妇，全仗母亲陆氏勤俭持家度日。由于生活困难，姐姐郁凤珍幼年就被送给乡下的叶家做童养媳。郁达夫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他自幼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性格孤独，沉默寡言。

他的母亲是个贤能有见识的人，在青年守寡十分贫困的境况下，还竭力培养三个儿子上学读书，督促甚严。当他七岁被母亲送入亲友家自办的罗氏私塾读书的时候，长兄曼陀已到杭州考取了光绪己亥科府道试的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接着因废科举而入杭府中学，毕业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二兄养吾也相继考入了杭州的陆军小学堂，也是官费生。他在这个好学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又聪颖强记，入学后勤学用功。他的启蒙塾师葛宝哉和第二个塾师、魁星阁私塾的张惠卿老先生都说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10年冬，他在“春江书院”改办的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是个优等生。在高等小学时已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在1918年写的《自述诗》中说：“九岁题诗四座惊”，“十五岁而专心研求韵律”^①，已能写一手讲究格律的旧体诗了，并开始学习英语。这几年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他在高等小学的“几位看报的教员”影响下，知道了“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关，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特别是有一位国文教员给学生们看了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清朝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害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②使他开始接受了一些反对帝制，革新图强的爱国思想。这时，长兄曼陀毕业归国，已在北京政府供职，家境稍裕，因而他能继续到杭州、嘉兴等地上中学。但他接连换读了杭、嘉的府办中学和几所教会学校后，都觉得很失望，自1911年秋至1913年夏他主要是在家自学。这两年内他阅读了几百部古今文艺著作，提高了英语

① 见郁达夫《自述诗》原注。

② 郁达夫：《自传·书塾与学堂》。

水平，并写作了不少歌颂故乡山川和感时的旧体诗。他的家乡富阳是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位于景色秀丽，“一川如画”的富春江边。他曾有过一首描写家乡的小诗：

家在严陵滩下住， 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锦， 来往春江有钓船。^①

郭沫若说：“达夫是生在这样地方的人，我相信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②这两年的自学，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起着奠基的作用。在杭州时，他已经读了《西厢记》、《花月痕》等一些旧小说和词曲杂剧，并开始向当地的一些报纸投稿，在《全浙公报》和《之江日报》上发表过一些小诗。回家以后，他所发表的诗就更多了，而且还寄到上海，在《神州日报》上发表。惜乎这些早年的吟咏，很早以前就已散佚，至今所能收集到的就只有1911年写的《咏史》三首了。其中一首是：

楚虽三户竟亡秦， 万世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 八千子弟半清贫。

当年他还只有十五岁。这首小诗已含蕴着浓厚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了。

1913年9月，长兄曼陀受北京大理院派遣去日本考察司法，他就在长兄的携带下到了日本。初入东京神田正则学校，一年内补完中学各课程，晚上则在夜校修习日语，学习十分紧张。1914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同学，正式成为官费留学生。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凡是考上了这五所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

① 郁达夫：《自述诗·第四》。

② 郭沫若：《望远镜中看故人》。

这五所学校中的一所，并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其他八所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入大学，可以一直享受官费。1915年夏他在一高预科毕业，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开始学习德语。一年后因医科费用太大，自己又爱好文学，改入法科（当时文、哲、经、政统属法科，即第一部）重入第一年级，继续苦攻德文。他对德国文学，如海涅等人的作品发生浓厚兴趣，成为当时的德语教师樱井先生的得意学生。1919年夏在第八高等学校毕业。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在八高和帝大，他逐渐养成了每天写日记和好买书籍的习惯。所得官费，除俭朴的生活开支外，几乎都买了书，因而阅读了大量的俄、德、英、日、法的文学和哲学名著，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总计这段时间所读名著在一千部以上，而且除俄、法文外，读的都是原文版图书。郭沫若在回忆与他同学时的情景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①在日本的这几年里，他写了不少旧体诗，在国内的《之江》、《神州》等日报和日本的《新爱知新闻》、《太阳》杂志、《大正日日新闻》等报刊上发表。当时日本的著名汉学家，《新爱知新闻》的汉诗编辑服部担风氏读了他的《日本谣》（按：即《日本竹枝词》）十四首赞叹道：“郁君留学吾邦未出一、二年，而此方文物情事，几无不精通焉。自非才识轶群，断断不

^① 郭沫若：《论郁达夫》。

能！《日本谣》诸作，奇想妙喻，信手拈来，绝无矮人观场之憾，转有长爪爬痒之妙，一唱三叹，舌桥不下。”^①以后就与他成了“忘年之交”，邀请他参加“随鸥吟社”、“潮声吟社”和“佩兰吟社”等诗人组织，常以诗词相往来。同时，他也开始了写作白话文小说并用日语写小说。在进帝大前，他已写成《相思树》、《金丝雀》、《两夜巢》、《圆明园之一夜》等篇（未发表），在进帝大后，写成了《盐原十日记》、《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四篇。

1919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象点燃爆竹般引发了国外留学的郁达夫思想上的共鸣。自从他来到日本，亲身经历了作为一个弱国的子民被外人歧视和欺凌的种种痛苦，这强烈地刺激着他，他要求奋发图强，拯救祖国。在八高时，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已不能爱人，余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余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余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余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哉？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余则生及季世，日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时，1919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6日，

^① 日本稻叶昭二：《郁达夫その青春上诗·郁达夫の投稿诗》。

北京消息始行传到日本，日记载：“北京大学生群起而攻曹汝霖、章宗祥、陆润田三人。”七日的日记中又说：“国耻纪念日也。章宗祥被毆死矣（按当时误传章被当场打死）。午前摄影作纪念，以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进入帝大以后，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他心底里火一般的爱国热忱，就从潜在的能量一变而为“不平则鸣”了。1920年前后，有一次东京留日学生总会邀请当时日本著名的所谓“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教授演讲。尾崎在讲到中国问题时，言辞间对中国颇涉讽刺。忽然在近千人的听众中，有一人站起来向尾崎质询，声调激昂，持理正确而又措辞得体，博得全堂如雷的掌声，迫使尾崎当场道歉。听众注目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帝大学生郁达夫！当然，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他的这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必欲以文章鸣世了。在他的《沉沦》等早期作品中，就有着明显的反映。

1920年夏，他回故乡富阳与孙荃结婚（后育二子二女）。回到他日夜希望赶快富强起来的祖国一看，祖国却正处在军阀一片混战，人民万马齐喑的苦难之中，他不禁发出“太息神州事奈何！”的悲鸣。秋，还日本。他和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郑伯奇等一班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都深深地感到：五四所带来的“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①他们决心以唤起民众为己任，迫切希望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文艺刊物来

^① 郭沫若：《给田汉的信》，刊《南国月刊》二卷一期。

推动新文化运动。但酝酿了多次，觉得困难实在多，特别是找不到出版刊物的处所。1921年6月，郭沫若回上海征得了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的同意与支持。于是，7月中旬的一天，就在东京郁达夫寓所开会决定出版《创造季刊》。这就是以后成为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开始。既决就行，郭沫若先回上海筹办。两个月过去了，郭沫若遇到了不少外界的困难，又担心内部力量不足，工作无进展，就坚邀郁达夫回国接替他筹办。这年9月初，他到了上海。接办不久，他的热情和自信竟使他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于9月29日在《时事新报》上登出“创造社”同人的出版预告：“《创造》第一期，1922年1月1日出版……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向全国宣布了“创造社”的诞生！这时，郭沫若已回日本，读到这项预告时，真是又惊又喜，即在10月6日给他的信中说：“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一点眉目来，你到不两礼拜，便使我们的杂志早有诞生的希望，你的自信力真比我坚确得多呢！”^①接着，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先行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一种，新诗集《女神》，郭沫若著；第二种，《革命哲学》，朱谦之著。10月15日，又出版了第三种，就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其中包括《银灰色的死》和《南迁》共三篇），向全国喊出了他的“救救祖国”的第一声。预告登了，丛书出了，“创造社”其实还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他为了维持生活开支，还不得不先去安庆任教，担任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英文科主任。安顿了生活，他就着手编写《创造季刊》的稿件。到1922年3月，他才编成了《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发稿

^① 郭沫若：《沫若书信集》。

后又匆匆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的毕业考试。4月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5月1日，《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正式在上海出版了。这一期上共发表了他的五篇作品：小说《茫茫夜》、随笔《艺文私见》、译文《杜莲格来的序文》（英王尔德作）、《〈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成仿吾著）跋语》和《编辑余谈》。

《沉沦》和《创造季刊》的出版，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对《沉沦》的反响尤为强烈。成仿吾说：“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它不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它那种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①郭沫若说：“他（达夫）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般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②当然，这种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喊，大胆向虚伪、冷酷的封建道德的挑战，也遭到了更多的卫道士们的非难和攻击。同样，《创造季刊》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了文学界的纷纷议论。特别是由于出版预告中曾意气用事地有过“我国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语，使当时的另一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深为不满，进行对垒式的“酷评”。但随着《创造季刊》在纷纷议论中的接连出刊，创造社的声誉日渐扩大了。《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郭沫若主编）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对胡适派文人余家菊译书的错误有所指摘，于是

① 成仿吾：《〈沉沦〉的评论》。

② 郭沫若：《论郁达夫》。

又展开了创造社与胡适之间的一场激烈笔战。通过这场论战，创造社不仅经受了考验，而且还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郭沫若在以后的回忆中说：“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在当时只把我们当成了一批上海的洋场恶少，轻易的树下了一批敌人。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①

1922年7月，他毕业后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自1923年4月起，他辞去了安庆的教职，和郭沫若、成仿吾在上海专门主持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工作。除原有的《创造季刊》外，5月15日出版了《创造周报》，7月21日起，又在上海的《中华新报》上创办了日刊《创造日》，出现了创造社日益兴盛的局面。刊物多了，而编辑却依然是他们和邓均吾等几位轮流担任。从组稿、修改、创作、编排到校对都必须一手包办，几乎日夜都埋头在文字工作中。热情之高，斗志之壮，真如他自己在日后回忆中所谓的“艰苦奋斗”的“恶战”^②。他的小说《风铃》、《春潮》（未完）、《葛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青烟》、《秋河》、《落日》，散文《中途》、《北国的微音》、《立秋之夜》、《还乡后记》、《苏州烟雨记》（未完）和文艺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

^① 成仿吾：《〈沉沦〉的评论》。

^② 郁达夫1932年1月4日日记：“从今年起，到四十岁为止，我想再恢复一下当时在创造社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恶战它四年。”

家》、《批评与道德》等许多作品，都在这时期先后发表。随着作者的进入社会，开拓了视野，这些作品也开始从《沉沦》的“自我呼喊”朝着深入描写社会的方向有所转变，主要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受剥削、受压迫的“生的苦闷”^①，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在我国现代文学上，他是第一个提出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口号的人。同时，《春风沉醉的晚上》也是较早，甚至可算是最先“真正成功地写出了一个人物形象的作品”。^②尤为可贵的是这个形象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来表现，“他没有从概念出发，把自己笔下的无产者写成包打天下的‘英雄’，他们都是最平凡者，他们虽没有诸如放火、谋杀之类的惊人之举，但他们却以自己诚朴善良的品格，平凡悲苦的命运，赢得人们真挚的同情，和对于陷他们于苦难之中的剥削阶级的正义的愤怒”。^③但其中也有部分作品瑕瑜互见，如《风铃》（后改名为《空虚》）、《秋河》等，过多地描写软玉温香，实属败笔，未免为盛名之累。

过度紧张的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活，加上经济上的窘迫——创造社这时虽已发展到极盛时期，但没有建立健全的稿酬制度。除《中华新报》每月有一百元的编辑费，三人可以分用外，季刊和周刊，泰东图书局从不付酬金，只是五元、十元地付点零用钱。缺乏出版经验的年轻的创造社同人，只知忘我地工作，倒是让书局老板赚了不少钱。日子久了，同人们都感到难以支持。这年10月初，他不得已应北京大学之聘，去北京接替陈启修（豹隐）担任统计学讲师。他本来希望这样可以使创造社减轻些经济压力，而

① 郁达夫：《断残集·关于小说的话》。

② 史承钧：《试论〈春风沉醉的晚上〉》。

③ 赵园：《郁达夫及其创作散论》。

他这一走却形成了创造社初期活动的离散和衰落的开始。10月中旬他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是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是官僚、军阀们的天下，等待他的只能是歧视和冷遇。在北大，他不能教文学，只担任每周两小时的统计学。他无可奈何地说过：“统什么计，真正无聊之极！”^① 他也曾与北京的“太平洋社”打过交道，想让创造社与该社合出新周刊，但“太平洋社”是有政治背景的，终因貌合神离而未能实现。在北京住了一年零二个月，他“感到了许多苦闷焦燥”^②，但十分难得的是在这里开始认识了鲁迅。

他和鲁迅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23年的2月，正当他到北京的长兄家度岁。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二，他应周作人之邀，与鲁迅同席。十天之后，郁达夫在北京东具楼宴请鲁迅。他对鲁迅的印象很好，他曾对陈翔鹤说：“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③ 鲁迅对他的印象也好。鲁迅后来曾说过：

“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好象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④ 这种动人的真诚相见，就为这年10月以后，两人同在北大教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延续十余年的亲密友谊作了订交。鲁迅比他年长十五岁，他对鲁迅十分仰慕和尊敬，始终以亦师亦友的态度相待。这以后他曾热心地向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推荐过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等小说。郭沫若也说过：“郁达夫之于

① 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

②③ 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④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鲁迅对他也很器重，除了经常互赠著作，交流创作见解外，还视他为可以共事合作、能够谦交自牧的诤友。这期间，有很多文学青年慕名去找郁达夫，或者写信给他，他都给予帮助。有一次，是一个大雪天，他按照一封来信的地址，亲到西城一个小公寓去看一位青年。只见一个瘦小的人，只穿着件夹衣，屋里很冷，没有生火，拿旧棉絮裹着双腿，用冻得发肿的手在写小说。他激动地把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羊毛围巾解下来围在青年的脖子上，又领青年到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饭后把找回的零钱也全给了他。事后他就十分气愤、感慨地写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控诉这残酷、吃人的社会。这个文学青年就是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文学家沈从文。当时，鲁迅打算邀他共同选印新作，以鲁迅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和他在青年中所享的盛誉，来共同关心青年人才，进行提倡，确实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但可惜因1925年初他就应石瑛（蕲青）的邀请去武昌师范大学担任文科教授而没有实现。在北京的这一时间里，他继1923年10月底出版他的第二本小说集《茑萝集》之后，又陆续发表了《零馀者》、《秋柳》、《小春天气》、《十一月初三》和描写工人无产者的、他自己称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薄奠》等作品。

在武昌师范大学他住不到一年，因校内发生了校长石瑛与古文学家黄侃（季刚）之争，他受到国家主义派和守旧势力的排挤、攻击，“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①，于这年秋季开学后一个月，就愤然离校回上海。1925年这一年，他自己说“是不言不语的一年”^②。但还是创作了《牢骚五种》、《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寒宵》、《街灯》、

① 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② 同上。

《送仿吾的行》等作品，还帮助当时的师大学生，后来的知名作家刘大杰、胡云翼、贺杨灵等组织“艺林社”，介绍他们的作品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这时候，上海的创造社因郭、成也相继离沪，人员分散，经费不足，《创造季刊》出完第六期，《创造周报》出了五十二期，《创造日》出满一百零一期都先后停刊了。创造社已无形停顿。他到了上海，就和先已重返上海的郭沫若以及周全平等为恢复创造社而积极奔走。前在武昌时他已与张资平、成仿吾讨论过恢复工作，至上海就决心自行筹办创造社出版部，不再上书局老板的当。但这年晚秋，他积劳成疾，肺病又重新发作了，于是回家乡富阳和杭州疗养，一直到次年年初病愈才回沪。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3月正式建立，决定重新创办《创造月刊》，郁达夫担负了创刊号的编辑，于3月16日出版。又接过原由光华书局出刊的《洪水》半月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刊物），自二卷十三期起改由创造社继办。创造社进入了恢复期，也就是一般文学史所称的第二期。

这时正是北伐革命的前夜。两年来，他走南闯北，到处碰壁，看尽了北洋政府统治下军阀、官僚的祸国殃民和旧社会的种种罪恶，迫切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①。1926年3月，郭沫若应聘担任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文科院长，邀请他同去担任文科教授。3月23日一同到了广州。这时候，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等都先后来到广州。成仿吾已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其余的都在中山大学任教。于是，在大家的努力下，不久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和汕头分部。他这次来广州，原是满怀着美好的革命理想到这革

^① 郁达夫，《创造月刊》创刊号之《卷头语》。

多牢骚不敢发。”^①到了上海，就终于发表了。论文揭露了在广州所见的表面革命进步，而内里却还是一片浑浊和黑暗，指出广州政府在国民党右派的统治之下，腐败无能，工农力量还是被压在底层，这场革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领导。因此号召民众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并提醒人们：“有人说，广东是一个牛奶海，许多左派，到了广东，颜色都变了，这一句讽刺，希望真正为民众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对。”这些论点和这1月18日也到了广州的鲁迅在1月25日中山大学的欢迎会上发表讲演时所说的“本来听说广东很革命，赤化了，因此决心从厦门到广州来看看，来了后果然街上红标语很多，仔细一看，红布上是用白粉子写的标语，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害怕’”^②。几乎所见略同。接着他又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六期上发表了论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三卷二十九期上发表了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这篇政论写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四天，即4月8日。他在北伐军进军上海以后，已经觉察到革命成果有被蒋介石篡夺的危险，因此，论文明确指出，“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必须打倒“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果然，四天以后，蒋介石就开始了大屠杀，在《洪水》三卷三十期上，他发表了《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他写道：“我们的宗旨，是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的不平与攻击，就是无产阶级者对资产阶

^① 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0日》。

^② 转引自黄中海、张能耿：《鲁迅书话·伟大的飞跃》。

级的不平与攻击,我们的喜怒,就是无产阶级者在心的深处所感到的喜怒。我们所想走的路,是一般无产阶级者事实上被环境所迫,不得不走的路。”接着又应日本《文艺战线》社记者小牧近江、村里欣三的要求,写了一篇《诉诸日本无产阶级》,发表于日本《文艺战线》六月号。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些激烈的政论,既恼怒又恐慌,对他进行了利诱和威胁,见于他的公开发表的日记中所载的有:3月23日蒋介石指挥北伐军进驻上海后,国民革命军当局授意李某拉他,“有人想邀我(达夫)去接收东南大学,我告以只能在教书方面帮忙,别的事却不能出力,嘱他转告当局”。^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局向他吹风,要封闭创造社出版部。他曾去找李某商议,次日,在一次宴会中,就有人告诉他,“当局者可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但要我(达夫)一个交换条件,去为他们帮助党务,托病谢绝了”。^②不久,李某又请他在新新酒楼吃晚饭,“主人李君极力想让我出去做个委员,我不愿意。后来他又想请我教周某及其他几个宁波新兴权势阶级的儿子的书,我也没有答应”。^③这一切许愿、交换,他都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就翻脸威胁,于5月29日搜查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他幸而已于28日逃往杭州。一面登报声明,扬言已去日本,才免于难。一直到6月25日他才偷偷地回上海,继续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但不久因他和田汉等公开接待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访华,为当局发觉。8月2日,上海警方再次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据当时跟随其叔父佐藤春夫来华的佐藤智慧子回忆:“8月2日那天,本来

① 郁达夫:《新生日记·3月28日》。

② 郁达夫:《五月日记·5月10日》。

③ 郁达夫:《五月日记·5月23日》。

约好一起去吃午饭的。可是到下午两三点钟，还不见他（郁达夫）的踪影。我们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四点钟左右他好容易才来了。他说：‘方才警察来逮捕我，几乎被抓去了。幸亏警方并不认识我，无论他们怎样追问，我只是说本人不在，这才逃了出来。’我们那时住在‘万岁馆’，劝他不如留下暂住一夜，但他说还有地方要去，就走了。”^①这才又免于难。

与此同时，他的这些激烈的政论也引起了创造社内部有些成员的反。自《广州事情》发表后，在广州参加北伐的一些成员纷纷责备他“倾向太坏”，写了《读了〈广州事情〉》一文，批评他不应该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攻击“革命的后方”广州。但他却认为：

“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②并继续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这无异是他的公开反蒋宣言。接着发生了国民党当局两次搜查创造社出版部事件。那时随着北伐已聚集到上海的创造社成员和原来在上海的出版部的“小伙计”们，又纷纷责备他不该写这些激烈的文章，以致连累创造社。他们“结合在一起，大家非议我（达夫），说我不负责任，不事预防，所以弄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气极了，就和他们闹了一场，决定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③此后第三天，他就搬出了出版部。1927年8月15日，终以经济纠纷为导火线，他登报声明完全与创造社脱离关系。事后他又发表文章公开说明，他和创造社所以要分裂，是“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招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经营”^④。经济纠纷也是存

① 见日本东洋学文献ロフター丛刊第廿二辑（郁达夫资料补篇（下）第200页）。

② 郁达夫：《新生日记·3月8日》。

③ 郁达夫：1927年8月3日日记。

④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

在的：经出版部结帐，认为他共亏欠一千多元。“总之是我（达夫）的倒霉，我都承认了。”^①他只得将《寒灰集》和《鸡肋集》两书的版税作抵。从此，他的作品就不再在创造社出版。此后，创造社也增加了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等新人，进入了后期活动。

可是另一方面，十分不幸的是，就在这斗争尖锐复杂的紧张时刻，他却在1月中旬与王映霞发生了恋爱。他几乎用大部分精力与时光去争取这个比他年轻十一岁的姑娘。以致自1月上旬编出了《创造月刊》第六期之后，除续出了几期《洪水》以外，直到6月下旬才编出月刊第七期。这当然也成为创造社成员激烈反对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出版部“小伙计”，以后也成为著名作家的叶灵凤，在事隔三十多年以后的1963年，早已是心平气和的了，还是这样痛心地说：“达夫先生结识了王映霞女士，实非达夫先生之福。这正是当年除了创造社出版部的问题之外，我们这一群一向崇拜他的小伙子，同他‘交恶’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对于义兼师友的郁达夫先生，每想起了就要觉得心痛的原因。”^②这件事，他也遭到长兄郁华的强烈反对。但与此截然相反，真是所谓“亲者所痛必为仇者所快”。这个恋爱事件却为当时的上海国民党黄色小报所狂热喝彩，连篇累牍地“美人佳话”、“秘闻轶事”，哄传一时。

1927年6月底以后，他与王映霞同居。后育三子一女，女出生后就送给了别人。

自从脱离了创造社，他迫切希望重新振作。自叹“我在这八

^① 郁达夫，1928年2月8日日记。

^② 叶灵凤为《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增订本）》写的《题记》。

月里，又是一点儿成绩也没有，以后当更加努力，更加用功”^①。8月中旬，曾有余泽鸿等几个“小朋友”来约他共同创办“以公正的眼光，来评现代的社会革命”^②的评论刊物《民众》旬刊，他欣然答应，并参加编辑。9月5日出版了创刊号，他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和政论《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他对《民众》颇寄予希望，每期都为之写文章，连续发表了《农民文艺的实质》、《乡村中的阶级》、《俄英若交战》等评论和译作的《最初的播种》。刊物开始有了一些影响，他也增加了信心，10月14日的日记中说：“在途中遇见了几位学生。他们都问我以民众旬刊的事情，不可不好好的干一下，使他们年轻的学生，有所指归。”11月8日的日记中说：“外间大有人图依。因为《民众》被认为C. P（按：即共产党）的机关杂志之故。然而我们努力却不会因此而少怯，打算将《民众》改名为《多数者》，改由一家书店印行。大约自十期起，可以公开销售了。”在这个另竖战斗旗鼓，独立奋战的困难时刻。10月3日，鲁迅自广州来到上海。老朋友在上海的重逢，使他无异获得了最大的精神支柱。从此开始了他与鲁迅将近六年的共同战斗的生活。

鲁迅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支持与帮助一直是巨大的。自从他的反蒋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以后，广州一些右派报刊便对他进行恶意攻击，有些人已把他看作“危险人物”。1927年6月即有孔圣裔者在国民党右派主办的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了《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指名攻击：“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

① 郁达夫：1927年8月31日日记。

② 郁达夫：1927年8月19日日记。

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鲁迅公开揭露《这样做》说：“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说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①1927年9月19日，鲁迅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已将郁达夫看作危险人物，大奇。”

同样，他信任与支持鲁迅也是十分真诚的，热烈的。鲁迅到上海后不久，创造社后期人员和太阳社的一部分人员，受了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围绕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对鲁迅开展了错误的批评，以“左”的“革命”面貌进行围攻。他认为这是犯了幼稚病，是很不对的。他说：“我总认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鲁迅）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②从正面给予鲁迅最大的肯定。1928年，创造社开了一家“上海咖啡馆”（郑伯奇经办）。有人对外宣传：在那里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他就在鲁迅主编的《语丝》第四卷三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革命广告》，反唇相讥：“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我有一次也曾和他谈起咖啡馆过的。他的意思是仿佛在劝我不要走进另一阶级的咖啡馆，因为他说：‘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

^①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扣丝杂感》。

^②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

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按：当时称无产阶级为第四阶级。）这是公开表明他与鲁迅站在一起。鲁迅也表明与他同一态度，即在其文后加了一段附记，辛辣地声明：“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现见于鲁迅《三闲集》中的《革命咖啡馆》就是当时《语丝》上的这段附记。他既认为自己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就准备同样遭受包围、斗争而在所不辞。到了1933年1月，这场论争早已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宣告结束。有一次，鲁迅要他写字。他就写了一首《赠鲁迅》先生的诗送去：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坵垆力，不度江河万古流。

这既是对伟大的鲁迅的崇高评价，又是他个人对这场论争的态度。

他和鲁迅在文学事业上的相互支援和共同合作更是十分亲密动人的。他所编的《民众》旬刊出了六期就被迫而不得不停刊了。1928年8月，他又创办和主编《大众文艺》月刊。鲁迅答应一定帮忙，果然亲自动手翻译苏联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农夫》和《十月》等篇送去。但他只编了几期就不再担任编辑了，鲁迅也就中止翻译。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接编《语丝》周刊，他应鲁迅之约，也积极为《语丝》写稿。因此，有人曾以为他也参加了“语丝社”。后来，鲁迅辞去了编辑，他也就很少为《语丝》写稿了。1928年3月6日，鲁迅提出与他共同合办一个杂志，他高兴地答应了。为筹办和商议稿件，4月以后他几乎每天均去看鲁迅。6月20日，两人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号出版。自北京聚首相议，至此已将五年的两人合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个刊物，图文并茂，是当时上海出版界中所少见的。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高兴地说：“月刊《奔流》出来了。我去拿了两本来，印刷却很不坏。”鲁迅为这个刊物付出了很多心血。一些具体工作，如集稿、编排、校对、算发稿费、配置插图等琐碎事务和撰写编后记，都由鲁迅一人承担而从不计较。郁达夫主要为这个刊物翻译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他说：“《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按：指创造社和太阳社）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症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①这一时期，他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有时还是在鲁迅风趣地自称为“猛烈的‘恶毒’的催逼下”赶译出来的。《奔流》共出了十五期，至1929年12月停刊。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原为鸳鸯蝴蝶派盘踞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大胆革新面貌。但遇到了不少阻力。他“竭力劝他（黎烈文）努力干下去，我（达夫）答应为出全力帮忙”^②。因此他开始为《自由谈》写杂文，而且写得很勤，还郑重地向鲁迅介绍黎烈文，要鲁迅为《自由谈》写稿。他“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黎烈文），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达夫）转交的。”^③使《自由谈》成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战斗阵地。

① 郁达夫：《回忆鲁迅》。

② 郁达夫：1933年1月19日日记。

③ 同①。

这时候，党在上海所领导的许多著名政治团体和社会活动，他都是和鲁迅一同参加的。当时，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这是个以声援和救济被捕的革命者及其家属为主要任务的组织。鲁迅到上海的初期，与党的联系很多次是通过互济会进行的，并曾为之捐款。而郁达夫同互济会中的党员作家阿英（钱杏邨）是很亲密的好友。1928年2月初，阿英、孟超、杨邨人、楼建南（适夷）等组织的太阳社，因为经济上很困难，阿英、孟超经与他商量，为他选编了一本《达夫代表作》，由春野书店印行。他就将全部版税送给了太阳社作为活动经费。因此，阿英始终也把他当作太阳社成员^①。但他对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则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是“小弟弟们（他称之为YOUNGER GENERATION）的胡闹”。1928年10月，由他和阿英共同主编的互济会刊物《白华》创刊，他为创刊号写了《白华的出现》，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援救被压迫同胞。第二期他又写了杂文《故事》，说专制独裁、杀人如麻的秦始皇及其帮凶文人的故事以斥责蒋介石。但不久《白华》就被迫停刊了。1930年2月，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经过党的团结教育工作，他和鲁迅一起，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并共同签署为发起人。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由鲁迅提名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和鲁迅都参加了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反帝大会的劝募捐款，宣传抗日等活动。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事变发生后，鲁迅与他、茅盾、周起应（周扬）、胡愈之、沈瑞先（夏衍）、田汉、丁玲等联合四十三位作家发表

^① 钱小云、吴秦昌，《阿英散文选·阿英忆左联》。

了《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声援中国人民抗日，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当时巴比塞还没有过世。罗曼·罗兰、纪德以及俄国（苏联）的作者协会，都有了回电，寄来了主持公道正义的文章，……这时候在上海的中共执委，负宣传之职的人有两个，一是余泽鸿，一是广东梅县青年。由他们那里，更传来了许多东方大学的同志的消息，以及他们的论文、决议案等”^①。1932年冬，鲁迅和他又联合许多作家发出为中苏复交给苏联作家协会的贺电。1933年1月，他和鲁迅共同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担任了同盟的全国委员会执委，他担任了同盟上海分会的执委。1933年2月，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法西斯杀害，他除了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的檄文外，并和鲁迅、茅盾联合很多作家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所以，姜德明说：这期间，上海的一些主要政治运动，“凡是有鲁迅在，便也有达夫的份儿。达夫总是跟着鲁迅，追随左右的。”^②

他和鲁迅还都是日本文学界所知名的中国作家，都在日本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用日文写的文章。日本对他们的作品也常有评论。他在192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载：“上虹口去看了些日本新出的杂志、小说，在《上海每日新闻》（日人办的日文报）的元旦号上，看见了一篇日本人评中国作家在1927年一年所作的东西。我的《日记九种》及《过去》都在被捧之列。”他们俩又都是日本内山完造先生的朋友，都是上海内山书店的经常

^① 郁达夫：《一二·二八的当时》，刊1939年1月30日《星洲日报·晨星》。

^② 姜德明：《鲁迅与郁达夫·同鲁迅在一起》。

主顾。当时他们俩与日本人的通信往来也大都由内山书店转交。自1927年他到上海以后，日本文学界、文化界的作家、学者和记者如佐藤春夫、国木田虎雄、本间久雄、金子光晴、宇留河、增田涉等等曾多次访华，内山先生每次都要请他们两位会见，并以“文艺恳谈会”等形式举行座谈，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如1930年8月6日的一次，由内山先生在“功德林”素菜馆设宴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他和鲁迅就会见了日本文艺界人士十四、五人^①。又如1931年6月2日的一次，据增田涉氏所记：“那个时候，歌人（按：系歌咏‘和歌’的诗人）柳原白莲女士来到中国，说想见见中国的文学者，于是由上海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安排，在一家素菜馆^②设宴招待，给柳原女士介绍了鲁迅和郁达夫^③”。也有几次是由他们俩人分别设宴接待的，凡他设宴，必邀鲁迅参加；同样，鲁迅设宴，也邀他参加。如1928年4月2日的一次，他“在陶乐春请客，到了鲁迅及景宋女士与日本的本间久雄氏、金子光晴氏、国木田虎雄氏与宇留河氏。午膳毕后，又请他们去逛了一趟米淞园。回来在小有天吃晚饭，到日本人五十多人，总算是极一时之盛了，闹到晚上的十二点才回来”^④。这已是一次相当盛大的私人接待了。

这段期间，他写作政论、杂文和散文较多，而短篇小说的创作却不很多。自1927年2月发表了《过去》以后，六年之内，只写了讽刺小说《二诗人》，短篇小说《逃走》、《在寒风里》、

① 参见鲁迅，1930年8月6日日记。

② 据鲁迅1931年6月2日日记，系在“功德林”。

③ 日本东洋学文献セフク丛刊第22辑郁达夫资料补篇下。

④ 郁达夫，1928年4月2日日记。

《纸币的跳跃》、《杨梅烧酒》、《十三夜》、《马缨花开的时候》、《东梓关》、《迟桂花》、《瓢儿和尚》、《碧浪湖的秋夜》等篇。作风上继续向描写社会努力，艺术塑造上更形细致、成熟，而主题却趋于深沉，逐渐隐去了原来的奔放、热烈的感情色彩。在部分作品中倒是让不满现实而向往恬澹、超脱的倾向占了上风。这期间，他开始把已发表的小说、散文、政论、译作等編集《达夫全集》。陆续出版了《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杆余集》（这一集未标明列入《全集》卷数）等八卷和日记集《日记九种》、翻译集《小家之伍》、文艺论集《小说论》以及《达夫自选集》。新创作了两个中篇小说：《迷羊》和《她是一个弱女子》。前者在1928年1月出版；后者在1932年2月出版，但后者发行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这些著作的出版，他虽然收得了不少版税，但专业创作的收入毕竟是不稳定的，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他又好买书，平日小买，收到稿费就大买，几乎无日不有所买，开支既大，因而还是一直闹穷，他总是想到不如去教书，可以有固定收入。1929年10月，他曾应聘去安庆担任安徽大学文科教授，但到校后半月，就遭到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的攻击，并把他列入“赤化分子”名单，图谋加害，幸得友人邓仲纯事前通知，逃返上海，只好依旧过他的不稳定的专业作家生活。可是，1930年以后所办的几个刊物都已先后被迫停刊，可以发表文章的地方，只剩《北新半月刊》、《北斗》、《现代》等寥寥几家。他的《全集》的版税也愈来愈少了。而要继续从事创作，他还是必须不断地买书、读书，家庭开支也增加了。于是，经济日渐困难，甚至达到了“北新版税不送来，已陷于绝粮的境

地^①”。 “北新的版税，尚未送来，急得我要命，这样的生活，若再继续过一两年，恐怕生命都要短缩下去，明年决意去教书。… …午后下寒雨，因为没钱买米和菜，将一张四年来用惯的铜床卖去。”^② 然而，尽管当时的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说过：“郁达夫学问好，教书亦认真。”^③ 却终于没有一个大学敢于再冒着风险聘请他去教书。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这个租界交错的复杂之地，一年比一年加剧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而公开出现的革命文学运动则首当其冲。1929年2月7日，国民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封闭了创造社。接着，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革命文学团体也先后被封或被迫解散。1930年以后，为配合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武力围剿”，更开展了全面的“文化围剿”，大规模通缉、搜捕革命文化人士。他和鲁迅已为反动派所注意，被列入南京的通缉黑名单。迫使他不得不几次外出躲避。如1930年4月，他曾秘密避居到离家不远的一间“亭子间”里。他说：“我之所以要迁入此地，要视它为牢狱的理由，不知者或者要说我在自寻烦恼，在故意的做浪漫的梦，然而，前天晚上的那危急的警告，昨天一天所听到的实际的情形，岂不都在证实我这一次的不得不自裁，不得不自决么？因为，不如此，恶社会就要加我以恶制裁了，强迫我入狱去了，这岂是酷爱自由、最

① 郁达夫：1931年12月7日日记。

② 郁达夫：1931年12月26日日记。

③ 秦贤次：《郁达夫其人其文》，“达夫第三度赴安庆，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安大校长为杨亮功。据杨亮功先生言，郁达夫学问好，教书亦认真。可惜仅四个月即因故离去。”

重自主的我之所能忍受的？”^①鲁迅在同年5月24日给友人章廷谦的信中也说：“捉人之说，曾经有之，避者确不只达夫一人。”1931年1月，“左联”的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等五位青年作家和一大批共产党员接连被捕。2月7日，五位作家和十八名党员竟被秘密地杀害。消息传来，引起所有爱国进步人士的极大悲愤。他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说，“到夜回来。见友人数辈，谈到了近来文字狱的屡兴，各为之唏嘘不已，因为兔死狐悲。我们都不免为无意义的牺牲也。”与此同时，他和鲁迅也都接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并对他们开始秘密监视。有个国民党小特务后来对人说：那次他奉命监视跟踪。谁知郁达夫是个神经病，半夜里还出门去喝酒，再到外滩去坐了大半夜，害得他饱喝了一夜西北风而一无所获！为了摆脱监视。这回，鲁迅避居日本人的花园庄，他则逃离上海，回故乡富阳小住。以后在1932年发表的散文《钓台的春昼》，就是说的这次躲避。1932年4月11日他还自撰过一副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就是当时躲避特务而不敢明言，拿到稿费后才能买书的实况写照。

“左联”成立之初，某些同志，受党内“左”的路线影响，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和宗派情绪。据当年负责筹备的“基本构成员十二人”之一的夏衍在1962年5月的回忆：“在筹备过程中也还继续有争论，如我们中有些人不同意郁达夫作为‘左联’发起人，但由于鲁迅的坚持而同意了。”^②“左联”成立之后，内

^① 郁达夫：《自囚日记·四月六日》。

^② 夏衍：《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期。

部对他继续颇有“颓废、消沉”的指摘，后来发展到“左联”通过了把他除名的决议。据当时做为“左联”常委之一的郑伯奇在1962年9月的回忆：“‘左联’很少开会员大会，但在初期……记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集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以后，我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彼此才逐渐恢复交情。这事我深感内疚，觉得作得欠妥。以后事实证明，达夫始终倾向革命，和党时有联系，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议，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主持这样的会议，应负主要责任。”^①

“左联”决议请他退出的前后，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把上海变成白色恐怖世界的时候。1930年4月6日，也即“左联”成立后一个多月，他在日记中说：“三数日来，因为这种种敌人的大联合的结果，我已经陷入在一个四顾无人的泥浆深泽里了。我想叫‘天！’天又那能够回声答应？我想叫一声‘同类者，救我一救！’然而四面远远地站着在等候机会的，却都是些饥得很久，渴得很烈的啖肉饮血的动物的獠牙。雪白的獠牙！”1931年3月4日，国民党继血腥屠杀“左联”五烈士之后，连一向对外较为稳健和平的北新书局门市部也被强行查封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晚上北新有人来，说门市部已被封了，就

^① 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刊《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一期。

为他们去看蔡子民氏，托为缓颊。并约明晚去听回音。晚上一晚睡不着，因为想起了中国的黑暗，实在是世界上无论那一国所没有的，遍地豺狼，教我何处去安身呢？”接着他就因躲避当局警告而逃到富阳，于3月31日潜行返沪。而自4月4日至24日，又是“匆匆二十天中，内忧外患，一时俱集，曾几次的想谋自杀，终于不能决行。”^①他确实感到了背腹双患，十分孤立。外患既不得不躲避，而内忧，朋友间的排斥、攻击，家庭里的为经济不满足的争吵却是日夜相煎，无法避开的，因而十分痛苦。他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人类，为这隔膜之故，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断送了多少有为的精力与光阴，这可叹的事实，我今晚上感觉得尤其深切。”^②到了1933年4月，他终于从“文化的战场”上海，举家迁移到杭州去了。这次移家，他在《移家琐记》和其他文章中说明，是迫于经济，为了节省生活开支和乡土观念，才“在一个春雨霏微的节季，终于听了霞（按：指王映霞，本是杭州人）的劝告，搬上杭州来住下了”^③。其实，早在上引1930年4月6日的同天的日记中他就有了“保全待时”的想法：“昨天的那一位老革命家对我之所谈，想起来实在是一种由经验得来的至理名言，我总要先行医疗好我的痔漏（按：当时正一面为躲避而“自囚”，一面割痔疮），然后才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留得青山在，总有采樵时’，这两句很普通的话，当时实在是感动得我很深。”^④此外他在移家到杭之后未及一月。比《移家琐记》稍后，又写过一篇

① 郁达夫：1931年4月24日日记。

② 郁达夫：1932年1月5日日记。

③ 郁达夫：1932年6月16日日记。

④ 郁达夫：《住所的话》。

小说《迟暮》。写的是主人公林旭自上海移家杭州的经过，而其实完全是在“夫子自道”。其中主人公道出了移家的原因是：“在这一个暴风雨将吹到来的大时代里，我们所能尽的力量，结局总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们，原也很在努力，但实力总觉得还差一点。象我这样，虽自己明晓得自己的软弱无能，可在有些时候，也还想替他们去服一点点的推进之务，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近来老觉得似乎将要变成他们的障碍的样子，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这文艺的战场”。

他这次移家，鲁迅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不赞成他去杭州。

“左联”的那次临时会议，是在鲁迅离开会场后，才有人提出并最后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的。当然事后鲁迅是知道了。他当时在上海的处境，鲁迅是明白的，并不无感慨。但鲁迅还是恳切地劝阻他迁杭，甚至在他移家八个月之后，还送过他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劝他应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继续为宣传革命而战斗，切不可呆在官僚、卖国贼已经强化了法西斯统治的杭州：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但一向对鲁迅言听计从的他，这回却没有接受这个忠告。到杭后，果为国民党特务群丑所包围，最后弄得如他自己所说的家破人亡。后来他在1939年陆续发表的长篇纪念文章《回忆鲁迅》中痛定思痛地说：“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

也曾对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纪录里，曾看到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破瓦来遮盖下体。这倒不知出在那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①，但他那句诗的原意，却就是指此而言。我悔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按：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头头、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们做出比邻人（按：指日本国主义）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

（未完待续）

^① 据查，鲁迅所说系出自宋代郑文宝的《江表志》：“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鹿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回忆商务印书馆

陈叔通

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总评价

首先要看它对于时代所起的作用。在没有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之前的书店，完全为商业，而且好多是教会办的，以印圣经为传教服务，兼做一些生意，价值很小，所以可以说在商务诞生之前有书商无文化价值，商务诞生以后引起很多文化出版家，这是商务有开风气的作用。商务的出版经营是从全国着眼的，各省设有分馆，其出版物的文化影响有全国性的，影响大，作用也大。

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经营方针

为什么有些同期成立的书店不久便失败，而商务能顺利发展呢？

商务在开创时期有什么经营方针是很难说的。它既承印商业上账册广告之类的东西，也承印书本，故取名叫商务印书馆。因此可以说，初创时期的商务是以印刷为主的，并不是一开头便想做出版家的。商务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家，而且成为解放前我国

最大的出版家，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济（下简称张），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下简称夏）。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夏与张怎样认识和结合的呢？先要追溯到张的一段历史。张是戊戌（1898年）维新的参预人，是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的。原来张是壬辰（1892年）的翰林，甲午（1894年）是刑部主事，戊戌之前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1年辛丑条约后改为外务部）为章京^①。当时总理衙门掌权的是张幼樵（荫桓），也是倾向维新的。张元济入总理衙门后，见到各种条约公文案卷堆置很乱，于是提出条陈订了一些办法，张幼樵很器重他，又加维新倾向的一致，很投合，当时有二张之说。张幼樵与李鸿章的关系深，故张元济也被李鸿章认识。光绪皇帝有维新倾向，要看新书，向总理衙门要书，张元济便在总理衙门内检些送进去，也曾向外买了些书以总理衙门的名义送进去。每次送书要具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故光绪帝知道有个叫张元济的。戊戌政变后，慈禧处理维新分子，当时的维新分子确有生命危险。据张元济说，有一天慈禧太后下旨革职一个与张官阶相仿的京官，处分为“革职永不叙用”。光绪帝在旁插言“那么张元济也应当革职永不叙用”，于是张就被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之所以提名张元济革职永不叙用，是存有保全的用意。

张是一个寒士，革职回家去怎么办？张当时尚无主意，只是应速离京以免祸患。张由京到了上海，当时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来访张，告知李鸿章有电报要盛宣怀安置张，故盛宣怀为他在

① 清朝官名。清代凡都统以至各衙门办理文书之员，多谓之章京。

南洋公学开辟一个译书院，请张为院长。于是张就去主持译书院。译书院编了一些课本书稿要交印刷商承印，夏瑞芳为兜揽印刷生意而和张相识。二人交往既多，逐渐彼此认识。有一次，夏短少周转资金，张觉得夏办事很好，存心帮助一下夏，为商务介绍一家钱庄，张作担保立透支一千元之往来，之后，夏、张更加接近。夏办商务有雄心，觉得只承印一些东西没有多大的发展，而在给教会印书中，见到书的市场不坏，也心想出版一些书本。此意先告诉了张，张曾代理过南洋公学堂堂长，他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觉得衙门式的机关牵制很多，并不得意，也有意个人活动活动，终于时机成熟了，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于是双方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

当时在士大夫中，大家知道张元济，特别是有进步倾向的人都向着他，彼此通气，夏也因此而认识更多的人，更便于招股扩充。商务早期资本的来源，发起人多与教会有关系的，所集资金也不多，非教会的人入资多由于张的关系。所以那时商务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张元济。

商务为什么能成功？我看一是经济力量雄厚，二是人才多。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这两个条件都抵不过商务。中华创立请范源濂主持编辑，但范是抵不过张的。以后中华的发展大体上是跟着商务走的，在出版价值上的创造性远不如商务。1916年左右中华曾提议并入商务，中华的代表是孔祥熙，商务的代表是我。在开始商谈时，孔对中华的情况并不清楚，也许并没授以全权，支支吾吾，谈不出道理来，我建议双方当局直

接谈判。我当时的想法是如双方愿意合并，合并了力量更大；如不合并也有好处，出版界来一个竞争，既推进文化发展，也有利于读者，偌大中国不是一家能吃得下的。张也同意我的看法，谈得既无结果，双方各自办下去。

另外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张元济既对商务如此重视，如此出力，为何始终不肯当总经理呢？这是因为总经理是公司的代表，要向官厅进呈，要与官方应酬，而这件工作在士大夫中认为是不体面的。张在维新失败以后，断绝与官场往来，故由夏瑞芳出面，夏死后由印锡璋出面，张始终不出面。

还有一事可谈，商务在1903年利用日股，合资经营。因为那时日本有一家金港堂要到上海来办印刷厂，而当时商务因创办时间不久，基础尚未扎实，想利用一下外资，于是商洽合办，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人方面都是一些讲汉学旧学的人，野心未显著，合办当有一定好处。到了1911年前后，觉得有外股总是不妥，乃议定收回日股，交涉协商多次，终于1914年达成协议全部收回。这是夏瑞芳一手经办，其功不可灭。

总的说来，商务早期经营方针，不过是搞搞印刷出几本书，为的是图利。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便因势利导，引导到发展文化的路上，从而成为出版企业。

商务编译所是怎样罗致人才的

在1902年，张离开南洋公学堂译书院，进入商务后，要进行编书，不能一人独搞，于是第一个拉蔡元培。张与蔡都是同年的举人翰林，相知甚深，可能结过金兰之谊，一拉便拉来了。由

于蔡的关系再拉杜亚泉（稿科学的），以后再由杜延聘了其他不少人。这是商务最初罗致人才编书的情况。我曾到过蓬路，见到房子里排列着几张小桌子，如同学校里的课桌，显见初办时规模是很简陋的。这大约是1902年的情形。谈到商务编译所，不能不提到高梦旦（下简称高）。高写文章在《时务报》（梁启超办的）上发表，张很赏识，于是再延请高梦旦入商务。高有特长，不但学问好，而且对于出版编辑业务也很精，故以后出版编辑工作，实由高梦旦主持。

英文方面的编辑人员，最初是颜惠庆。颜为沈诒金的女婿，而沈为张的座师。有这个渊源，故颜由沈诒金的儿子沈葆琦介绍给张的。自邝富灼进商务，英文方面的书稿，由邝主持，很有计划，出书不少。其余的还有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陶孟和、竺可桢、周建人等人，也都在商务作过编辑工作，人才很多。

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教科书的起源是由高梦旦去日本考察，回来后搞的。首先延请夏曾佑编历史，夏与张元济、蔡元培都是好友。

和编辑出版有关系的，就是参考书籍。张元济进商务组织编译所后便注意收购书，而收购善本古籍则自绍兴徐氏藏书开头。为了藏书便开辟了一个涵芬楼。1911年辛亥革命后，搜购更多，庋藏愈增，以后（1925年）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对社会开放。

这是我所知道的商务早期建立编译所，罗致人才从事编稿的大概情况。

建立总务处的经过情形

我是民国四年（1915年）进商务的。在此之前，当光绪末年，

我由日本回国，经汪康年的介绍与张元济认识，辛亥（1911年）张曾约我进商务，未去。民国元年后，我在北京任《北京日报》经理、国会议员。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给我一个电报，派李拔可来京与我面约。那时我的报馆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也办不下去，希望他来封闭，但又不来封，只是威胁很大。国会解散，我便摆脱《北京日报》而应商务之约离京南下。记得离京时，筹安会已经演出了。当时中华也来约我，外间谣传中华薪金大，我将去中华，其实中华确实许我月金三百元，而我却应了商务月薪二百元之约，这是由于我与张的关系深，中华要以钱买我是买不到的。

到了商务，每天只是看看各分馆的信札，有头无尾，使我觉得无事可办。有一天我便与张谈，想回杭州扫墓。张看出我的意见，要我说出应办什么。我就提出商务有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如何搞下去，计划从那里来，你（指张）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以我看来应建立一个统一机构，把三所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名称，我最初提出叫总管理处，后来正式定名叫总务处。张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说有了事可办，那么扫墓就可以后来说。这就是总务处这个组织的发起和来源。但是要建立机构还不是很简单的，我和张谈完后，张就把高翰卿、鲍咸昌、高梦旦约齐了五个人一块儿谈。我就自荐抓总务处工作，大家同意，工作由我来承担。讲明三所所长定期叙谈，最重要的是每年订计划，所与所发生关系开会解决，讨论什么事，除五人之外，再通知其他有关的人员出席。对这个倡议，初时印刷、发行二所并不感到有此必要。讨论结果总算大家同意，我拉了盛同

孙参加并在棋盘街三楼开始筹划，正式成立总务处。从此商务才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联系三所的事，开会时三所所长皆出席，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倘若不一致，便将意见写下来或在会外商量，或在下次开会时商量。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订出许多规则来。我在商务便做了这一件事。

我为什么离开商务？这就得提一下商务内部的矛盾。原来商务的主要人物大体上可分为教会派和非教会派两派。最初创办人全是同教会有关系的，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等全是教会中人，张元济是非教会的。开始时张与高冲突较少。我认为高翰卿是个好人，是顾全大局的，但脾气很别扭；而张元济是不让人。我在其间，大家看我是张的人，而且是非教会派，但教会派对我也还是很好的。双方的意见，起初都是一些小事，渐积渐多，例如，张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鲍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张认为总厂在闸北地区易受政局影响，建议分一部分到租界里设一分厂，高、鲍始终不同意。高、鲍的意见是管理不统一。我曾劝张，不要把你的看法教大家同你一致，有些地方可等待一下。那知在1920年报纸上突然登出一则张元济辞职的启事，高、鲍等有些惊慌，于是董事会就去劝张不要辞职，张不能转意。高梦旦来找我，我不作声。的确，这个启事在事先我也不知道，我只对高梦旦说：“且看高翰卿、鲍咸昌的态度”。过一天高翰卿来找我了。我便直截了当的对高说：“你是总经理，你可以估量一下，如果能背得下，那就听他(张元济)辞职，商务还搞商务的”。高说：“事务方面还能勉强凑合一下，但社会文化界，我怎么能号召得了？”我说：

“从张的性格看，要他收回启事而复职，是不可能的。别的办法

让我想一想”。之后，我找高梦旦，我说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张元济辞职（经理），高翰卿也辞职（总经理），找鲍出来任总经理。高梦旦听了说：“叫高翰卿也辞职，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我说：“我不想再留在商务了，既然要走了，那么有什么话不可说，我可以谈。”高梦旦看我肯作这个难事，也同意这个办法了。第二天，我去找高翰卿谈，首先说明我有一个看法，如能同意我就始终其事。高问什么办法，我就说出仿照先施公司的章程，设一监事会，高、张同任监事。高说：“我辞职没有问题，但监事怎么做法，不知道。”我看高对辞去总经理职不拒绝，那就取出先施公司的章程交给高去看看，以后再谈。接着，我就去找张元济谈，告诉他说：“你怎么摆脱得了商务？恐怕晚间作梦也要做商务的梦。”把和高谈的设监事会的办法说了一遍。张没有把我的话闭门拒绝，我想还有一些门道可以挽转。果然，过了一天，高来谈了，说就是这个办法吧。我再去与张谈，张也表示同意。于是高、张同退，同任监事会监事。这件事情办妥了，虽然名义和形式上不同，而高、张仍一起来搞商务，我却觉得自己不能再留在商务了，于是到年底将各事料理后，便离开商务。我既离开商务，张元济要我担任董事，我没有商务的股票，张把自己的股票过了二十股在我的名义下。以后我是商务的董事，仍关心商务的事业。另外有一件事，当我进商务时，曾经向张等说明，不要名义，不要加薪金，故进馆月薪二百元，出馆时还是二百元。大约在我离馆二年之后，有一天高、鲍、夏、张和梦旦一起到我家来，我正不知他们有什么事？张便把来意告诉我，说是现在大家感觉到我倡议建立总务处，有了总务处确是有许多好处，章程案卷都办得很好，经董事会议决送我六千块银元，就作为我以后不

作事的时候的生活费。

对王云五的看法

先谈王云五是怎样进商务的。原来张元济将编译所让给高梦旦后，高担任所长，但自觉不通西文，虽做着而内心不安。民国十年（1921年）高把胡适找到商务，叫胡担任所长，胡担任不了，转介绍王云五来替他。王在中国公学教过英文，胡在中国公学念过书，有此关系而认识。高梦旦是完全不认识王的。只是凭信胡适。那时，我曾和张、高二人谈过，我也不认识王，却有一事告诉他们。我知道冯国璋在南京时，烧过一次鸦片烟，王在外交部派为监督烧烟，结果烟并没烧掉，受了贿在上海买一所洋房。我说王的品德是靠不住的。商务要找一位通西文的，何必找这样的人。张、高没有重视我的意见，把王搞进来了。后来要王云五作总经理，我找过张，问他为什么要信任王。张说还得董事会通过。有一天，张来电话告诉我，董事会已经通过王云五任总经理了。我说，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告诉我也没有多大意思，就将电话挂断，这算我与张在电话中决裂。

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去任国民党经济部长，放不掉商务，保举朱经农接任总经理。朱是朱家骅的人，是无能的，故表面上是朱，实际上王还操纵。张对政治有时也是模糊的，李拔可也不反对朱。后来张元济觉到国民党的局面愈趋恶化，朱既无能，对商务没有好作用，于是在朱要去联合国参加会议活动时，乃决心要朱辞职。这时的时局，商务的人还不明白，我就介绍谢仁冰进馆。1948年我要离开上海，去的前夕，本来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辞

行的，对张我觉得应当善始善终，故去见张，把介绍谢的意思告诉他。

关于夏瑞芳、高梦旦

从商务印书馆的馆史看，我以为夏瑞芳是不可磨灭的。夏能结交张元济，收回日股，都是不容易的。故夏是有魄力有见识的人，也是一个创业的人。夏的长处是有气魄，但有危险性。高翰卿、张元济对他有帮助，三个人合起来，能取长补短，于事有利。

另一位是高梦旦，在商务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出版的基础，成套的规划，高出力不少，我常谈他是参谋长。

史久芸、励刚、陆廷珏等记录

1960年1月17日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
出版事业五十年

徐 伯 昕

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是1932年到1936年间先后在上海诞生的。较早诞生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1932年7月1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先后成立于1935年和1936年。

三书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1948年10月，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三书店完全合并之前的十几年间，在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都作了自己应该作的工作。三书店的同人长时期地同甘共苦，互相砥砺，培育了团结战斗的良好基础。回想起当年的战斗岁月，使人胸怀激荡，感奋不已。

一、患难兄弟 同心协力

三家书店在初创时期，由于各自发展的过程和主观条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三家书店的性质和目标，从根本上

讲是相同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的进步书店。三家书店所致力出版事业，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旧社会，推进革命文化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斗争中必然会遭遇到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打击，遭受到许多无可避免的困难和牺牲，因而三家书店在他们一诞生之后，就成了同命运的患难兄弟。

三家书店在诞生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而外，相同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新知书店在创办时用“募股”方式筹集了六、七百元，生活书店当时曾投资一千元。记得1930年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时，只用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这样开展了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费用，可以算得是白手起家。到新知、读书两家创立的时候，生活书店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业务上也粗具规模了。

三家书店之间的互助合作，有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在初期主要是工作上的互相合作。新知书店创立初期，还没有设立门市部，所出图书完全委托生活书店总经售，这是抗战前在上海时的情况。抗战爆发后，三家书店由上海迁到了汉口，党的长江局决定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在国统区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印行，此事交由新知书店全权办理。事实上，新知由于人手的关系，中国出版社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交生活书店印行的，新知印刷的部分也委托生活总经售。这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三十多处分支店。

后来，新知书店大力发展分店，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汉口撤退前后，新知和生活两家都在浙江金华、丽水设立了分店，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据点。由于这个地区离两家总的管理机构所在地——重庆较远，两家分店的同人同舟共济，共同应付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横加迫害，最后一同安全转移，前去曲江等地开辟新的工作。其中有的人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初期，三家书店同时在大后方增设了许多分支店。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卫戍区宪兵、国民党特务借口检查，到各家书店门市部任意查抄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投寄的邮包被扣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几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宣部又实行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所有这些，引起了三书店负责人的高度警惕，并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生活书店主要创办人邹韬奋同志为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大会上，接连提出提案，据理力争，虽两次提案都在会议上获得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却蛮横无理，对决议置之不理。在这两次斗争中，三家书店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动员和团结了一批出版同业发表声明热烈支持，作为后盾。在舆论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口撤退后，三家书店负责人齐集重庆。开始，生活和读书两家租赁的办公处同在一条巷内。新知的办公用房是生活主动让给的，这样，三家书店负责人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并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期的碰头制度。我代表生活，黄洛峰和徐雪寒代表读书、新知。每次碰头不拘形式，有对形势的分析，有相互的情况通报，有对共同有关问题的商讨，有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研究

对策，等等。这种不定期的碰头制度，一直持续到1941年皖南事变。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由徐冰同志与三家书店负责人经常联系。

二、遭受惨重打击 奔向敌后开展工作

1939年4月21日，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查抄，同月27日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全被洗劫一空，甚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经理周名寰被拘捕，后移送集中营，因受严刑迫害并患病，不幸在集中营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的被封，是国民党反动派将对进步书店采取法西斯镇压的信号，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出版方面提早下的毒手。六月十二日就发生了平江惨案。

从1939年4月21日到1940年4月5日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书店有十六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九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三书店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生活书店第一批十六处分店受到摧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五十六处分支店，除五处是因战局关系撤退外，又有二十多处被摧残，这时全国仅仅剩下六个分店。1941年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六个分店中的五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读书和新知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最后，三书店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保留性的措

施。

可是，在任何压力、威胁和诱惑下，三书店同人人都没有屈服。相反，越是在艰险的环境里，大家斗争的意志越是昂扬，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进步书刊出版工作继续下去。

1938年12月，读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在谈话中，毛主席谈到：“……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谈话时，有谷军在座，他把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庆。谷军即生活书店较早去延安的杜国钧同志。

大约是1940年的初夏，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三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作出的具体安排。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三书店于当年9月中，即派干部李文（生活）、刘大明（读书）、王华（新知）等前去华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设了华北书店。10月又派柳湜、徐律、赵冬垠等去延安建立华北书店。当时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缺乏印刷设备，只能用蜡纸刻写，用有光纸复印，把大本书籍分册印成小薄本子发行。根据地的战士、干部得到一册，如获至宝，争相传阅，直到纸张破损，才肯放手。

在延安，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出版了许多书籍和小学课本。这是三书店合力去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最早的先遣队。后来在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1940年秋季，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挺进苏北，在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海地下党为配合苏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大量输送干部和革命青年去苏北。同时与三书店驻沪人员商量，抽调干部王益、袁信之、张汉卿等先后前去积极开展建店和出版工作。先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以后又在苏中四分区和苏北盐阜区设立大众书店。苏中四分区大众书店后来也改名为韬奋书店。苏北距离上海较近，三书店曾先后以不同形式在上海设联络机构，统一担负同苏北的联络工作，因而苏北根据地的出版工作，由于有后方不断的供应支援，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久。

皖南事变之后，三书店的中心遵照党的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徐雪寒去上海，后来进入苏北。黄洛峰和我同去香港。为使进步书刊能大量地向南洋各地和其他海外地区发行，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两家合作开办了一个光夏书店，负责人冯克（景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战火中光荣牺牲。新知书店开设了南洋书局，负责人是吉少甫。生活书店原有香港分店的设立，在这以前遭国民党特务压迫结业。这时，光夏书店、南洋书局和一家由原来生活书店几个同人集资筹设的星群书店，接替了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工作。当时，韬奋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文艺刊物《笔谈》，连同以上几家书店出版发行的进步图书，对港澳、南洋各地以及其他海外地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9年到1941年，是三书店在国统区同受惨重打击，实行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出版工作基地的时候，也是三书店部分联合的开始。

三、扩大团结 坚持斗争

三书店遭受惨重打击之后，将中心转移到香港，这并非是消极的逃避斗争，而是为了更便于指挥调度敌后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在三书店总的管理机构撤离重庆之前，遵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些紧急部署，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抗战以来的三年多内，生活书店的力量比较暴露，因而考虑在国统区应当化整为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首先把精干的力量和组织机构掩护下来。然后根据情况，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出版工作。

化整为零的具体做法是：更改名称，变换方式，化名自营，或者寻求合作对象，实行投资合营。当时办了一批小型的、有些是专业性的出版社，如学艺出版社、三户图书社、国讯书店等。也办了一些和出版工作有关的中小型工商企业：如三户、建华等印刷厂，重点经营纸张运销的光华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等。这样一些工商企业，从图书出版的原料供应、印刷制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提供了条件。

从皖南事变以后，到解放战争胜利，生活书店在重庆、桂林、上海等地办的化名自营和投资合营的出版机构，以及和出版工作有关的贸易运输机构，共有三十多个。三家书店在以上三地加上桂东、广州、北平办的相同性质的机构，总计有四、

五十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我和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分手之前，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情况，并于1942年8月我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周恩来同志又着重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严格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的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则偏重于出版理论性书籍和现实抵触较少；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更加稳重隐蔽的作法。在沦陷区和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区，也都按照这三条战线的原则部署。为使革命出版工作能够在敌人统治的地区内长期坚持，分三条战线作战，是三家书店共同遵守的原则。

1943年秋，我由桂林转往上海，一直到抗战胜利，就留在上海工作。

1944年5月，日军向我湖南、广西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这时，苏德战争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苏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德国法西斯力量被全部歼灭。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不利。国统区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普遍地不满。重庆、昆明、成都等城市掀起了广泛的民主运动，公开提出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在民主运动的高潮中，以黄洛峰同志为首的三书店留渝同人，包括薛迪畅、方学武、诸度凝、孙洁人、仲秋元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重庆的书业界，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在文化出版方面推行的高压政策，展开了攻势。

在展开攻势以前，为组成出版界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以三书店为核心，联系了二十多家政治态度比较进步的书店，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消息。接着在这一年的12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被推选为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任总经理。1944年5月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联营书店，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书店作斗争。一方面反对垄断印书用的土报纸配售额和不合理的印刷费用的涨价，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保障了小书店的利益；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5月3日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的斗争。这是关系到进步文化事业能否继续生存的大事。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文化界提出的取消审查制度的要求，有些惊惶失措。开始仍然采取搪塞拖延的办法，9月4日由蒋介石在参政会声言要修订出版物与新闻检查标准，想用这一空洞的诺言应付过去。文化、出版、戏剧界看出这是一种欺骗花招。经过多次的斗争，1945年9月，重庆、成都、昆明文化出版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齐心协力地发动了一个拒检运动，即主动不给审查。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形势，内心虚弱，这年秋天不得不宣布于10月1日起废止图书新闻检查。这虽然是一个局部的胜利，但是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的胜利，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

胜利更加鼓舞了斗争的信心。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除重庆而外，还在成都、西安设立了联营书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继续在武汉、广州、上海、北平等地，也设立了联营书店。团结的

书店从二十多家，增加到五十五家。此外还在重庆和上海成立了出版业联谊会，同国民党把持的旧书业公会进行较量，比联营书店的团结面更加广泛。1947年，在上海为争取进口白报纸的配售额以及免征营业税，曾几次派代表团去南京，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御用书店和国民党把持的旧书业公会，越来越孤立，国民党反动派更被广大人民所唾弃。而三家书店的领导骨干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共产党在出版界中的威望不断增高，为出版界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全面联合 迎接胜利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英勇作战，苏联的对日本宣战，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分布在革命中心延安和华北、华中根据地的三书店同人，为进行持久斗争而隐蔽在国统区、沦陷区各个合作单位的三书店同人，以及坚守在出版工作岗位上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斗争的三书店同人，个个欢欣鼓舞，高举双手共庆胜利。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会有更艰巨的斗争即将在面前出现。

1945年8月，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部首先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正式开始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招牌。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同人，闪电般地进行了复店

工作，在吕班路（现重庆路）开设了生活书店门市部，同时成立了编辑、出版部，还请郑振铎先生主编了《民主》周刊。读书、新知也很快恢复在上海印书，以供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知不久也在四川路开设了门市部。三书店的领导中心又集中到上海。由于三书店的共同努力，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马、恩、列、斯理论书籍，都大量印行，陆续和收复区的读者见了面。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上海除了生活、新知的门市部，还开辟了若干新的据点，如化名自营的骆驼书店，专印世界文学名著；还合作办了一个华夏书店，偏重出版解放区的图书。三书店更进一步合作，在北平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长沙办了兄弟图书公司。

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政协决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对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加紧了压迫。这时，党已经派了自己领导的军队和大批干部由各条路线进入东北。三书店也已首先派干部邵公文（生活）吴毅潮（读书）沈静芷（新知）等先后去胶东解放区，陆续在烟台、大连创立了光华书店。并在大连创办了光大印刷厂，大量印书。胶东和大连解放地区的工作开展，都得到当地党政方面的大力扶助和经济上的支持，因而业务上发展很迅速。在解放区第一次印行了《资本论》和《鲁迅全集》等巨著。后来，又在哈尔滨建立了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基地，以供应北满地区对图书的需要。到东北全区解放，在大连、安东、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城市都设立了光华书店，还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区管理处。东北所出版的图书，不仅供应本地区的需要，而且曾一度成为华北几

省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一些新解放城市的主要货源。如果三书店不及早派遣一部分干部去山东和东北解放区，如果没有当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扶助和经济上的支援，我们的出版工作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适应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7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三书店急速派遣干部毕青、欧建新、张炜等一同到石家庄，筹划在长江以北的新解放城市设立分店。1948年12月，在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书局。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就以石家庄为基点，相继在济南、徐州、开封成立了同一名称的书局。天津、北平解放后，又分派干部在两地成立了新中国书局。从此，在华北地区打开了新局面。

这时，展现在革命出版工作者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广阔而又壮丽的画面！

在这以前，生活书店于1942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就利用新的形势，在重庆恢复并加强了出版工作。开始是以峨嵋和文林出版社名义重印苏联文学名著，接着又选印了部分的青年自学丛书。新知以群益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图书。为了加强三书店的宣传实力，于1945年成立了联合出版部，出版了以介绍党的领导人、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民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人民丛刊”，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变本加厉地施加压迫。五月底重庆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元被逮捕，关押进渣滓洞。反动派看到重庆三联书店的同人并未因经理被捕而表现退缩，又派特务到书店抢书，还声明要继续捕人。这时，重庆三联书店不得不停业。仲秋元经多方营救，于重庆解放的前夜获释。

在沦陷区大城市的上海，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公开的敌伪宪兵、军警，实际上是互通声气、互相串联的。三家书店为了保存革命出版工作的有生力量，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是坚决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上海沦陷以后，生活书店立即租赁店面以远东图书公司名义继续工作，后来暴露了又改为兄弟图书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书店已不能继续存在，就把原有的门面改成合资经营，名为新光百货商店。可是，以上海为基地的贸易运输工作，不但没有被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所注意，而且工作越干越发展。皖南事变以后，三家书店都安排了一定的干部力量从事贸易运输工作，先后开辟了从上海到湘、桂，从上海到苏北、胶东、东北解放区的运输线。到临近全国解放时，还开辟了从香港到大连、到天津的运输线。因掌握了从香港到天津沿途情况，曾掩护数百位文化界著名人士撤离香港。那是由三书店负责筹办租用的“宝通号”外国轮船，把这批文化界的人士安全送到天津的。

贸易运输工作，对增加经济收入，度过难关，积累资金，准备恢复书店，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协助解放区解决紧缺物资的供应，做了较有成效的工作。三书店从事贸易运输工作的干部有陈其襄、张锡荣、王泰雷、冯舒之、汤季宏、曹健飞、陈树惠、唐泽霖等，他们经受风险，备尝艰苦，对革命出版工作的保存和发展尽了最大的心力。

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化名自营、投资合营的出版单位，共有十多个。三书店同人也为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做了紧急准备。1948年中，单是生活书店就秘密印制了几十箱图书，寄放在大型储备仓库，准备解放后供应读者需要。因为事前做好这项准备，

解放后新开设的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门市部，都呈现出摩肩接踵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

1946年秋季，内战全面展开，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海外的广大读者，并便于和解放区联系，三书店的领导中心于1947年秋季再一次转移到香港，对解放区的布局设店，分派干部，调度货源，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积极为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好准备。

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三书店全面彻底合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0月2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四、五月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京，决定于8月15日起取消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统一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三书店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来，三书店自己也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爱护，没有在党领导下的三书店工作人员的坚强团结，斗争就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今天，我们不是纪念三书店的功劳，而是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出版事业方面所建立的伟大功绩。

重庆三书店联合时，曾发表告同人书，其中指出：“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在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三联书店这一革命出版事业永葆革命青春。

1982年7月修改于庐山

千古文章未尽才

——我所认识的黄自

廖 辅 叔

1938年5月，记不清哪一天了，我在广州忽然收到老江（定仙）从汉口发出的一封信，说是黄自先生于5月9日病逝于上海。这真是晴天霹雳！想起他“平生风义兼师友”，往事一幕又一幕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当天晚上，我一口气写了八首《望江南》，借以寄托我沉痛的悼念。他，的确是死得太早了！他，应该，而且也必然能为中国音乐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我只有默念夏完淳哭他表兄的一句诗：“千古文章未尽才。”即使他活到今天，也还不到八十岁啊！然而他却只活了三十四岁！然而他的寿命虽然是那么短促，他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却是丰富的。作为作曲家，作为音乐教育家，作为一个人，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黄自，字今吾，1904年3月23日生 于江苏省川沙县一个门口挂着“内史第”的匾额的书香人家。说是书香人家，当然会想到封建文化的传统，可是他的父辈却是属于维新派。父亲黄洪培，前清的国学生，已经开始在当地与人合办毛巾厂，搞“实业救国”那一套。民国成立之后，他是所谓民意机关的参议会的副议长。他的叔父黄炎培更是有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立人。

黄自从小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他的母亲陆梅先，在黄自出生的前两年，即1902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订立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发愤创办了一所开群女校，自己也改名为开群。她经常教黄自唱山歌，背唐诗。1936年黄自为沈心工的《心工歌曲集》作序，曾有关于他儿时学习唱歌的记述：“记得二、三岁时，父亲买了几本唱歌书回来，母亲常抱着我唱那书里的‘摇摇摇，囡囡要睡了’及‘小小船，小小船，今朝聚会赛一赛’等歌。不久我就学会了好几首。……我在小学前后共五年（从七岁到十二岁），这时期中所学会的歌不下五、六十首。因为我自己就很爱唱歌，所以一首首都唱得很熟，就是到现在大致都还能记忆。”关于古诗，他童年学过而又印象最深的是《木兰辞》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他创作歌曲喜欢选用古典诗词，甚至于选谱新作的歌词也比较偏爱具有旧诗气息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从小养成的文学趣味。当然，不容讳言，他童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同时兼有封建思想的说教，如《二十四孝图》之类。

1916年黄自小学毕业。毕业之后，即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当时是所谓“留美预备学校”。黄自在清华前后读了八年。清华由于经费充裕，请了不少知名的老师。中国文学和历史课即由梁启超主讲。记得有一次我和陈田鹤看了话剧《委曲求全》，对于作者王文显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到黄先生家串门，谈起我们看过的话剧和它的作者，经他一说，才知道王文显就是他在清华的英文老师。虽然学习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名师出高徒”这句话也不见得是全无道理的。他初到清华，即参加童子军笛鼓队。此后又在管弦乐队里面吹单簧管，在合唱队里面唱男高音。1921年起从何林一夫人学钢琴，明年，又从王文显夫

人学和声。先是1919年他曾写过一封给他的堂叔黄朴奇，讲到他对音乐的认识以及他自己学习音乐的情况。他的父亲知道了之后，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关切，但是他所关切的并不是黄自学习音乐的进步情况，而是怕黄自误入歧途，为音乐而荒废了正当的学业。于是特别请求黄朴奇写信去劝导黄自，不要为音乐耽误了正事。黄自因此给黄老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这也许可以算是他对童年看过的《二十四孝图》的一次反叛吧。

1922年春天，清华学校假座北京青年会礼堂举行音乐会，黄自担任两个钢琴独奏的节目：帕德莱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及夏米那德的《林中仙女》。1924年，参观北京天坛举行的“古物展览会”，对于展出的各种乐器的构造尺寸，莫不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表现出他对音乐史的兴趣及对研究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这一年他在清华学校毕业。

清华学校毕业之后的下一站是留学美国。当时的公费是不可能由音乐学生的名额的，他在欧柏林大学研习的专业是心理学。音乐只好算是副科。1926年他从欧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由于官费修业年限未滿，于是续留欧柏林大学音乐系专攻理论作曲及钢琴。当时在欧柏林大学音乐系学习钢琴的还有一位女学生叫胡永馥。据胡永馥的妹妹的回忆，胡永馥和黄自可能是1925年已经订了婚约，黄自曾将学校因他“品学兼优”奖给他的金钥匙送给她作为纪念。不幸胡永馥因心脏病于1927年初辍学返国，不久即在上海逝世。黄自得悉胡永馥逝世的消息，满怀悲痛，按照亨德德那段著名的《广板》的旋律配了歌词，谱成一首四部合唱曲，即将乐谱寄给胡家姊妹，请她们在胡永馥安葬时演唱。他的管弦乐序曲《怀旧》本来是用以寄托怀念之情的。他们远隔大洋，

互通讯息，据胡家姊妹说，胡永馥还为黄自的创作提供过一些素材。不料曲未脱稿，人已云亡，《怀旧》变成了《伤逝》。1930年这首《怀旧》序曲将在上海演出，他曾把原稿交给青主，请青主写一篇介绍文章。手稿封面大字写明“纪念胡永馥女士”。青主的介绍文章即在梅伯器指挥工部局管弦乐队演出之前在《申报》发表。青主认为音乐的风格近似勃拉姆斯。《怀旧》序曲中结尾的那段中提琴悠扬而又稍带凝重的音调，作者自称是描写了天堂宁静而又肃穆的气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弦队第一次演奏中国人的作品。中国人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曲家曲终之后在这样的场合上谢幕。

胡永馥逝世之后，欧柏林大学虽然风光依旧，在黄自眼中却随时随地都会引起“物是人非”的伤感。他终于告别了欧柏林，转学到耶鲁大学音乐学校。1929年《怀旧》序曲作为黄自的毕业作品由耶鲁音乐学校及新哈文交响乐队合作演出，指挥是该校校长达维德·斯坦利。据赵元任说，这一届同班毕业的学生中间只有黄自的作品被选到大乐队演出，而且得到了透彻的欣赏。中国留学生凭自己的管弦乐曲获得音乐学士的学位和一笔欧洲学术性旅行的奖金，黄自是名副其实的破天荒。是年6月，离美赴欧，历访英国、法国、荷兰及意大利，然后返国。

他在留学时期的作品，除了交响序曲《怀旧》之作，还有根据英文歌词写作的独唱歌曲三首，合唱曲一首，四重奏一部（未完成），复调钢琴曲八首。由于带有习作性质，所以生前不愿意发表。只有二部创意曲（G大调及C大调）两首曾刊登于1930年出版的《乐艺》季刊创刊号，同时发表了他的讲稿《音乐的欣赏》。

1929年秋天，黄自回到上海，即在沪江大学音乐系任教，10月

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课。一年之后，因应音专校长萧友梅的聘请专任该校教授兼教务主任，辞去了沪江大学的教职。音专校长萧友梅向南京教育部提出黄自的任命的时候，国民党内还有人认为他是黄炎培的侄子，对这一任命提出异议。后来还是蔡元培点了头，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他回国后第一次重要的学术性的讲演是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做的，题为《音乐的欣赏》。他分欣赏为知觉的、情感的及理智的三种。他先从他白居易的《琵琶行》的理解的过程讲起。首先是只因为它“音节铿锵，念起来非常好听”，这即是知觉的欣赏。后来尝过了一些人世的悲欢离合，渐能领会白居易“被谪后自嗟身世飘零的情感”，于是就在“知觉的欣赏”外，又加了情感的欣赏。最后，假使另外有一个人，“非但能领略如我领略音节之美及体会诗人的情感，而且更能明白这诗人为何应用双声及平仄转韵的法子，把金石之声烘托出来。不但如此，他还能够赏识这首诗的结构如何严密精细……非但能使我人觉得江上明月历历在目，得一种适当的背景，而且前呼后应，使这背景有所统一。这个人因为能从技术上领略这首诗的妙趣，而另得一种微奥的快乐，是理智的欣赏。”接着他就说明音乐与其他艺术，如画、如诗、如雕刻等等的差异，认为“欣赏音乐似较欣赏其他艺术为难”，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随作随止，必须具有强的记忆力才行。于是更进一步阐述欣赏音乐的方法，并指出音乐之所以使人得到快感，是因为音乐具备节奏的、曲调的、和声的及音色的美。然后介绍作曲家表现不同情感的方法，使听众对欣赏音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最后指出，理智的欣赏要求我们具备三把钥匙：
1. 明白音乐的种类及派别，特别是纯正音乐及命题音乐的分

别。2. 辨别什么是乐意。乐意是自有个性的精短乐句，它的特性决定于它的长短、节奏及曲调起落。3. 略为知道曲体的结构，并能追溯“乐意”的种种变化而造成精密的结构。这是一篇相当完整的音乐欣赏入门。讲演的时候还不时在钢琴上弹出音乐的具体变化，使人备感亲切。对他学识的渊博和分析的细致，更是惊叹不已。

正是由于他对音乐的欣赏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音乐欣赏课（当时称为音乐领略法）引起了同学极大的兴趣。既能听到名家的作品，又能听到名师的讲解。不过说起来实在是够可怜的，全校只有一架手摇唱机，跟着老师扛上扛下。然而正是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我国音乐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根据佛曲《目莲救母》改编的男声四部合唱。这是按照自然体系的小调式来配和声的，是为民族风格的曲调配置和声的极有意义的尝试。从伴奏的反复和弦似乎是听到了木鱼和钟磬的声音。它发表于《乐艺》第二期，同时发表了它的《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上篇。下篇则发表于《乐艺》第四期。

1930年12月，黄自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毕业生汪颐年结婚。结婚之前，青主曾根据希腊神话写成了一部小说《美神的结婚》，现在就在原稿扉页上写上作为献给他俩结婚的礼物的题词，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自还为这本小说写了一封信给青主，作为代序印在前面。可惜的是，书还没有印成，“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已经烧毁了商务印书馆，原稿也同其他许多书稿一样烧成灰烬了。

黄自在音专住校期间，除了总揽有关教学的一切工作之外，还

担任几乎全部理论作曲的课程,计有和声学、键盘和声、高级和声、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配器、自由作曲、作曲初步、音乐领略法、音乐史等等。他每讲一课,即使是讲过多年的,也必在上课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有时黄师母看见他实在太辛苦了,忍不住问他,这些课已经教过好几遍了,还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准备吗?他却说,光是自己懂是没有用的,只有充分准备好了之后,讲起来方能讲得透,让学生真正吸收进去。有一天陈田鹤从课室出来,笑逐颜开地告诉我,黄先生的课讲得真好,看得出他是认真备课的。老实说,做教师的负责不负责,根本瞒不过学生。例如他讲和声的时候,自己先就一个题目配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和声,启发学生的灵活运用。他讲音乐史的时候总是事先写好作曲家的年表油印分发给听课的学生,然后分段发挥,指出前后的联系及作曲家本人的发展。评价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时候,也总是实事求是地给予全面的评价。例如讲到李斯特,既讲他的慷慨和宽宏大量,也指出他有时不免流于虚伪。讲述作曲家的生平,并不是板起面孔光谈他行事和创作的严肃的一面,而是随时穿插一些逸闻逸事,以加深学生对作曲家为人的全面了解。例如勃拉姆斯一生过的是独身生活,他说他之所以没有结婚,也许就是他对舒曼夫人的Platonic的爱慕的结果。然后就Platonic这个词做一番解释,说它是“柏拉图式”的意思,引申为男女之间一种不掺杂色情成分的纯洁的感情。既说明事情的本质,也对学生进行一种严肃的恋爱的品格教育。勃拉姆斯衣服破了,不是拿针线去缝补,而是把火漆烧熔了涂到衣服的裂口上面去。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勃拉姆斯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天仙,而是同样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课堂的空气也跟着活

泼起来了。

有一年，好像是1932年吧，意大利山卡罗歌剧团来上海演出。虽然这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剧团，但是在上海能够直接看到意大利歌剧，总还是值得外省人羡慕的呢。为了帮助同学们对歌剧有较深的了解，黄自临时开设一个专题讲座，逐个介绍该剧团预定上演的歌剧。这样的例子举起来可实在多。例如吧，作曲系高级班上配器课，总感到乐队的演奏直接听得少，因而缺乏具体的感性的知识，纸上谈兵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黄自看出了学生的难处，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梅伯器，请他让学生们去听乐队的排练。梅伯器居然答应了，还搬出椅子来让学生坐着旁听。这可真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在上海也是只此一家，平时是很难这样通融的。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学生的事情，他就不怕麻烦地担当起来。他曾经不无自负地对学生说过：“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这无疑表明他对工作的负责与自信，事实上这种说法也确实是没有半点夸张的地方。他对待同学的态度也是非常民主的。学生到他家里去，总是毫无例外地受到殷勤的款待。喝茶抽烟都非常的随便。聊起天来，更是海阔天空，从不使人感到丝毫的拘束。黄师母又善于张罗，随时准备一些可口的食品。逢年过节还要亲手配制道地江浙风味的甜茶。客厅布置非常朴素，非常整洁。墙上张挂的全是法书，没有一幅画，也许这正代表了主人的艺术爱好。的确，黄自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写的一张便条给你看了也是一种享受。平时写信偶然也喜欢用平实的文言，很有点苏黄小札的味道。可惜的是“八一三”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把我历年保存的那些小札也统统烧光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战火随即烧遍

整个东北。黄自是最早写出抗日歌曲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抗敌歌》歌词的第一段是他自己写的。原名《抗日歌》，由于国民党政府无耻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取缔抗日的要求，《抗日歌》被迫改名《抗敌歌》。当时音专师生激于爱国义愤纷纷行动起来，又是开会抗议，又是赶写抗日歌曲，又是走上街头宣传募捐。但是日寇为什么胆敢如此猖狂，而且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铁蹄踏遍东北，如入无人之境。谁能够把事变的前因后果明白说出来呢？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报纸上的文章也只限于咒骂日本的侵略，甚至归罪于东北驻军的不抵抗，很少接触到国民党政府招致外患的反动政策的本质。黄自当时曾以清华同学的关系，请了罗隆基来音专做报告。当然，罗隆基过去不是，后来也并不是国民党加封给他，以便作为进行迫害的借口的“罗隆斯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公然在讲坛上指斥国民党对内像是凶神恶煞，对外却是奴颜婢膝，终于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客观上拆了国民党政府的台，总还是有点积极的意义的吧。

在旧中国，一遇到天灾旱涝就兴行救济募捐，鲁迅在他的杂文《我要骗人》里面也讲过他为了不使募集水灾捐款的女孩子失望，如何带她进电影院，买过门票，找回零钱，付给她一块钱作为捐款的故事。虽然他明明知道他那一块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们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现在来了“九一八”，正所谓国难当头，街头募捐又热闹起来了。这次是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也不甘落后。出发募捐那一天，音专分成许多组。我们想走远一点，深入偏僻的地区，稍为扩大一下宣传工作的范围。于是由黄先生带路，领着他的四大弟子——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和刘

雪庵——和我向浦东进发。我们捧着竹筒，挨户劝捐。老百姓捐款是乐意的，有些人也难免发些牢骚，说政府都不抵抗，你们不是白辛苦吗？跑了一整天，黄自始终精神抖擞，毫无倦容，傍晚才动身返校。在归途上，黄自摸摸竹筒，发表了与鲁迅相似的意见，不知道这些捐款会不会真的送到义勇军手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一八”过了不久，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寻衅了。于是来了“一二八”的淞沪抗战。这一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灵了。十九路军将士喊出了广东人拼搏的口号：“几大就几大！”“顶硬上！”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革命老人何香凝写了一首热血沸腾的《赠前敌将士》，黄自立刻把它谱成歌曲发表。不久，又写了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这是黄自作品传唱最多的爱国歌曲，也是艺术上属于高水平的声乐作品之一。

这一年是黄自创作的丰收年。除了上面提到的爱国歌曲之外，他还写了三首艺术歌曲：《思乡》、《春思曲》及《玫瑰三愿》。后来即以《春思曲》为总名将三首歌曲合为一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还有清唱剧《长恨歌》原定计划是分十个乐章，实际完成的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七个乐章。但是它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白居易原诗的主要情节，唱起来并没有引起什么残缺的感觉。这是一部大型的声乐作品，是属于所谓历史的题材。但是作者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其中《渔阳鼙鼓动地来》那一段是借唐明皇的腐败来讽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那管他社稷残”那一句的重拍都加上了强音符号，表达了作者对昏君的切齿痛恨。作为清唱剧，合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也正好显示出作者出众的才华。至于全曲最成功的完美的乐章，也许应推《七月七日长生殿》和《山在虚无缥缈间》那两折。前者的女高音

独唱和男中音独唱，一个唱出了“得宠忧移失宠愁”的复杂的心情，一个唱出了信誓旦旦的爱情的许愿，是带有欧洲歌剧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的风格。到了“举首对双星，海誓山盟”，却出现了五声音阶的音调，可谓天衣无缝的民族化的妙手。《山在虚无缥缈间》是以古曲《清平调》为基础的，富有民族色彩的杰作，也是西洋音乐技巧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弦乐的引子一开头就把听众引入缥缈的仙境，好像是把白居易的诗句“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摄入了镜头。

“一二八”炮火葬送了《乐艺》季刊，青主跟着离开了音专。不久，音专师生又想重整旗鼓，组织了音乐散文社。由蔡元培、叶慕绰分任正副社长，萧友梅、易韦斋、黄自负责编辑《音乐杂志》。原拟的名称是易韦斋提议的《音乐与艺文》，负责出版的良友公司认为这个名称太噜嗦，这才定名为《音乐杂志》。《音乐杂志》出版之前，音乐艺文社还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是1933年3月底在杭州举行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侵入山海关之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蒋介石悍然制止中国军队进行抵抗，以致造成日军直逼平津的危急时刻。音乐会的压场节目就是黄自的《抗敌歌》和《旗正飘飘》。上海《中华日报》为此作了专题报导，认为“悲壮激昂，闻者奋起。鼓舞敌忾，可谓名符其实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自作为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教务主任，竟然亲自担任报幕，而且不仅限于报告每一个节目，而是向听众介绍乐曲的作者与讲解乐曲的结构。这是他继浦东募捐之后又一次不辞劳累的爱国行动。他对人说过：“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再能写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令人伤心的是他只看到全面抗战的爆发，却来不及庆祝抗战的胜利，就过早地离开了人

世！我得到他逝世消息的当天晚上写的《望江南》八首里面有一首也接触到这问题：“中夜起，刁斗正声声。应颤危弦咨后嗣，毋忘家祭告中暗。心事自分明。”“危弦”一词联合用海顿和陆放翁的故事。海顿是在拿破仑军队占领之下的维也纳逝世的。逝世之前，他命家人搀扶着他走到钢琴面前弹了一遍《帝佑我王弗兴茨》的曲调，暗示家人毋忘祖国。我写词的时间并不知道他是在医院病故的，还以为他能像海顿一样在钢琴上传达他爱国的心事呢。

《音乐杂志》1934年1月开始在良友公司出版。一年之内，出了四期，即告停刊。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计有《勃拉姆斯》、《乐评丛话》、《调性的表情》及《介绍给一般听众的五张声乐唱片》等篇。《勃拉姆斯》是为这位与巴赫及贝多芬合称“三B”的作曲家诞生百年纪念撰写的力作。从勃拉姆斯生平的介绍到他作品的分门别类的评价，真是旁征博引，体大思精。关于这位作曲家的性格也有非常生动的描写。那是我国介绍西洋作曲家最有份量、最有水平的专题论文之一。《调性的表情》从理论上阐明各种调式和调性的色彩与表情作用以至转调时所引起的的变化，还举舒曼的歌曲《献词》为例，指出原文歌词的“乐”字原用明朗的大三和弦，到了配合“苦”字的时候，大三度就改为小三度，以适应情感的变化。译文为了押韵，把“苦”字移前一拍，落到大三和弦上面，这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是作者对音乐美学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也是对当时有些译歌的混乱现象的委婉的批评。介绍五张唱片的文章是他眼见当时“无聊的爵士音乐与肤浅的电影歌曲”的泛滥，企图纠正社会上对流行歌曲的不健康的倾向而作的。《乐评丛话》是代表黄自美学思想的一篇文章。似乎他认为“纯正音乐”比“标题音乐更高、更地道，因为“音乐的意义就

是音乐本身”，“她象叔本华说的，‘别自有一天地’”。但是他在《音乐的欣赏》那篇讲演里面却说：“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感于心，故发为音，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他必定无意中将自己的个性和盘托出。我们如其能知作曲家的生平、性格及其所作此曲之理由，那么，我们于他的作品，当可以有较深的欣赏。”接着就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为例，指出他耳朵变聋，同时也感到自己生活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他虽自叹命舛，可是并不为此而气馁，百折不挠，毅然奋斗。”在《西洋音乐史鸟瞰》里面他又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就表现一个时代的生活。”可见他也承认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创作仍然是来源于生活。他的美学思想是矛盾的，倒是创作的实践补救了他认识的偏颇。

他主张引进西洋作曲技术，这是他努力从事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音乐的民族化。他在《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那篇文章里面说：“把西洋音乐整个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因为采取第一种办法，我们充其量能与西洋音乐进展到一样水平罢了。况且这也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不久他们自己也要变新样子。那时我们在后面亦趋亦步，恐怕跟起来很费力吧。所谓‘乡下姑娘学上海样，一辈子也跟不上’。因为‘学得有些像，上海又改了样’。至于闭关自守，只在旧乐里翻筋斗，那么我们祖宗一、二千年来也翻够了。我恐怕也像孙悟空一样再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后他又指出：“西洋音乐并不是全是好的，我们要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该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重。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难怪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他的作品证明，他始终在实践他自己的理论。他

上课的时候也经常提请学生注意民族乐派，如俄罗斯的鲍罗丁，挪威的格里格，捷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创作经验，作为我们创作的借鉴。

从1933年起，除了教学之外，他主要是把精力放在教材的编写方面。6月间，他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与应尚能、张玉珍、韦瀚章合编一套《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并由他们四大弟子各个分担一部分的工作，着重是创作新歌曲。为了适应各班上学学期开学的需要，先出第一册、第三册及第五册，然后出版第二册、第四册及第六册，1935年全部出齐。黄自负责全书课目的设计。书中的文字部分主要由他一个包干。理论部分从音乐的特点分类、音乐的各种体裁、中国乐器与外国乐器的介绍、西洋音乐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流派、中国音乐的起源、各个朝代的不同的乐曲体裁及剧种的演变以至近世音乐的趋势，莫不提挈钩玄，深入浅出地加以论述。同时也没有忘记音乐的欣赏，每一曲都附有简明的介绍与分析，最后还扼要地讲了作曲理论的知识及有关对位、和应、卡农、赋格的实例。全书发表了将近七十首的歌曲，黄自的作品占了十分之四。名义上这部教科书是供初级中学使用的，实际上却远远越出了这个范围。当时已经有人说，要是高级中学能够全部消化就不错了。就我所知，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有些艺术院校的音乐系也把它列为应用教材。黄先生对待工作的态度是近于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在学生方面呢，那可是驽马十驾，还不一定都能够赶上千里马呢。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套教科书，当然是瑕瑜互见。首先是史的论述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群众意见最多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首歌为国民党捧了场；《农家乐》则对农民在反

动政府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的苦难视而不见，反而淋漓尽致地说他们如何的“乐”，如何的“笑呵呵”，“真快活。”这无疑应该批判的。然而这一类粉饰太平的作品在当时可说是并不少见。刘半农就曾写过《一个小农家的暮》那样的诗，把农民的生活说得优哉游哉哩。《青天白日满地红》那首歌相当严重地暴露了黄自的正统观念和软弱性。然而略迹原情，他还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实际的情况是，国统区一切书报都要毫无例外地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出版，音乐教科书一般还要把程懋筠作曲的那首代替国歌的国民党党歌印在前头。黄先生不想这样做，这才拿这首《青天白日满地红》来顶包。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只要看他如何对待在当时“剿共”中心江西南昌出版的杂志《音乐教育》就够说明问题了。《音乐教育》编辑部五次三番地向他约稿，他始终没有给他们寄过一篇稿子。他就是这样“有所不为”的。我们平时在他家里闲谈的时候，是可以随便谈谈国民党的坏话的。谈到紧要关头，他会情不自禁地而且比较率直地说出他的心里话，认为一个人决不能无原则地同流合污，跟那些无耻政客混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他这种有所不为的政治态度，他的学生是信任他的。有这样一件事：张曙被捕之后，家里需要用钱，最后连他的大提琴都要卖掉了。哪里去找买主呢？他的夫人想来想去，还是去找黄先生帮忙，由黄先生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几年来黄自的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了。他先后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音乐委员，南京教育部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及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附属音乐研究会委员，还有励志社的音乐顾问。他在上海工部局任职期间曾经发生华人纳税会提出撤销管

弦乐队的意见。乐队指挥梅伯器虽然演出过黄自的《怀旧》序曲，平时编排节目却根本不考虑中国听众的需要。音乐会节目单上也从来没有印出过一个中国字。所以当华人纳税会提出撤销的议案的时候，虽然这个管弦乐队对中国音乐界来说不能说毫无用处，黄自考虑到自己是中国人，今天面对众多的洋人，应该与中国人采取一致的立场，于是态度鲜明地同意华人纳税会撤销的意见。事关民族大义，是不能模棱两可的。至于励志社之所以聘黄自为音乐顾问，恐怕与音专毕业生华文宪有关。华某通过陈诚的关系当上了庐山训练团的音乐教官，与励志社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音专有些学生是经华介绍参加了励志社的伴食乐队的。华很想拉他的老师来壮壮自己的声势，黄自就被他看中了。虽然他只是挂一个空名，我们总不能不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指出他的妥协性。

1934年10月，上海市教育局为了推广音乐教育，邀请音专担任每周广播音乐节目的工作。音专因此组织了一个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黄自担任编辑股主任。除了安排每周的广播节目及演出人员之外，还在播音的前一天在《新夜报》预告播音节目。《新夜报》为此用大约半个版面特辟《音乐专刊》（第四期起改名《音乐周刊》），本意只在刊登本周播音节目及乐曲解说。不满版面就登些补白文章。到了改为《音乐周刊》之后，它却成了我国报纸上最早出现的音乐副刊，写稿的范围随之扩大。有关于音乐家的小传及逸话，有谈论音乐的小品文，还有音乐常识、名曲笺释、歌剧故事、乐坛消息等等。节目解说每期均由黄自亲自执笔，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大约过了半年，陈田鹤从武昌回到上海，这份工作才由田鹤接手。田鹤接手之后，想到过去是老师执笔的，真是兢兢

业业，不敢怠慢，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后来陈田鹤去了济南，节目解说仍归黄自负责。真是忙不过来，才临时找人写一次。不过经过一年多的广播之后，有些重复的节目已经可以照抄旧文或干脆不再解说，工作因之变得不像过去那么紧张了。

黄自同意撤销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但不是不要管弦乐队，而是想方设法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政府是不能指望的，只能寄希望于找热心的赞助人。——有了！谁？谭小麟！谭小麟是音专作曲系的学生，他非常高兴有人出来倡议。他自愿负担乐队的经费，自愿将他的客厅做排练场。说干就干，1936年11月上海管弦乐团正式诞生了。团长是黄自，副团长是谭小麟。吴伯超和李惟宁分任正副指挥。第一个排练的节目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由于时局动荡，大家都安不下心来，不久就是“七七”事变，接着又是“八一三”事变，再也顾不上乐队了。

编完《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之后，黄自准备再编一套小学唱歌教科书。恰巧1935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征求一部小学唱歌教科书，他于是约同他的四大弟子和我共同准备。歌曲的审定与编排以及讲授计划统统由他负总责。经过约摸一年的时间，全书编定了，也寄出去了。后来听说中英庚款董事会聘请的评选委员考虑到某一入选的歌本未必首首都好，不入选的歌本又未必首首都不好。只取一本难免有遗珠之憾，于是改为按歌评选。评选的结果，据当时《申报》的报导，是我们那一本入选的歌曲最多。报导还说，一俟入选的歌曲编订完毕，即将正式出版。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书却不见出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件事从此再没有任何消息。究竟我们入选的歌曲是哪儿首谁也不知道。最近听说在黄自的遗稿里面发现了十五首儿童歌曲的手稿。其中只有《西

风的话》由于南京政府“取缔”抗日宣传，《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因此抽掉一些“违碍”歌曲，曾被拿去填补空白；《养蚕》及《牛》（合唱）两首曾以不平的笔名在1938年出版的《音乐月刊》发表。其余十二首都还没有刊行过。可能这些歌曲正是应征歌曲的一部分，也不妨假定黄自还有未知的宝藏留待我们去发掘。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还有一个新的转变，那就是开始选用一些比较口语化的歌词来谱写歌曲。《西风的话》及《热血歌》就是明显的例子。他曾对他的学生张昊说过，和声学及音乐史脱稿之后，他要多写浅易的民歌。谁能料到他还来不及写完竟这么早地撒手长逝呢！

1935年秋天，黄自还在创作上开拓了新的领域。第一次是为联华公司的故事片《天伦》写了一首主题歌，即《天伦歌》。为了加强这首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歌曲的民族色彩，他在配器上使用了笛子、笙、二胡和锣等民族乐器。接着他又为电通公司的故事片《都市风光》写了《都市风光幻想曲》。为了具体领会都市的喧嚣，亲眼看一看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景色，他居然走出书房，不止一次地请黄师母陪他去逛夜上海。特别是南京路、西藏路、“新世界”那一带，以便根据具体的实感去进行描绘。一开头那三个独立的减七和弦的全奏，立刻使人感到这人吃人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恐怖的气氛。由于全曲的演奏时间只有五分钟，音乐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未免是美中不足。

这一年他还为他的叔叔黄炎培（发表时署名黄任之）写了一首《学生国货年歌》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社歌《谁养我》。解放前一年，黄老先生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中间有一段是讲到音乐的社会作用的，他于是讲了他们叔侄合作的故事。说“我有侄今

吾，名自”，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可惜他“不幸短命死矣”，言下不胜痛惜之感。

说起黄炎培，我还记得一段故事。1936年，蒙古族的败类德王勾结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巴彦淖尔盟东部），傅作义等爱国将士奋起抗击。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上海各界名流组织慰问团慰劳绥远驻军，黄炎培是慰问团成员之一。回到上海之后，黄自请他来音专做了一次访问报告。他用亲眼看到的事实证明，只要有决心，有勇气，中国军队是能够打退日本的进攻的，日本军队决不是不可战胜的。本来上海经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闸北通庵路一带已经处在日军控制之下。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检查行人。中国人好比是惊弓之鸟，鲁迅在《我要骗人》那篇文章里也曾记下闸北居民因为一个日本水兵被暗杀，弄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忽然乱纷纷地搬起家来，汽车租钱因此一下子贵了好几倍的事实。音专僻处江湾，更是一听谣言，六神无主。黄自请黄炎培来报告绥远抗战的胜利，是颇能起到安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的。

黄炎培来音专演讲的时候，音专从法租界迁到江湾所谓“市中心区”市京路的新校舍已经一年多。黄自一家也早已从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搬到了新校舍附近的邮亭里。江湾的地皮没有租界的那么昂贵，所以屋前有一片相当宽阔的空地。黄自在空地上架起了羽毛球网，有空的时候就打打羽毛球。他虽然文质彬彬，对于运动却还是一个里手。学校组织羽毛球比赛，他也曾报名参加。他说注意身体锻炼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清华学校规定，学生游泳达不到二十米的标准一律不得毕业。他骑自行车的

技术也相当高。有一天下班之后，我们一起推着自行车边说边谈，他手里还拿着一包书稿。他说，手里拿着东西，就必须单手握把上车。我说，那可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才行啊。话未说完，他一个鹞子翻身，已经稳坐在车上了。说到这个所谓“市中心区”，当时上海市政府倒是大吹大擂的热闹过一阵子，说要建设一个“大上海”，江湾被选定为“市中心区”。既然是市中心区，那总得有一些像样的建筑，因此除宫殿式的市政府之外，还修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运动场和游泳池。我们住在那里，生活比较简单，有空的时候就会约同一道去游泳或者看看球类比赛。

由于江湾远离闹市，平时见面的只有音专师生。除非是专程来访的老朋友，一般是不大有人跑这么远的路来随便串门的。因此的确有一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环境安静了，精神也容易集中，黄自于是比较积极地收集资料，为他计划编写的音乐史与和声学做准备。他非常重视卡片的工作。每当谈到著述工作的时候，他差不多总要提一提制作卡片的好处。他认为，要做到翔实、精密和完备，仅凭记忆是不行的，必须多方面援引诸家的论述，巨细不遗地核对引用的材料。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分类卡片可以帮助你节省许多临时翻检的时间和精力。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光为音乐史收集的史料就有两万多件，而且都有批注。其他材料还有音乐史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照年表，音乐家生卒年代表以至详细的中外参考书目。他还以《中国人心中之音乐》为中心辑录了周秦以迄唐宋近八十家的文章诗赋一百七十多篇，因为他预定写完西洋音乐史之后再写一本论述中国古乐的专门著作。凭他积累的资料的充实，加上他作风谨严、修养的深湛与经验的丰富，是不难写出一部超过前人的著作来的。谁料到一切希

望竟然一下子都归于幻灭呢！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改变了步步退让的态度。到了8月8日，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驾着军用汽车猛冲我们的虹桥飞机场，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当即开枪将他们击毙。日军于是乘机扩大事态，空气十分紧张。江湾原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旧战场，黄自一家因此重新搬回金神父路，与父母弟妹住在一起。据黄师母的回 忆，“这时候全家挤在堆满家具的房子里，卧室就成了他的工作室。写字桌旁除了书柜外还加上了小孩的睡床。”不久之前，他已经辞去了教务主任的职务，专任教学工作。为了集中精力写好和声学与音乐史，他早就有不管行政，专心教学的要求。但是促使他决心引退的，恐怕与去年发生的一次风潮不无关系。事情的详细经过我不清楚，只知道声乐系的一些学生忽然不去上主科老师的课，有人怀疑是黄自的一个老同学背后策动。这可使得黄自左右为难了。黄自是相当随和的一个人。我到他家串门的时候，他也谈到过这类无聊的纠纷。为了摆脱是非口舌的旋涡，他只好放手不管，终于决心辞去教务主任的职务，表明他致力教学，不争名位的本意。这样一来他也可以实现长年的夙愿：专心致志地写好和声学与音乐史。

他搬回金神父路后，居住条件比在江湾的时候差多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写他的和声学与音乐史，有时还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几乎是过着闭门谢客的生活。不是事先约好的来客他概不接见。甚至于一听见敲门声就立刻退回室内，尽量减少无谓的应酬。工作累了，需要换换脑筋的时候，他便出去找他的老朋友或同学——其实是他的学生，不过他平时总喜欢以同学或兄弟相称。他是非常关心抗战的前途的，只要见面，总离不开抗战形势，其中

也包括日本的军事力量。他特别熟悉的是日本海军的情况。田汉当时也喜欢写些有关海军问题的文章。有些地方我们看不懂，只要一向他提出来，他总能不假思索地给你讲个一清二楚。原来他对海军是有浓厚的兴趣的。记得在江湾，有一天我们上他家去，他不在家。晚上再去，他说白天是骑车到江边去看一艘美国的新兵舰。因为是新造的，他想看一看新在什么地方。为了让我们多明白一点，他还把新近买到的厚厚一大本附有许多插图的海军年鉴之类的英文书从书房里拿出来，翻出一些照片给我们看，一面在旁边解说。我们对他知识的丰富表示钦佩，他却似乎有点腼腆似地笑着说，“这也算是一种癖吧！”

1937年11月12日，整个上海沦入敌手。租界四面全被日军包围，只有海道可通香港，因此称为孤岛。日军虽然不能公然闯进租界，日本特务和汉奸却在不断制造事端。没有多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遭暗杀。黄自写过不少抗日歌曲，而且通过无线电广播和唱片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毫无疑问也会上了敌伪的黑名单。由于父母都还健在，加上夫人和三个孩子——长子德音只有七岁，女惠音只有四岁，幼女祖庚还不满周岁，一家老小走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有人劝他一个人先走，他又下不了割慈忍爱的决心。正当去住两难的时刻，他得了伤寒病。入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病情稍有好转，能与往访亲友随便谈话了。不料5月8日至9日的深夜，突然大量肠出血。黄自自知病情危急，当下对黄师母说：“你请医生快点来吧，我不能就此死亡。我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事情也真不巧，8号那天是星期日，主治医生不在医院。黄师母忧心忡忡地赶到医生家里，请他提早去医院进行急救。可是医生认为现在不是看病的时间。黄师母急得脆

下哀求，仍然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早，黄先生病情恶化，急待输血的消息传到音专。音专一大队学生在教务主任陈洪率领之下，抄近路连奔带跑赶到医院，争着伸出臂膀请求输血。但是，太晚了！1938年5月9日上午7时30分，一代宗师黄自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黄老太太一声长恸，当场昏倒在地，黄师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情景实在太悲惨了。入殓的时候，音专苏联籍教师苏石林颤声唱着《圣母玛丽亚》，学生含泪和唱。然后是钢琴奏起萧邦的《丧葬进行曲》。明年4月安葬于沪西中国公墓。“音乐艺术在这里埋葬了丰富的财产，以及更为美好的希望。”奥地利诗人格里帕尔策这一句刻在舒伯特纪念碑上的铭文我以为同样适用于黄自。

黄自逝世之后，汉口和上海先后举行了追悼会。延安鲁艺音乐系联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小学在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同时，也举行了追悼黄自、纪念聂耳的音乐晚会。

他的著作生前出版的只有《春思曲》、《爱国合唱歌曲集》及与人合编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长恨歌》抗战期间曾在重庆单独出版，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同样属于未完成的杰作的，是《和声学》及《西洋音乐史》。前者写了三十八讲，后者只写了六章，即《绪论》、《古文化国之音乐》、《最初之基督教音乐》、《复调音乐之兴起及理论之进步》、《中世纪之俗乐与器乐》、《复调音乐之全盛》。其他尚未发表的作品，计有前面提到的留美期间的作品，以及家藏手稿独唱曲十四首，合唱曲一首、钢琴曲一首。历年散见各音乐杂志及报刊的音乐作品和论文也都没有结集付印。只有《怀旧》序曲曾于1958年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刊行了。记得黄自逝世没有几天，音专师生曾在黄自的高足弟子谭小麟家

里商谈过刊行黄自遗作的问题，还成立了一个黄自先生纪念委员会。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头，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里管得上这种“不急之务”。现在时间过去已经四十多年，刊印黄自遗集是不是可以提到日程上来呢？让它作为希望在这里写出来吧。

附 录：

抗 敌 歌

书瀚章、黄自词
黄 自曲

1 = ⁶B $\frac{4}{4}$

较慢的快板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3.5 |

1. 我们
2. 我们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1.3 |

1. 我们
2. 我们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1̣.1̣ |

1. 我们
2. 我们

0 0 0 1.3 | 5. 5 5 5 6.5 | 5. 3 1 ^v 1.7 |

1. 中华 锦 绣江山谁是 主 人翁? 我们
2. (中华) 锦 绣江山谁是 主 人翁? 我们

新强

1. 四四	$\dot{7} \dot{1}$ 万万	$\dot{2}$ 同同	$\dot{5} - - \dot{0}$ 胞! 胞!	0	0	0	0	
3. 四四	$\dot{5} \dot{4}$ 万万	4 同同	$\dot{5} - - \dot{0}$ 胞! 胞!	0	0	0	0	
1. 四四	$\dot{3} \dot{2}$ 万万	$\dot{1}$ 同同	$\dot{5} - \dot{0}$ 胞! 胞!	$\underline{5.7}$ 强虏 文化	$\dot{2}$ 入	$\dot{2}$ 寇	$\dot{2}$ 退 被	$\overline{7.5}$ 凶 焚
6. 四四	$\dot{6} \dot{2}$ 万万	2 同同	$\dot{5} - - \dot{0}$ 胞! 胞!	0	0	0	0	

0	0	新强 $\dot{3} \dot{3}$ 快一 须奋	$\dot{1}$ 致起	$\underline{7.6} \underline{7.1}$ 持久抵抗 大众合力	$\dot{7}$ 将	$\dot{6}$ 仇国	$\dot{5} - \dot{0}$ 报! 保!	$\dot{5} \dot{7}$ 家可 血正
0	$\dot{5} \dot{5}$	6 快一 须奋	致起	$\underline{5.5} \underline{5.5}$ 持久抵抗 大众合力	$\dot{5}$ 将	$\dot{4}$ 仇国	$\dot{5} - \dot{0}$ 报! 保!	0
$\dot{3}$ 暴, 焦,	-	$\dot{3} \dot{3}$ 快一 须奋	$\dot{3}$ 致起	$\underline{2.1} \underline{2.3}$ 持久抵抗 大众合力	$\dot{2}$ 将	$\dot{1}$ 仇国	$\dot{7} - \dot{0}$ 报! 保!	0
0	$\dot{3} \dot{3}$	1 快一 须奋	6 致起	$\underline{2.2} \underline{2.2}$ 持久抵抗 大众合力	$\dot{2}$ 将	$\dot{2}$ 仇国	$\dot{5} - \dot{0}$ 报! 保!	0

$\dot{2}$	0	0	$\dot{3}\cdot\dot{2}$	$\dot{1}$	0	0	0	0	0	$\dot{5}$	$\dot{5}$	
破, 沸,			国须 气正	保, 豪,						身 仇	可 不	
$\dot{5}$	$\dot{5}$	$\dot{5}$	0	$\dot{5}$	$\dot{5}$	$\dot{5}$	0	0	<i>mf</i>	$\dot{5}\cdot\dot{7}$	$\dot{2}$	0
家 血	可 正	破, 沸,		国 气	须 正	保, 豪,				身 仇	可 杀, 不 报,	
0	$\dot{5}\cdot\dot{7}$	$\dot{2}$	0	0	$\dot{3}\cdot\dot{2}$	$\dot{1}$	$\dot{5}\cdot\dot{7}$	$\dot{2}$	0	0	$\dot{3}\cdot\dot{2}$	
	家 血	可 正	破, 沸,		国 气	须 正	保, 豪,	身 仇	可 不	杀, 报,	志 恨	不 不
0	0	$\dot{5}$	$\dot{5}$	$\dot{5}$	$\dot{5}\cdot\dot{5}$	$\dot{5}$	0	$\dot{5}$	$\dot{5}$	$\dot{5}$	0	
		家 血	可 正	破, 沸,	国 气	须 正	保, 豪,	身 仇	可 不	杀, 报,		

$\dot{5}$	$\dot{4}$	$\dot{3}\cdot\dot{2}$	$\dot{1}$	0	$\dot{1}\cdot\dot{2}$	$\dot{3}$	0	$\dot{3}\cdot\dot{2}$	$\dot{1}$	0	$\dot{1}\cdot\dot{7}$	$\dot{6}$	-	0	$\dot{6}$
杀, 报,	志 恨	不 消,	一 群			心 策	一 群	力 力	团 结	团 结	牢, 牢,				努 拚
0	$\dot{5}\cdot\dot{5}$	$\dot{5}$	0	$\dot{1}\cdot\dot{2}$	$\dot{3}$	0	$\dot{3}\cdot\dot{2}$	$\dot{1}$	0	$\dot{1}\cdot\dot{7}$	$\dot{6}$	-	0	$\dot{4}$	
	志 恨	不 消,	一 群			心 策	一 群	力 力	团 结	团 结	牢, 牢,			努 拚	
$\dot{1}$	-	$\dot{1}$	0	$\dot{1}\cdot\dot{2}$	$\dot{3}$	0	$\dot{3}\cdot\dot{2}$	$\dot{1}$	0	$\dot{1}\cdot\dot{7}$	$\dot{6}$	-	0	$\dot{1}$	
挠, 消,			一 群			心 策	一 群	力 力	团 结	团 结	牢, 牢,			努 拚	
$\dot{1}$	$\dot{1}$	$\dot{1}$	0	$\dot{1}\cdot\dot{2}$	$\dot{3}$	0	$\dot{3}\cdot\dot{2}$	$\dot{1}$	0	$\dot{1}\cdot\dot{7}$	$\dot{6}$	-	0	$\dot{4}$	
志 恨	不 不	挠, 消,	一 群			心 策	一 群	力 力	团 结	团 结	牢, 牢,			努 拚	

渐强且渐慢								1.					
力将	6.	7 2 1 7 6	杀头	敌顽	<i>ff</i>	5	3	4	5.5	杀	5.5	敌誓	不
力将	4	-	5	4	<i>ff</i>	3	1 7 6	5.4	杀	3.	1 7	敌誓	不
力将	1	2	5	1	<i>ff</i>	3	5	4	3.2	杀	3 2	敌誓	不
力将	4	2	3	4	<i>ff</i>	5	5	5	5.5	杀	5 5	敌誓	不

1	-	-	0	5.	5 5	2.3	1	-	-	0
饶!				头	颇为	国	抛!			
3	-	-	0	3.	3 5	7	1	-	-	0
饶!				头	颇为	国	抛!			
1	-	-	0	1.	3 4	5.4	3	-	-	0
饶!				头	颇为	国	抛!			
1	-	-	<i>mf</i> 1.3	5.	5 5	5	1	-	-	0
饶!			中华	头	颇为	国	抛!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和高剑父

黎葛民 麦汉永

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在广东国画界中，以陈树人和高剑父两人的代表性较大，他们连同高奇峰在内，曾被称为“岭南三家”。由于陈、高等早期受到日本近代画的影响，并能吸收一些西洋画法，对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因此，近三、四十年间，出现了以陈、高三人为首的革新画派，把广东的国画带进了广阔的写实主义境界。陈、高等三人从前曾印行过画集三辑，统名为《新画选》。笔者黎葛民与树人及剑父相交均在四十年以上，平日对国画的共同研究切磋和私人间的交游过从，踪迹甚密；笔者麦汉永为剑父世侄辈，同时彼此以画人关系，自幼从游，常聆警教，逮剑父晚年，接近的机会尤多，于其人其事，颇知大概。现将各本所知连同方人定、刘群兴、汤卓元诸先生所提资料，合撰此文，以供参考。

一、陈树人的宦海生涯和艺术创作

(一) 峥嵘岁月

陈树人，广东番禺人，一名陈韶，又名陈哲，别号葭外渔。

子，生于1884年（光绪7年，甲申），卒于1948年（民国37年，戊子），得年六十五岁。

树人自幼沉静好学，人颇聪颖，爱好美术。十五岁时（1898年），从广州河南隔山乡的名画家居廉（古泉）学画，当时同学有高剑父、张纯初、陈寿泉、周绍光、梁鹤巢等，树人是年纪最轻的一个。居廉与其父居巢（梅生）都以精写花卉、虫草出名，树人初期学画，受到居氏兄弟的一定影响，同时也为居廉所喜爱，后来便介绍侄女居若文与树人结婚。树人从居氏学画数年，十九岁，自费留学日本，就学京都美术学校。因他是一个破落户人家的子弟，家中无力负担学费，便在华侨学校兼任教师并投稿向报馆来维持学业。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树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京都美校毕业后，回到香港与陈少白、黄世仲等合编《中国日报》和《时事画报》，鼓吹革命。民国成立后，树人曾执教于广东高等学堂及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未几，取得公费留学，再东渡日本，在立教大学专攻文科。“立教”是由美国教会创办，由于校方规定学生必须加入基督教，树人曾受过洗礼。当时，笔者黎葛民也在场参加。尽管这样，树人只在立教读书期间参加一般教会礼拜仪式，归国后与基督教会绝无联系，因此，很少人知道他是基督教徒。

树人之加入同盟会，反映了当时一般爱国青年的热情义愤，他们目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更不甘心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故投身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在树人个人来说，他是受了中山的宣传的感召，所以毅然放下书本，走出画室参加革命。他后来对人表示：他没有预料到推翻清王朝后，中国还是这么混乱，反而受到帝国主义的更加残酷的压迫，而他最初参加革命的动机

也绝非为了做官。树人在1917年，奉孙中山之命赴加拿大主持当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在加拿大时，适发生袁世凯帝制余孽汤化龙被刺事件，树人被当地政府指为主谋，被拘捕。后经华侨和革命党人之极力营救，才恢复自由。

1922年(民国11年)，树人由加拿大回国，适值陈炯明在粤叛变，中山先生避居永丰舰。树人在香港闻变，即回广州，不辞艰险地到永丰舰晋谒中山先生，并要求留在舰上。后来，中山先生认为革命工作应作长久打算，上海方面，是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根据地，因嘱树人从速返港转沪，并派他担任上海的党务部部长。1923年旧历除夕，中山先生率廖仲恺、张继、何成濬、杨虎、陈策、杨庶堪、陈树人等由沪南下，返粤就大元帅职，以迄1924年年底，在这两年当中，树人由于有日夕亲炙中山先生的机会，倍得中山先生的信任和倚重。

(二) 卅载宦情和在政治上的表现

1923年(民国12年)，中山先生重任大元帅后，以徐韶楨为广东省长，任命树人为广东政务厅长，这是树人进入仕途的开端。不久，徐韶楨调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长，树人亦随同调任该部总务厅长兼侨务处长，那时，他刚四十岁。次年，国民党改组，树人被推为中央工人部部长。1926年初，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树人首任国府秘书长。树人在1930年确曾参加过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发起的“扩大会议”，但他始终未有加入过汪的“改组同志会”。1931年11月，国民党举行四中全会，树人当选为中央执委。次年，树人被任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树人后来曾对笔者谈及：他在国民党中，既非改组派，亦非元老派；既不属于胡汉民派，

也不属于孙科的太子派，是一个没有派系背景的人。树人在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后，始终抱着旧社会士大夫阶级“明哲保身”的态度。1931年西南独立反蒋，成立广州国府和非常会议时，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群集广州，积极活动，树人当时反应极为冷淡。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降日本，当上汉奸集团的伪国府主席时，曾设法派人诱树人入伙，他坚决不肯下水。树人性情淡泊，与一般官僚终日钻营利禄、征逐酒肉声色者有殊，公余时只喜欢邀集三二知己在家中小叙，或作郊外清游。当时一般军网、政客聚集的俱乐部，很少发现树人的踪迹。他对一些无法推卸的宴会，也只不过循例应酬一下，许多官僚都笑他“头巾气”太重。

树人在广州担任国府秘书长时，曾以国府名义向高剑父等画家购买作品各一幅，以供陈列。剑父所作《西湖雷峰夕照图》，高奇峰所作《新江白马图》，均系国画。另方君璧（曾仲鸣之妻）所作西洋油画《一树梅花一放翁》，每幅致送酬金银毫一千元。树人本人也捐赠出一幅国画（题名已忘记），不受酬金。其时，汪精卫当广州国府主席，自然得到汪的同意，因为曾仲鸣夫妇是汪最亲信的人，此举无异借高、陈三人的光抬高方君璧在美术界的声誉。

树人任侨委会委员长共达十六年，中间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还都后，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多次更换其政府的人选，树人始终留任。迨1948年蒋政权濒临崩溃的时候，孙科当行政院院长，改任刘维炽为侨委会委员长（后又调为经济部长），树人方改任为国府委员。同年10月4日，树人以胃溃疡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三)作品的风格特色

树人与高剑父、奇峰昆季所写的国画，均受日本近代画的影响，但能摆脱日本画纤弱之气，而另辟蹊径，自成风格。与高、陈同时留学日本习画的还有郑锦（曾任北京美术学校校长）和鲍少游（香港画家），但郑、鲍二人的作品始终被日本画作风所束缚，终身不能自立门户。因之，他们俩人画名亦不甚显，未足与高、陈等并驾齐驱。

树人所写的国画，虽然独具风格，不蹈袭古人窠臼，画面表现的性格极强，可惜缺少惨淡经营之作。原因是，树人从政及搞国民党党务历时卅载，职位虽非繁剧，究亦分去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不似专业画人能殚思竭智于钻研观摩，而不致驰心外骛。大抵每成一幅苦心经营的创作，往往需经年累月的酝酿，树人以从政之身，日无暇晷，不得精心构作，是难怪其然的。

树人平生不好古画，因而临摹古画极少；不仅没有临摹，连古画也没有收藏过一幅。作为一个画家，同时以树人的经济收入来说，原可收罗一些前人名作，以供观摩鉴赏，但在树人的家里却找不出片纸旧画，这是画人中绝无仅有的奇闻。

树人在国画创作方面，始终是努力不倦的，至于他一生曾作画多少，迄今已无法匡计，大抵他写作最多的时候，殆在1946年夏秋之间。在此以前（约1943年左右），他曾到四川峨嵋山一带绘就写生素描底稿数百幅，这是侨委会迁到重庆以后的事。当时侨务工作几告中断，树人益多机会出外遨游。抗战胜利后，笔者黎葛民尚滞居昆明，树人已随政府还都。1946年9月间，树人曾有函致黎，内云：“……巴山滇水，以艺游历，人生以贡献为目

的，所谓息影云者，实疲怯之辞耳。……并悉菊花黄时，可抵白门，握手不远，尤觉心喜。近者于公务百忙中，乃偷暇晷，冒炎氛，伏案伸纸，含毫染素，三、四个月以来，已成百四十余幅，台端闻之，得无晒弟治艺之情愈老而弥热耶！”这次大量的作品，后来并未见他全部拿出来供友辈欣赏，可能在他死后，部分已经售出，一部分由家人献赠给人民政府，另一部分由他的子女保存着。

树人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抗日战争前，他有一部分作品送到法国巴黎及德国汉堡等处展出，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对他所作的《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一画，谓有音乐的节奏。他同时展出了一幅题名《漓江》的山水画（作于1931年），画面山石嶙峋，江水如镜，笔致简净，颇饶立体感。以上两画均刊在《中国现代名画》册内。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时，英国方面曾向中国征集近代画家作品送伦敦展出，树人所作《淡黄杨柳舞春风》一帧，长条凡六尺余；又另有一笔五尺之长竹竿等，在预展中，引起观众极大注意，徐悲鸿等人认为这种奇特风格将会使中国画坛进入新的变革。1947年，南京九大学术团体（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国立美术馆、中央大学、国立美专等）曾为树人举行个人画展会。次年6月5日至14日，广东省民众教育馆曾在香港花园道圣约翰礼拜堂举行“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会”，展出陈树人、高剑父、赵少昂、杨善深、关山月、黎葛民六人的作品。树人所送展品为《魏紫姚黄》（牡丹）、《白荷》、《神骏》、《桃花带雨浓》、《峡江所见》等多幅，该展会结束后，继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展出树人个人的作品，其中《绶带鸟》（也有一笔的长竹竿）、《交芦桥》、《玉渊》等作，颇受观众一致的赞赏，

认为能够突出革新画派的写实风格。

树人写画，还有两种特别的癖性。第一，他每成一画，必先对客人自行赞赏一番，许多同道中人因他有此特性，为尊重他的面子，大家不敢当面批评他的作品。第二，他所写之画，凡是自己认为精心得意的杰作，必题上他的夫人（若文）的上款，使别人不能攘取，所以称得上他本人的代表作的画，过去很少外传。仅笔者所见，像这样的画就不下二、三十幅。从第一点来说，这种癖性不免堵塞了别人批评之门，同时也影响了个人的进步。从第二点来说，自认为满意的佳作不愿流到外间，使一般同道中人，看不到自己佳作，因而也得不到恰当的评价。听说树人去世后，其夫人已将平日收藏的树人的作品全数捐赠给人民政府保存，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并且可以弥补树人生前在这方面的缺憾。

树人一生，除写画及作诗外，其他著作不多。他在日本留学时，曾译过日本的《新画法》一书，于高剑父所办的上海《真相画报》中分期刊出。他的诗集计有：《自然美讴歌集》（蔡元培作序）、《寒丝山堂集》、《战尘集》、《专爱集》，后来，《寒丝山堂集》第三集也统统合并于《自然美讴歌集》之内，成为唯一的合订本。

（四）关于“清游会”及其他

树人自于1923年起进入政途后，虽然公务鞅掌，但未尝放弃写画，有空的时候，便约请一些同道友叙会，互将新的作品拿出来观摩欣赏。最初（约1925年间）仅树人和黎葛民两人常联袂郊游，就地取景写生，广州河南瑶头白水塘附近一带山坟上，乌柏成林，每逢深秋，霜叶殷红，便到该处漫步欣赏。后来，其他

平素知交的书画界中人渐多参加，于是定名为“清游会”，实际上，仅有此称，并无会址、会章和入会形式，来去自由，绝无拘束。初期同游者不过十人，除陈、黎外，余如高剑父、梁培基、简琴石、陈大年、黎泽闾、罗仲彭等，高奇峰间来参加，但因身体关系，不是常到。其后慕名而来者日众，有些大学的师生也请参加，一般为每周聚会一次，多数是茶叙，每次到会的人数都不一定，究有“会员”若干以及他们的姓名等等，现已无法悉记，但初期同游的十人，始终是该会的骨干，很少阙隔过久。清游会的活动以1926—1927年间最盛。当时曾先后游览过鼎湖山、西樵、罗浮、仁化丹霞山和清远栖霞洞等处，沿途写生很多。有一次，参加中山小杭菊花赛会，同游各人曾合作一画，剑父作出豪语说：“希望六十年后游伴都能健在，展卷再写一幅”。1931年以后，树人与黎葛民先后离开广州，余下大部分会员仍以黎泽闾等为首，维持清游会的形式，每周照常茶叙一次，从未间断，直至抗日战争发生，广州沦陷前，会友四散各地，清游会便告解体。由抗战期间迄胜利复员时，因昔日会友泰半衰老或已凋谢，再没有重整旧观。1947年树人由南京回粤不久，曾与高剑父、关山月、赵少昂、黎葛民等组成一画人团体，名曰“今社”，计划将近代广东革新派国画加以发扬光大，征集较佳作品，以备日后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更进而远赴国外展览，惜此计划定出未及一年，而树人遽归道山，“今社”有如昙花一现，从而中辍，实为憾事。

由于清游会的建立组成是由广东革新派的画家所发起，以革新国画的姿态出现，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以后，一直享誉较盛，社会上对清游会画家的观感颇好。凡是谈到新派画，总联系起清游会来，差不多就以清游会的画人为广东新派画的代表者（其实

清游会里面也有旧派的画家)。因此，引起了一些保守派画家的不满，后来更发展为新旧两派的论战（详细情况在本文记述高剑父部分再为介绍）。当清游会最活跃的时候，广东革新派画家成为古典派画家攻击的目标。实际上，树人很少参加论战，对方的矛头都是直指向剑父。

树人与剑父自少年同学画于居廉之门，因同道的关系，交情相当深挚。历来广东的国画界，无论新旧，其气魄都跟北方的画家有所区别。广东方面，居廉、居巢的花卉虫草、苏仁山的人物等，均可称为“岭南派”，并不限于陈、高等氏的革新派和以后新兴的写实派。居廉所作之画，虽气魄稍逊于吴昌硕（浙江名画家，湖州人，1927年卒）之一派，但居氏的体物写生，能独创新的风格，此点又非吴派所能及。从来有名大家其作品不一定尽善尽美，如能独树一帜，不依傍他人门户，开风气之先，已足名世，这也是当时广东革新派画家比诸古典派作品略胜一筹的道理。不过，树人与剑父虽然同属于革新派，但两人作品的风格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各具有强烈的个性，内行的人一望而知该画为陈或高所作，互有短长，识者自能加以辨别。树人在1947年《还乡赠友吟》的组诗中，其赠剑父云：“中兴艺运吾曹责，此日仍难卸仔肩，四十七年余老友，更应相勉惜馀年。”可见两人交谊之笃厚及期望之殷切。

据老画家沈仲强回忆：树人与高奇峰交情亦至深厚，三、四十年间，交相砥砺，莫逆于心。奇峰于1933年在上海病逝，树人与沈同往设奠，曾对沈云：他托奇峰购买屋地，尚欠六百元未还，此事别无人知，该款应该送还高氏家属，以对亡友负责，即此一端，足觐树人之风谊。

(五)生活作风和晚年景况

树人自幼家道式微，求学时代初则工读，继则赖公费以济膏火，远适加拿大时，其家人亦偕同前往，到1923年回国，厕身宦海后，其胞姊陈慈魂医生使营菟裘，在广州河南隔山乡（居廉昔日授徒之所）十香园附近购地数亩相赠，因陋就简，小葺茆亭，名为“息园”。每逢休沐之日，偕同家人到此憩息，并邀约画友诗人小叙。流连竟日，尽欢而散。后来在广州东山辟一小园，名曰“樽园”，小楼一角，陈设朴雅，直至抗战胜利后，罢官回粤，才在东山觅地鳩建洋房一所，准备为退休养老之用，但未竣工而树人已遽归道山。抗战前，树人在南京陵园路22号原有自建房舍，日寇侵占南京时，毁于战火，战后亦无力复建。1947年，他由南京回粤，曾有一个时期借住在康乐村的岭南大学内。

树人一生不娶妾，不治游，平日伉俪感情极为和谐，这是在旧社会做过大官的人当中很少见的。陈夫人居若文虽然不会作诗，但在树人的诗集中，不少记述“录内子语”之作，亦不啻夫妇间之唱和。树人除专爱外，还有许多美德，如不吸烟，不赌博，不涉足花筵，同时不准家人和儿女辈接触赌具。其子女有同学、朋友来访时，树人仅颌首招呼，并不参与谈论，对一般晚辈云：

“你们可以自来自去，自斟自饮；与老人家合不来，我们也不迎不送。”他在服官期间，因公务繁沓，未曾正式收过门徒。1947年回到广州，时已六十四岁，有某金饰店经理之子拜树人为师，曾在泮溪酒家设筵上贄执礼。当时清游会友，不少人被邀参加，但未几树人即告去世，终其一生，并无一个堪称传薪的入室弟子。

树人有子女各三人，长子陈复，于1924年公费派赴苏联留

学。1928年，陈复由苏回国后，住在上海，后来回到广州，为免反动派注意，甚少外出，陈夫人吩咐家里的人叫他“李先生”。1932年时候，陈复还住在东山樗园（时树人在南京侨委会任事），陈复思想进步，坚决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内战。后被盘踞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秘密拘捕，指为共产党人，加以杀害，对外讳言失踪。树人对陈复之死，极其悲愤和伤心，曾将所居小楼题曰“思复”，以作纪念。他还拟作诗百首，以寄对反动派憎恨之意。其首句均为“故园无计避鸱鸢”，所谓“鸱鸢”就是指陈济棠。这一百首诗究竟是否完成，外人无从询悉，但在树人最后遗作《自然美讴歌集》内，一首都没有刊入，可能是当时政治环境恶劣，树人因投鼠忌器，为避祸计，未有发表。陈夫人居若文比树人长一岁，现年已八十余，依三女真魂居广州石牌。树人未能克享高龄，使其画艺更臻精进，是广东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树人晚年作诗，每多消极之句，且时有故国黍离之思，于旧日游伴，拳拳致念。他曾想在此后余生瘁力于国画风格的改革，在他的《还乡赠友吟》组诗中，尤三复致意。除前面引述的赠剑父诗外，还有诗赋赠桂南屏、黍泽闾、陈大年、关山月、陈曙风等人。其赠黎葛民诗曰：“薄名淡利谁如子，猛进精修勿让人，四十年间交谊在，心神无日不相亲。”另《由小港泛舟至隔山》诗云：“几处人家已废圩，长林今亦尽平芜，惟馀一棹清溪水，来访吾师旧画庐。”又《省墓》诗云：“那向松楸认劫灰，劬劳未报一生哀，难堪廿载流亡后，白发孤儿省墓来。”这两首诗可以反映出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和战后在反动派统治下的故乡一片荒凉残败的景象。

二、高 剑 父

(一)青年时代几次求学的转变

高剑父，原名高崙，字爵亭，广东番禺大石乡员冈村人，生于前清光绪2年（1879年，己卯）8月，卒于1951年（辛卯）3月，得年七十三岁。剑父一生浪漫不羁，滑稽玩世，在国画界一向以“剑父”二字成名，外间人甚少知道他原来的名号。

剑父的父亲高宝祥，于前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广州河南蟹口附近布街口大安堂熟药店悬壶行医，家道寒微，收入有限。共生儿子六人。剑父排行第四，伯仲两兄早夭，三兄名冠天（曾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任内充当秘书），五弟奇峰（亦系名画家，与剑父齐名，为“岭南三家”之一），六弟剑僧（在国画界略有名气，早死），六人均一母所出。剑父年仅髫龄，父已逝世，母不久亦弃养。这时，冠天已经结婚，兄弟们仍同居于蟹口。

剑父自幼喜欢“画公仔”（即人像素描），对绘画早有兴趣；弱冠时，曾先后在黄埔陆水师学堂和岭南学堂（岭南大学的前身）肄业，终以个性不接近，均未卒业。由于他天性聪颖，十八、九岁时即在两广优级师范和广东工业学堂授课，但时间很短。剑父年届二十左右，急切专研绘画，苦于没有名师指导。当时广州河南隔山乡有名画家居巢（梅生）之弟居廉（古泉）设帐授徒，但收费甚昂，来求学的，需纳费百金。剑父无力筹此巨款，只好望门兴叹。他有一位族叔高子元，是举人出身，其时充当河南南洲的“局绅”。居氏兄弟亦系“局绅”之一，彼此颇有交情，子元

见剑父颇堪培养，便代向居廉说情，准剑父免费学画。当时居廉的弟子先后计有：陈鉴（寿泉）、陈芬（柏心）、伍德彝（懿庄）、葛璞（小堂）、张逸（纯初）、容祖椿（仲生）、梁松年（鹤巢）、陈韶（树人）、孙淦（志泉）等人，以伍懿庄的年纪较大，陈树人的年纪最小。

居廉以专写花卉、草虫见长，虽能自创一格，接近后世的写实派，但气魄纤弱，还不敢大胆改革。剑父就学于其门下为时甚短，感到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适年长的同学伍懿庄（当时广州所谓“潘卢伍叶”四大望族之一的后裔）对剑父处境和志向深表同情，知他家居湫隘，不便潜修，便将河南伍家祠内花园的一所水亭借与剑父居住。该处环境幽静，藏有许多历代善本书籍、字帖和名画，常有诗人和书画家到此叙集，因而使剑父见闻日广，渐窥宋、元各代名画家的堂奥，并受到了岭南学堂时代法国籍教师麦拉的西洋画风格的影响，写画一变居氏师法，开始以国画革命自任。这时候，剑父的日常生活费用和纸笔绘具等，均由伍懿庄供给。他知伍素好名，又拜之为师，得伍邀约一些画界前辈时加指导。几年之间，剑父的画大有进步，并能别辟蹊径，自成一格。与此同时，剑父还专心揣摩历代著名碑帖，初时摹仿居廉的书法，继乃舍居而学郑板桥，后自成一格，落笔迅疾，如枯藤挂树，饶有画意，故此他作画的题款，别人极难模仿。

剑父住在伍家祠时，与外界人物接触机会很多，不像隔山乡那么与世疏远。当时有一位日本人山本来到广州“游历”，继又在述善小学当图画教师。山本也是比较有名的日本汉画家，时常到伍家的水亭（松落馆）雅集，与广州书画界人士每有过从。山本见剑父书画风格奇特，因而刮目相待，常劝剑父到日本深造，

他还经常抽暇教授剑父日文、日语。一两年后，山本离粤返日，临行前，介绍剑父在述善小学代课，并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嘱剑父到日本时拜访彼邦汉画大师。伍懿庄了解到剑父这种情况，为了在广州名流中博个“义名”，便设法凑集旅费，助剑父赴日，这时剑父已经二十多岁。

剑父在此后三年当中，共往返中国和日本多次，始终未曾正式进入学校研读。有些人说他“留学三年，技乃大进。”并非事实。剑父在日本只是观摩考察性质，并非如陈树人之进校修业，但也确因此认识了许多日本的汉画家，得到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并曾与当时的日本汉画家栖凤等会面，故受日本画风格的影响很深。其后，剑父的弟弟奇峰、剑僧亦因此关系相继东渡学画。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

剑父在日本时（约1903——1905年间），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受其感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时剑父年少气豪，壮怀激烈，愿意担负最艰巨、最危险的工作，为中山先生及黄克强所重视，派他回国，在广东组织同盟会粤会，由剑父担任会长，前后凡八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般革命党人感于势力不足，对清廷高级官吏只采取暗杀行刺的手段，旅日同盟会会员曾组织“支那暗杀团”，以黄兴（克强）为团长，剑父为副团长；继又派剑父回国，担任驻粤暗杀团的团长。这时候，剑父和宋铭黄可说是志同道合。宋系“女敢死队”领导人之一，因此两人不久便同居成为夫妇。剑父主持广东同盟会时，积极发展会员，并组成许多暗杀队和敢死队。通过剑父的介绍参加同盟会的计有林冠慈（原名林观戎）、陈炯明（竞存）、刘群兴（现为广东美协会员）等

人。剑父等在各地寺观、医院、学校、福音堂和村落等处遍设机关，为掩护此项秘密工作，他们在广州河南保安社附近的保光里创办“美术磁窑”一所，实际上是把它作为秘密聚会和制造炸弹的地方。另在该磁窑左近（宝岗脚）挂上“博物商会”的招牌，对外宣称系日本人所办。所有炸弹和武器均藏在窑底，曾被军警查过一次，因隐蔽得法，未被发现。据刘群兴回忆：“博物商会”，以剑父为领导人，同事计有高奇峰、刘群兴、蔡月搓等人。前清末年，剑父等所组织之暗杀团曾拟北上谋炸摄政王载灃，因清廷早有防范，沿途检查甚严，未能实现。1910年（庚戌），曾布置林冠慈负责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时失利，林竟成仁。1911年（辛亥），又由暗杀团派出李沛基担任行炸广州将军凤山的任务。他们在广州南堤的接官亭与仓前街附近，预架铁线横跨路上，把炸弹悬在铁线上（其时未辟马路，故不易暴露），探知凤山乘舆将到，乃将铁线剪断，炸弹跌下果然命中，凤山顿告骨肉横飞，李沛基乘纷乱之际安全走脱。据刘群兴证明，这两件事都是剑父在幕后所策动指挥的。

广州“3月29日起义”之役，剑父曾与革命党人一同进攻两广督署。起义失败后，乔装为小贩，得脱虎口。辛亥武昌起义后，在粤革命党人起而响应，向各战略地点进攻。剑父所率之一部分武装人员曾先后攻占虎门和鱼珠，与各友军会师广州，成立了“海陆军团协会”，剑父是其中主要成员之一。广州光复之初，曾有人提出拟推剑父为广东都督，后来另有一部分人推戴胡汉民充任，剑父便声明自愿放弃。民国成立后，中山先生派剑父组织“北伐军战事写真队”，并计划发行《战士画报》，饬令各地民军领袖分担该队经费。剑父到达上海时，中山先生已辞去临时大总

统之职，袁世凯窃据政权，写真队亦因此流产。剑父对《战士画报》的计划始终不忍舍弃，其后（约1915至1918年间）卒在上海创刊《真相画报》。该报内容已与原定《战士画报》的性质不同，逐渐侧重于综合性的艺术理论报导和有关革新画派作品的介绍等等，同时以影印讽刺时事的图片为多。据闻当时的广东部督陈炯明曾拨公款十万元以作该报创刊之费。

当剑父结束写真队工作，由沪返粤后，不愿长日闲居，表示希望出洋游历。他要求到德、荷、英、意、法、美六国考察美术和工业。时胡汉民方任广东都督，允给以“专使”名义，资助出国。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反动军阀，正阴谋消灭南方革命力量。袁世凯当选总统后，更积极蓄谋称帝。广东方面也出现了革命的低潮，国民党人内部意见极不一致。剑父出国的计划卒难实现。1913年秋，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避居日本东京赤坂时，剑父也到日本，与中山先生一起暂作海外的栖息。1914年11月，中山先生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剑父是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之一。1916年左右，剑父回国，曾一度担任广东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当时其弟奇峰亦在该校担任美术科教员，但两人任事的时间均不甚长。

（三）绝意仕途与处世态度

过去谈论剑父的人将他与陈树人相比，总会说剑父在政治上“失意”。其实剑父一生从来未曾在政治上得意过，故亦无失意之可言。剑父早年，热情冲动，如在辛亥革命前，组织暗杀团、敢死队，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一再被扼于投机的政客，又转以跌宕不羁的态度来处世应事。晚年主持广州艺术专科学校

时，以专志革新艺术自任。曾在校内一些印件中提出，“艺术大众化，大众艺术化”，“要忠实于自然，但不要做自然的奴隶”，“提倡艺术革命是为艺术创造新生命”，“艺术是生活的雕象、现实的反映”，“训练艺术新军与世界艺坛周旋”等口号，可见他年事虽高，对革新艺术的决心，毫不懈怠。他曾对黎葛民说：“树人做官以后，所作之画无大进步，至为可惜。”这未尝不是高、陈二氏中年分道扬镳后产生艺术差距的原因之一。据笔者所知：剑父与旧社会政海人物虽因私谊关系时有往还，但形迹甚为疏冷。他对当权的显贵，很少有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请托。剑父在1923年以后，对参加广州清游会的书画活动最饶兴趣，大有以画终老之意。他自认没有政治党派作背景，也没有经济基础，朋友们也相信他如获得从政机会，肯定会受到排挤和挫折，同时不会有日后的艺术成就。

剑父第一位妻室宋铭黄死后，续娶翁氏。其家人甚少出外应酬。他向不以真实地址告人，原因是怕来客过多，妨碍他的工作，同时为避免求画者常来麻烦。凡遇有客来访，剑父必先从窗口探首暗窥，倘非稔友，概不接见，以省无谓之应酬。纵使不得已而见客，也不愿来客逗留过久。

剑父既早绝仕途，自不能不另谋生计。他过去参加各项工作（如教书及任工专校长，主编《真相画报》，创办瓷业公司等）时间很短，并无多大积蓄。后来所办之春睡画院，仅具规模，非正式立案学院可比，且学生不多，收费极廉，亦难维持生计。以朋辈推测，他下半生的入息，仍以绘画和收租两项为主。剑父一生共写过多少画，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但数量上当比陈树人为多。他一向没有订出卖画的润例，更不肯向有钱有势的打秋风。求画

的人知道剑父的脾性，只婉转送他一笔较高的代价。他是来者不拒，但从不计较多寡。有些大旅馆如新亚、北平等酒店的店招牌都是请剑父写的字，人们均认为别饶风格，但不多遣。

1914年春间，剑父曾与一潮州籍友人合资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一起参加工作的还有刘群兴、陈伯峰、高玉书、布廷森、张菊初、高剑僧等人，其中多属剑父的学生及鼎革前“博物商会”的旧人。该公司设在江西景德镇，由剑父担任经理，以制造出口瓷画及瓷象为主，准备初显身手，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剑父在赣筹备约有半年，大致就绪后，始返粤偕同全体同人赴赣。旧历九月间，阻风于九江之南湖，剑父曾有七绝三首（略）纪其事。另五绝一首云：“折得花写花，折得草写草，一岁一归来，胸中无限稿。”其后，又有《雨夜泊鄱阳湖之大姑塘》七绝一首云：

“啼鹃泣尽五更钟，骤雨声声打漏蓬，幸有故人论国事，联床风雨夜灯红。”又五绝云：“三日连天雨，今朝始放晴，湖光入秋色，雨过万山青。”从上述各诗中，足窥剑父虽未尽忘国事，然亦渐露专志作画之意。剑父平生作诗不多，未有专集刊存，散佚殆尽，此行杂诗九首系刘群兴道上所抄录，至今五十年，已不复悉记。

（四）艺术成就及新旧画派的论战

剑父学画的启蒙阶段，始于居廉。当时古泉老人在国画基础技法方面，确曾对他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剑父渐多涉猎宋元名作，敞开了思想，他既不蹈袭宋元的复古主义倾向，也不满足于居廉画的纤弱拘谨，而提出了国画革新的口号。剑父吸收了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笔法，同时接受了西洋画和日本近代汉画的风格。日本在近几十年间对汉画的革新贡献，引起了中国国画界的重

视，不少画家大胆地提倡“走向现实”，同时对所谓古典派画家的保守作风，给予适当的批判。剑父就是属于坚决主张国画革新的人。据笔者回忆：剑父生平收藏古画不少，尤其喜欢写实派的作品，他撷其精华，去其糟粕，卒能使自己的作品技巧提高了一步，形成了更富于现实意义的风格。

剑父毕生写画，数量无计，始终贯彻着敢于创造，敢于革新的精神。例如他的后期作品《喜马拉雅山的索桥》（旅行印度时所作），完全用的是现代写实主义的手法，突破了国画家过去复古的、抽象的藩篱。又如，抗战前他曾写过一幅《昆仑雨后》（此画已印刷刊出），画面一片烟雾，以简单洁净的笔调把昆仑山雨后的景色描绘得十分逼真。曾有人称此为国画“朦胧派”的嚆矢。又如，有一幅山水画，在山水的上空，有一架飞机在翱翔着。当时许多人见了，都叹为奇观；另有《耕罢》一幅（刊于《中国现代名画》集内），以简朴的农村为背景，突出了耕牛在劳动后的神态。这些都是古典派画家所不敢尝试的事。总之，剑父的成名绝不是偶然的，他能独树一帜，向写实主义道路勇敢迈进，中国画坛也受到他的一定影响。

剑父写画最爱用山马毛之类的健毫笔，原因是他在画面上常会表现草草几笔的大幅人物、花草、木石，借以发挥“破笔”的特点。一般画家习用的“兼毫笔”（刚柔各半的羊毫紫毫混合笔）虽也略备一格，但不常用。他的书法，奇特怪峭，是用渍满墨胶的破笔来写的，骤看起来，似乎用的是捶碎的嫩竹。

剑父自绝意仕进，专志写画后，初期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赁一小楼，楼上有两室，颜曰“怀楼”，与乃弟奇峰对门而居。兄弟俩闭门作画，平日甚少晤谈（当时两人均未与家眷同住）。后来，

在文明路定安里租得一屋，原名“春瑞草堂”，亦系兄弟同居。剑父取诸葛亮“草堂春睡足”诗句之意，创办“春睡画院”，自任院长。开办数年，又迁往东郊花园（东校场附近），嗣购到朱紫街山庄，由是春睡画院院址乃告固定。画院近于私塾性质，不公开招生，用传统的带徒弟办法授课，亦讲授素描、写生、临摹、构图、取材等画学理论。学习期限并不固定，收费亦甚随便（以学生经济能力而定，一般均甚廉）。学生有时多者十余人，少者仅数人，相当于一个私人的研究院。前后在春睡学画者约有三、四十人。目前广东新派画家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苏卧农等，都是当日剑父的门人。此外，据笔者回忆，从剑父学画的还有：招晖堂、何磊、赵崇正、何炳光、李抚虹、李文珪、伍佩荣（女）、罗竹萍、卢传远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春睡画院改为“南中美术学院”。嗣剑父又在光孝路的光孝寺内开办“广州艺术专科学校”，但均时间甚短。

1929至1930年左右，剑父曾应印度美术界的邀请，旅行印度，连同往返途程，约历时一年，据闻旅费系由教育部及中央大学等单位补助。他在印曾攀登喜马拉雅山，搜景写生。有一次，不慎蹉跌，把足踝扭伤，曾有一个时期扶杖跛行。回国时，已完成素描画多幅，并带了许多喜马拉雅山上的大片树叶回来，分赠国内亲友。在此后几年间，剑父一方面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的国画教授，同时又兼任广州中山大学的国画教授。事实上，他却常住南京，很少回广州授课。

1926至1927年间，广州国画界出现了新旧画派的论战，曾持续至两年左右。剑父属于所谓新派的代表，对手是“广州国画研究会”（设在六榕寺内）的赵浩公等人。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多系古

典派画家，剑父兄弟及陈树人等新派画家都没有参加。当时一般旧派画家墨守古法，反对革新，因之对剑父等人和新派画家，时加攻击。大意说革新派画家的作品是抄袭西洋画与日本画得来，不算国画的“正统”。当时新派画家起而反攻，他们指出古典派画家的复古、摹古偏向，足以妨碍艺术的进步。说他们由于忽视了一切客观的现象，写出来的东西流于概念化、抽象化，脱离现实生活，崇尚形式，缺少艺术的生命力。初期，这种论争只发生于平时画人的会晤场合和传授门人的言论中，后来便发展到报纸、刊物上的公开论战。1926年初，广州越秀山举行游艺会。会内设有书画展览部，剑父授意他的学生方人定写了一篇题为《新国画与旧国画》的论文，在《国民新闻》日报的文艺副刊专栏刊出，指出旧派画家陈旧保守，一成不变，脱离现实；而新派画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而呈现了新的内容，走向现实。同时，文章中列举二高一陈为例，说明新派画的成就。该文发表后，旧派画家大为不满，便由潘达微授意王般若执笔撰文反攻，力诋高、陈诸氏作品是抄袭外国风格，不算国画正宗。论战甫经展开，剑父因筹办佛山画院事赴日本，半年后方返广州。其时论战尚未休止，剑父也亲自出马参加。后来因双方争取广州美术展览会的主办权，更发展为剑父与赵浩公二人之间的直接对垒。总之，这次新旧画派的论争，反映了一部分画人太过保守，食古不化；而另一部分画人则要求进步，大胆改革。这个问题当中，还多少具有同行相轧和意气用事的因素，主要是由剑父所引起。当时剑父曾对人说过：

“当前国画界暮气沉沉了！”国画研究会的人听了很不服气，对剑父极为不满，便多方加以攻击。革新派画家的作品颇受社会人士的欢迎，在舆论上占了上风。而且历年以来，有关美术团体的

活动和领导工作，差不多统由剑父一人包办。如他曾先后担任广东美术会会长、西湖博览会专门委员兼美术馆审查委员、中印美术展览会副会长、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审查委员、英伦国际艺展会专门委员、各大学美术教授等等，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嫉妒。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广东国画研究会和革新派的画人，大部分仍然重聚于广州。这时候虽已停止了论战，但彼此心中仍存有芥蒂，绝少过从。未几，赵浩公去世，其家人循例将讣告派送与剑父。由于他们两人是过去双方论战的主将，大家一向感情不睦，避道而行，剑父接讣后，颇觉踌躇，曾问麦汉永应否前往吊唁，麦答以论战观点不同是一回事，作为同行的画人存问生死又是另一回事。结果，剑父翌日即亲临祭奠，神态哀戚，旁边的人说，这才是艺术家应有的风度。

(五) 平居生活和晚年

剑父身材短小，目患近视，平生自负聪明，行为疏放，不修边幅。他经常爱穿西服，把两袖截短。据他对人说，是为了方便写画和举手。长年无间冬夏，一向不穿袜子，只穿一双长统的黑皮鞋。他极少缝制新衣，所穿衣服多数在广州四牌楼估衣店买来，并不计较精粗美恶。

剑父一生俭朴，生活简单，自奉甚薄。室内无时髦陈设，举凡收音机、电风扇及稍新式的家具均未购置。其澳门提督街之寓所更为简陋。有钱到手便搜购古画和书籍。平时很少喝酒，卷烟则戒买不戒抽。出门时，口袋里常忘记带钱，与朋友小酌或茶叙，多系别人会帐。由于他生性过尚，据说在工专校长任内曾因节约开支问题同学生发生过矛盾。他自认生平无一特别知己。剑父

的私人产业，早期由学生汤建猷代为经营。汤比高早死，又由另一学生叶永青帮忙。其他如汤卓元等与剑父较多接近，亦每代协理私事。

抗日战争前，剑父常约麦汉永到广州新堤一带的小食摊子吃“姜醋猪脚”和卤汁鸭头鸭翼，箕踞道左，谈笑风生，高兴起来便走下堤边的小艇，泛舟中流。他在家里也偶然会招待最相熟的朋友吃一次便饭，饭菜和食器都很简陋，但他却用“公筷”办法，每人摆两副羹筷。他出外吃东西的时候，就完全不讲究什么了。他最喜欢到“地档”、茅寮之类吃杂食，每约麦汉永作伴吃广东的“鱼生”，麦嫌不够卫生，剑父说：“滋味在于桂末”。壬癸坊的狗肉食肆也常有他的踪迹。虽然他五十以后已自称好静，信奉佛教，曾自刻有“剑父皈依记”、“佛弟子”等印章，还多次写信给黎葛民托购《唐代高僧诗集》，但对狗肉仍然嗜食如故。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投降前夕，剑父避居澳门。当时盘踞广东的敌伪组织曾派出专员通过澳门当局，要挟剑父选择部分作品带到广州举行画展。剑父不为所诱，一早便与学生汤卓元、竹庵和尚等离家，躲在十月初五街的天海茶楼暗隅，竟日不敢返家，如是者多天，待敌伪专员走后才再露面。抗战胜利后，剑父回到广州。由于年事日高，加以长期患着泌尿系病（战前曾在北平协和医院疗治多月），不象以前的饕餮，他自称兼患糖尿症，常约麦汉永到广州西濠口某西菜馆进食，同时必购麦麸制的黑面包带回当饭吃。在晚上时候，他多数找麦汉永作伴，在占元阁、菜根香等茶楼小坐。剑父自感年老体衰，曾将自己的生平事迹告知胡伯孝，托胡预写其“行状”。胡所作初稿，仅叙其任事经历，词多褒美，现已找不出来。

1948年旧历8月27日，剑父七十初度。广州美术书画界同人曾在文明路广东文献馆内叙餐，庆祝他的生辰。1950年，剑父七十二岁生日，香港的书画界也设席金陵酒家为其祝嘏。自此剑父长居澳门，久不写画。1951年2月间，笔者黎葛民曾函剑父勗以回国重振画坛。嗣接复函云：“来翰语重心长，且感且愧。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初拟作归耕，亦‘报老乡园得荷锄’之意，奈病骨支离，欲荷亦不胜其荷矣。三个月前，拟在澳办一大学，内设美术院，请老弟主持。嗣以身体、经济关系不果，然未尝一日忘怀，须俟诸异日可也。”岂料剑父此函，竟成绝笔。1951年3月间，剑父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年七十三。遗孀子一，名励节，翁氏所出。另继子一人，继女一人名丽华。他的作品流在国外的究有多少，已不可考。仅知简又文（前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广东文献馆长）曾先后在各处搜购到剑父的画一百多幅，在澳门筑室贮存，名曰“百剑楼”。

（1965年 邱平整理）

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

曹 禺

二十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过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演“新剧”起源于张伯苓先生。他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时就提倡新剧，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

我大约在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参加者有仇乃如、吕仰平、陆善忱等。我也演过陈大悲的戏，如《爱国贼》。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写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认真，费时两三个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胁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那时正是褚玉璞当直隶督办，正当我们准备上演时，一天晚上张伯苓得到通知说：“此戏禁演”。原来这位直隶督办自认是“国民公敌”，认

为我们在攻击他，下令禁演。等他倒台后，此戏才得以演出，很受欢迎。

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我演《新村正》，这是南开新剧团自己写的剧本，故事情节我忘了，记得我还改写过一遍。那时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同台演戏的有仇乃如。华午晴先生搞的舞台布景。

南开新剧团经常介绍外国戏，有的加以改编，成为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国化了，但主题思想不加更改。这样做，是为了适合我们的舞台条件和观众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编过十七世纪法国伟大喜剧家莫里哀的《吝嗇鬼》（即《悭吝人》）。戏名改为《财狂》，由我扮演主角，并请曾在外国学过建筑学、“新月派”文艺团体的林徽音女士负责舞台设计，那是很讲究的，布景是写实主义的，在业余剧团中算是很好的了。

改编本把原来五幕缩为三幕，把原剧的主人阿尔巴贡改为韩伯康，艾利丝改为韩绮丽。《财狂》在南开中学瑞庭礼堂公演，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还出了纪念特刊。我们演《财狂》时，郑振铎、巴金、靳以都由北平来看戏。此外我还导演过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英国人高尔斯华绥的戏《斗争》，是写工人罢工的戏，改编后改名《争强》。这出戏写劳资斗争，最后双方都妥协了。我演资方的董事长，张平群演工人代表。那时我思想落后，高尔斯华绥

这个戏是宣扬劳资合作，号召妥协的。

南开中学新剧团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原想学医，两次报考协和医学院，都没考上；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学政治，但是学不进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华大学时，我得到图书馆的许可，可以进入书库，在那里浏览较广，从有关先秦哲学的简单著述，到浅近的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更多的是读中外文学和戏剧书籍。由于南开和清华大学的环境，我得到一些知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启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

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十五岁至今天（七十二岁），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演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张彭春去美国时，给我留下一套英文的《易卜生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大部分我都读了，有的太深，不大懂，没读。那时我太年轻，还在中学，英文也不好。易卜生是“近代戏剧之父”，近代戏（也许除去现代各种流派的外国戏）无不受易卜生的影响。他不仅是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和写戏方法，影响极远。他是一位戏剧大师。

体验生活是近来才有的词，我写《日出》、《雷雨》当然也得体验生活。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

戚、朋友、社会上的事。有人说《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写鲁贵的家，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东车站），一道铁道栅栏门以外的地方，过去那个地方很脏。《雷雨》的剧本最后是在清华写完的。

《日出》一剧，事情完全在天津，当然和上海也有关系，如写交际花一类的事。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动刀杀人，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不过很难。《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东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时盖房子，打地基，没有机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也满有劲。他们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兴打趣的内容，有领唱。我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写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编的词。

天津的话剧活动并不只是南开中学一家活跃，很多中学都在演戏，汇文中学，新学书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子学校都在演。黄佐临是新学书院院长，他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他的女友丹尼用英文演莎士比亚的《如愿》，由他亲自导演，还请我去看过。

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1915年南开学校十一周年校庆时，他

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来小十二岁，在学校时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见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时南开中学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台。再早的时候，革命党人王钟声，1907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剧团“春阳社”，上演《黑奴吁天录》。1909年带领剧团北上，曾在日租界下天仙戏院演出《爱国血》、《秋瑾》、《徐锡麟》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凯的戏。这些戏都是刘木铎编写，由王钟声演出，极受观众欢迎。这是天津最早的话剧运动。后来王钟声被袁世凯的亲信张怀芝杀害。

新剧原是宣扬“文明”的，不唱。他们认为京剧内容封建，“不文明”。“文明戏”的内容是革命的，反封建的。“文明戏”就是中国的早期话剧。

天津是革命话剧发祥的地方，对戏剧发展很有贡献。当初搞话剧运动资料的同志们不知道北方也贡献不小的力量。周总理曾经一再对我谈，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没有做。现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周总理也和戏剧家凤子谈过：“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

张伯苓主张搞新剧，很不容易。那时有人认为搞新剧是下流的，可张伯苓却认为新剧和教育有关。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材，天津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值得一提的。

（访问记录，业经本人审阅。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南开剧话拾遗

黄宗江

我在1935年夏入学南开，编在高一五组。上完了高二，即1937年夏，适逢“七七”事变，南开关门，未得毕业。我在南开中学上过两年学，两年的时间在一生中并不长，对自己却深为重要，正是在南开这样一个环境中形成我一生从事戏剧包括电影的一个起点。

我当时并不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的老同学，并且是学生戏剧运动的主将，却已经知道曹禺同志是校友并引为榜样，因为他的《雷雨》已经斐然于世了。在初版《雷雨》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这一类的字样。我不禁向往我私淑为师之师是什等样的人呢？到了南开以后就见到了，张彭春乃张伯苓校长之弟，行九，人称“九爷”，学生们背后就呼之为“张九”。张九长得很神气，用学生的话说，很“牛气”，也确乎很有学问，是南开戏剧活动的核心人物。他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土耳其大使，投身官场，也就不大为人提起了。

约在1936年或春或夏，我在南开中学的瑞庭礼堂看到了鼎鼎大名的南开剧社演出由莫里哀的《怪吝人》改编为中国国情的《财狂》。张彭春导演，林徽音舞台设计。舞台裸露，不落幕，敲台板灯亮开场，大概是来自法国的一种古典演出形式。万家宝（曹禺

原名)当时在别的学校教书,做为校友返校演主角“财狂”,演的可棒了,我至今犹记得他一双不大的眼睛闪闪发亮,盯住台下的观众说:“谁偷了我的钱呀!是你?是你?……”同台的多为老师,记得有陆善忱、吕仰平……,女主角是鹿笃桐,是方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年轻的生物老师,还有南开大学的有名的“海怪”严仁颖。高班同学有徐兴让、高小文……。戏散了,我还恋恋不舍,躲在台底下看他们拍照。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叫《初恋》(载拙作1948年出版的散文集《卖艺人》),说的不是儿女之情,而是自己对舞台艺术的“初恋”吧。我写道:“戏演过之后,好几个黄昏,我徘徊在礼堂旁白杨树下,是什么使得我这样迷惘?……”

不久,我也登上了那个瑞庭礼堂的舞台了。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南开剧社,却也一脉相传,是1937年毕业班的演出,我做为低一班的同学被邀参加。演的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吕仰平老师导演。他可是正经八百的南开剧社的演员,曾参加《财狂》等剧的演出。演男主角的是高小文,此人后来不知其所向。演反面主角的是我密友张福骈。我演的是女主角司铎克夫人。当时学生中的评论家王松声(现北京市文联秘书长)曾在校刊上写文章,居然提到如今有时已被称做“黄老”的我,“背影有如希腊女神塑像”云云。曹禺当年,在学校里就演过易卜生著作《娜拉》中的娜拉,据说精采乱真。王松声且誉我为“万家宝后南开最佳女演员”。南开中学男女分校并男女分演,男演女和女演男有其传统。据说,抗日战争时在重庆,一次老校友周恩来对老校长张伯苓说:“我对南开有意见。”张校长有些紧张。周摸着胡子拉碴的脸说:“叫我演女的!”周校友大笑,张校长释然。

提到重庆,有一台戏可补一笔。南开迁校重庆后称南渝,

1943年夏为张伯苓校长祝寿，学生演出了老舍、赵清阁编剧的《桃李春风》。沈剡导演，蓝马和我被聘为艺术指导。沈、蓝这两家伙以“为校长祝寿”为名，临时把我推上台去演了个醉汉，幸亏可以醉遮丑。同一晚会，同台的还有名票友张伯驹，张伯驹在《盗宗卷》中饰张苍。可惜当时重庆的观众多半只认得配角的丁英奇，并不熟识杨小楼为他配过马谲，余叔岩为他配过王平的诸葛亮张公伯驹。诸戏迷当知这一台戏也是难得的了。

如今伯驹老人已逾八旬，我亦花甲，居然也轮上我为“文史资料”提供见闻了。学生戏剧是中国的戏剧运动亦即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南开更是一大根据地。周恩来同志逝世后有一些文章谈及他少年时代的戏剧活动。主将如曹禺等同志当更有可阐述。我只能略记少年时所见所闻所历，既做资料，不嫌烦琐点滴，惟求纪实。中国的文史资料真是浩瀚，可是湮没得也够呛了。七七事变南开遭炮火，不久之后，我在法租界天祥市场最高一层专卖旧书以及淫书的摊子上，发现了一大批盖有“南开剧社”印章的戏剧书刊，我弄了点钱扫数购下，视为珍藏，不幸1939年天津大水，荡然无存。我十分痛心记得内中有南开早期重要剧目，周恩来参加过的《一元钱》，曹禺参加过的《争强》、《新村正》等等。这些宝贝不知世上还有没有？还记得有一本戴望舒译的《麦克卑斯》，金色封面，近期《读书》杂志所列望舒书目尚无此书。我查询了北京图书馆与北大图书馆，均有目无书矣。念及水火人劫，能不珍惜点滴，书此拾遗寥记万一耳。

1981年10月17日拂晓，正南开校庆日。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往事追忆

——上海租界捕房的狱卒对我的“训诫”

黄 药 眠

1929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我第一次被捕，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看守所里。

那时候党中央虽由向忠发挂总书记的名，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工作。当时，经常让同志们去举行游行示威；由于规模不大，时间很短，所以取名叫“飞行集会”。就是每人带一批传单，事先约定时间，到上海马路上人多的地方，在约定时间以前十分钟，通通都得到指定地点附近来回地走，时间一到，放爆竹为号，大家就聚到一起，高呼口号，然后向周围的人们散发传单，同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主义万岁！”等等，有些人手里拿有砖头，遇有公共汽车停下，就去敲破公共汽车上的玻璃。这样一来，很快就有警察或外国租界当局的巡捕、红头阿三（英租界雇用的印度北方少数民族的人，上海话叫他红头阿三）等等骑马赶来冲击，于是我们就分散到各条小街去。集中也好，分散也好，都利用机会把传单塞到行人手里，或者三五张一起撒到空中。一开始，马路上的来往行人都很惊异；对于传单，有些人接去看，有些人就不敢要，塞给他也给甩掉。这样一般持续十至十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当时大家都叫他“飞行集会”。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大约每两个月有一至二次。

我当时在上海有公开职业，本来不应该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这样容易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于开展工作不利。但是，李立三的中央领导一定要所有党员都去，我们这样的人也就只好都去了。当时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人：一是老孟超的老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在哪个学校读书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她最勇敢，马队冲来了，人都分散退走，她却敢迎上去，并把传单送到“红头阿三”的手里，于是警棍就打过来，她有时能逃脱，有时就被抓了去。再一个是蒋光慈，他是每当约定时间刚到时才出现。穿着西装，还带个漂亮的姑娘，拎着一个手提袋，马队一来，他们首先就溜进咖啡店里去了。当时，基层单位的党员们对他很不满意，说他不是来参加示威集会，而是带女朋友来喝咖啡的。在事后党的小组会上对他有所批评。今天想来，这样的飞行集会让有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去参加，本来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对党的工作不利。

有一次，我们正在集会，马队来了。我一面向后退，准备往小街走，一面散发传单。这时身边走过一位老太太，我就递给她两张，她不要，并且挡开了我的手。正在这时，左边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正想用右手去解脱左手，右边也来了一个人，他们一起把我押到巡捕房，关进看守所里了。

这个地方很特别，不是正式的看守所。这是一个穿房，两边都是房子，中间有个过道，经过天井，通到另一座房子去。他们用粗木栅把这个过道栅起来，中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当作临时看守所。我被押进来之后，过了几分钟喘息方定，仔细看看周围，

一起被关押的大约有四十来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与我差不多，是撒传单时被捕的，其余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小偷，也有抽大烟的。有几个人我是认识的，但也不便打招呼。这里没有床，只有些草蓆子，大家就坐在蓆子上。由于是临时栅起的看守所，这里没有小便桶或粪桶，不久就有人叫着要去小便和大便。一个看守人在栅栏外边坐着，四十多岁，脸色灰暗，还有些憔悴，很像个抽大烟的。远处离他三十来米还有个背手枪的岗警。看守所里不时有人喊道：“班长，我要小便”，“班长，我要大便”。他半闭着眼睛，抽着旱烟管，木然不理不睬。

过了一阵，没想到他忽然开口发表了一通长篇议论，他很以为自己理直气壮，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愚蠢、无知、顽固、可恶！他半睁着眼睛看了看我们说：

“你们生活得这样好，穿着西装革履，手臂上挂个漂亮的‘密斯’，经常去西餐馆吃大菜，还不满足！闹什么共产共妻！有这样好的密斯，穿着高跟皮鞋，走起路来格登格登，还要共人家的妻，你共谁的妻呀！象我那老伴你去共吗？我看你们是享福享过了头，头脑热得发昏，才会搞出这么些无缘无故的奇奇怪怪想法。

“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拿个小旗子就能把帝国主义打倒啦！当年，李鸿章的军队好不厉害，还有义和团作战也很勇敢，但都被洋人打垮啦！打倒帝国主义有那么容易？人家是傻瓜？你喊喊口号人家就吓跑了？这真是头脑发昏！真是享福享到人都傻了！这一次明白了些吗？发发传单，呼呼口号，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就被送到这里来啦，享福来啦！

“你们不是爱讲自由吗？就自由地把小便溺到裤子里吧！”

嗯！潮湿难受吗？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死都不怕，还怕潮湿难受？

“什么？要大便？大便和小便一样，就自由地拉到裤子里吧！你们不是要自由吗？现在你们就完全可以大小便自由，怕臭，死都不怕，还怕臭！”

“什么？怕臭了别人？没关系，我都不怕你臭，他们也不会怕；我不干涉你，他们也不会干涉你。你们尽可以大大地自由好了！你要一天拉二三四次大便、五六七次大便，可以举手赞成，但要我为你们开门到厕所去，那可办不到，你们吃喝这样好，多拉几次到裤子里，有什么不好！”

这样磨了半天之后，他才把那个背手枪的岗警叫过来，开了锁，并让他把人带到附近厕所里去大小便，每次两个，轮流去。等到把大小便问题解决以后，他又接着发表议论：

“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上山打游击去吧？可你们又不去，呆在上海穿着西服皮鞋，你那一套衣服，我两三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你还能穿草鞋上山打游击？你们呆在这里喊口号，那不是废话吗！帝国主义如果怕你们，早就溜走了，还敢在中国搞租界？”

“你们都是在大学里读洋书的人，会讲几句洋话，将来吃洋人的饭，过舒服日子，不是很好吗？还要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喊打倒帝国主义，虽然我吃洋饭吃得也很可怜，一个人支持一个四口之家，饿不算饿，饱又不算饱。而你们懂洋话，却会吃得很好。我说，你们的父母太好了，拿那么多钱供你们读书，你们却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是纸做的？还是把洋学堂读好，将来把身边的密斯娶去作老婆，过舒服日子，享受一辈子，不是很好”

吗？

“你们叫我什么‘班长，班长’，我能作你们的班长？你们懂洋话，穿洋服，吃洋大菜，走起路来皮鞋咯吱咯吱响；可我，是下等人，土包子，要是在外面你们能看得起我？

“我看你们是有福不知享，用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寿仙公吊颈嫌命长！我不懂洋话，不知这话应怎么说，你们会说，你们去说吧……现在到了这里呆上个把星期，尝尝打倒帝国主义的味道，以后出去看还有那么神气不！不论在大马路上，小马路上，我是认得你们的，可你们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什么班长，班长！你们是没有办法才叫我班长。”

这个人在他不说话的时候，就抽着旱烟管，半闭着眼睛，无精打采，从脸孔上看，像个快要死的人一样。看样子他大概原来也象是上海滩上的流氓，找这个职业来做也是为了寻碗饭吃。他的话我不可能记得很准确，但确实说得很刻薄。这是狱卒对我的第一次“训诫”，也是在向我们宣传他们的人生哲学。那意思也很明白：不要再打倒帝国主义了，那是打不倒的；最后他说，经过这场监狱生活，回去后应该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有福要知享！

由于在我们身上没找到共产党的证据，他们就问我传单是哪儿来的？我说是马路上人家给我的，我看了看就塞给别人，我不是发传单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考大学的，由于考期没到，先来补习英文。一个英国巡捕，看样子象个小官，走过来问我：你会讲几句英文吗？于是我就同他讲了几句“Good morning”之类。然后他说：“以后要规矩一点，遵守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我们是准许你们自由的。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客气的，把你们转送给你们的政府，是要杀头的！懂吗？”

“懂了！懂了！”

“好吧！放你们走吧，有人保你们走吧。”

这一次在里面只呆了四天的样子，身体倒没遭到什么伤害，只是听了些刻薄话，看了看这类人物的嘴脸，也算是一种经验吧！

1982年9月

落花生的品格

许地山先生生平散记

熊寒江

今年(1982年)是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凡是读过他写的《落花生》的人，都会喜爱这篇朴素无华，清新怡情的散文小品，对这位五四时代拓荒者之一，我国早期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产生由衷的敬爱。他具有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落花生》中写的：“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他主张不做“伟大体面”的人，要象落花生一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就是以自己一生四十九个春秋来身体力行的。

许地山原名赞堃，乳名叔丑，地山是他的号。1893年2月出生在台南府延平郡王祠侧的窳园里，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他的远祖许超，早在明代就从大陆渡海迁居台湾。父亲许南英居住台南，素好自称“台南南英”。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许南英任清朝驻台湾筹防局统领，扼守台南，激于民族大义，奋起抗日，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战争失利，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富有爱国思想的许南英，不愿做亡国奴，抛弃全部财产，带领一家

迁回大陆，在福建省龙溪县（即现今漳州市）落户。当时许地山年方三岁，因迁居途中，在轮船上爬攀绳索，不幸跌下，左臂脱臼，由于接骨不正，影响到后来左臂长期活动不自如。

1896年，四岁的许地山，在漳州入私塾，启蒙老师是吴献堂先生。第二年，因父亲出任广东知县，全家便迁居广州。到1905年，许地山入广东韶午讲习所肄业，隔年，进旅粤中学（原名随宦学堂）。四年后毕业，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广州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富有进步思想的许地山，毅然剪掉辮子，投身革命活动。

许地山兄弟们在少年时都爱好文艺，常写一些旧体诗词。许地山自己还喜爱音乐，善弹琵琶，能谱曲编词。他小时候虽然比较顽皮，但学习十分认真，兄弟间常常比赛成绩，往往一夜用功到天亮，不知疲倦。当清王朝濒临末日之时，许地山的二兄叔壬投身革命新军，三兄叔午东渡日本，在东京学习美术。父亲辞官后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携家迁回漳州。辛亥革命成功，许南英曾出任民国首任龙溪县知事。不久，他便辞官携带眷属退居海澄县海沧圩，住了几个月，旋又搬到集美作短暂居留。由于家庭贫困，许地山那年十九岁，就开始走上独自谋生的道路，他和从日本归来的三哥，一起在石码的眉麓小学当了几个月的教员。1912年，许家再迁居漳州后，许地山就在漳州的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许地山生活在福建，熟悉闽南的风土人情，他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闽南风物在他的心田里留下深深的印象，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留有鲜明的痕迹。他早在1912年任二师教员时，就写了一篇《荔枝谱》，文中提到“而蔡君谟（注：即蔡襄）《荔枝

谱》，自陈紫以下十二品，虎皮以下二十品，言荔子繁详，而不及漳之绿荷包”。可见他对漳州物产等十分熟稔。可惜此文未刊登出版，手稿散失。据查1942年编辑的《龙溪新志》初稿第一辑“轶闻”部分记载，许地山的《荔枝谱》“征引繁博，未见付梓”，这是十分可惜的。在这部新志的“文征（文）”部分，载有署名“龙溪许地山”所作的《春的林野》、《落花生》和《窥园先生（注：即许南英）诗传》三篇文章。他的名作《落花生》取材于闽南，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也多以闽南或广东、南洋为背景，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许地山曾于1913年一度去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1915年）12月，便又回到祖国，仍定居漳州，住在大岸顶，任华英中学教员。这时，他曾加入闽南伦敦教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但是，通过接触了解，他逐渐不满其教义，渐不信仰，开始萌长研究宗教的志向。这对他后来从事佛教、道教的研究、比较，以及译著宗教著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具有强烈求知欲的许地山，在1917年暑假辞去教职后，便到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读书。隔年，许家有二件事：一是年初他从北平回到漳州，与台中林季商（祖密）的妹妹林月森结婚；一是他的父亲许南英因欧战滞留南洋，病故于苏门答腊。

许地山在北平非常勤奋地读书和写作。卧室里堆满书籍，他自题室名为“面壁斋”。由于许地山常穿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蓄着山羊胡子，又爱写钟鼎文或梵文，因此同学多戏称他为“三怪”；也有称他为“莎士比亚”、“许真人”的，他都微笑以对。平日里，他能文善诗，谈笑自如，有时讲普通话，有时讲闽南话，有时又讲广州话，风趣横生，和藹

可亲，人多喜欢跟他接近。

1922年，许地山获得文学士、神学士学位。在燕大任教一年后，于1923年到1926年间，先后去美、英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和梵文。在此期间，他仍致力于新文学创作，《醜翻天女》等都是当时的作品。自1927年国外回来后，他就一直在母校燕大任教。至1935年间，因参加进步活动受迫害而被解聘，他便接受香港大学的招聘，毅然带着全家前往香港。从此，他在香港任教和写作，参加爱国进步活动达七年，直至1941年8月因心脏病猝然发作与世长辞。

许地山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情感。自他离开漳州，远在北平时，每逢假期，仍然常回漳州探亲。每次回来，总要遍访亲友，促膝叙谈，如若一次未得晤面，常常再次走访。同时每回都与留在漳州的老母、兄嫂、侄儿等合影留念。1920年10月，他曾回漳州接夫人林月森和长女许懋新去北平。不幸途经上海时，林月森忽得重疾，病故于沪。许地山最后一次回到漳州，是在1935年去香港之前，那时他生母已经去世，与兄嫂等人晤面话别。他是1929年经熊佛西、朱君允介绍，与周俟松在北平结婚的。1933年春，许地山曾偕同周俟松回过台湾一次，在台北、台中和台南住了十几天，探望久别的出生地和亲友们，看望白发苍苍的庶母，和前妻的哥哥林季商。他带去了他编纂的父亲许南英生前的诗集《窺园留草》，分赠给亲友，向当时还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亲朋介绍大陆情况，共叙怀念祖国之情，说明台湾是祖国的领土，终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亲人们则送给他一尊郑成功的雕像，寄托着盼望回归祖国的殷情。

许地山一生，正如他自己在散文集《空山灵雨》的“弁言”

中所说的：“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他的早期作品，留下有宗教的印记。自从抗日战争以后，他离开了经院派，走向人民的行列。他的后期作品，表现出坚实的现实主义。可是，正当作家向更高的台阶上升的时候，竟结束了生命。许地山在不到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许多作品，除小说、散文、诗歌外，还有剧本、翻译、中外民间故事和宗教著作，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瑰丽的财宝。

（原载福建省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五十年曲艺生活的回忆

张 寿 臣

我从七、八岁就跟父亲在北京作艺——说相声。初在天桥亮地（即摆摊），继在通州、唐山等地，最后在天津久住，有时也回返北京。屈指算来，光阴过得真快，到现在^①已五十多年了。中间经过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祖国解放各个时期。现在回忆起来，痛定思痛，真是一言难尽；只是在解放以后，我才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到无比的温暖。我愿把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如实地摆出来，聊作点滴的贡献。

一、 我的生活历程

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苦难中度过童年，在凌辱中度过中年，在幸福中安度晚年。

我 的 童 年

我家原籍是河北深县。祖父四十来岁时迁居北京，以作木工

^① 指本文的写作时间1985年。

为生。我父亲长大后，因木工活少，改学说书。后因他与焦德海、李德锡（艺名“万人迷”）等交好，又加入相声界。他二十五岁正式拜韩连玉为师，专业说书，开始在北京天桥摆摊。我六岁时入私塾，半日读书，半日跟父亲摆摊。因为那时有一种风气，有小孩在摊上帮说，人们觉得稚气可爱，往往多给一点钱。我父亲就利用这种心理，让我跟着多赚几个钱养家。可是父亲又不忍心耽误我上学，所以采取了这个兼顾的办法。我九岁那年（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官家取消相声，李德锡去保定，焦德海改说竹板书，我和父亲也都失业了。父亲只好再到街头巷尾去说零书（即小段子）让我正式上学。我十二岁那年，父亲死了，家中生活没了着落，我即在父亲旧日摆地摊处，说起相声来了。每日可赚三十到四十个铜子，全家只得喝稀粥，干的是不能吃的。第二年正月正式拜焦德海为师，跟他在天桥亮地。十五岁出师，仍与旧师友搭伙，在东安市场、护国寺等地摆摊说相声，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两位蒙师

但为时不久，我的身体突起变化，光长高不长粗，既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让人看起来很不顺眼，因此失了人缘，生意逐日下降，谁也不愿与我搭伙了。所以十六岁至十八岁这三年，只能自己单干，整日赚不上吃喝，陷全家于啼饥号寒的境地。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三年中懂得了不少道理，长了许多见识。这时我在东安市场已失掉独占一块固定场所的资格，只能在同行说完之后，借地卖艺，至多赚二、三十铜子。那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南下洼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贤祠”，里边正开

设着一个宣讲所。我每天回家路过那里，必进去听听。一来可以听关多福先生讲古文《豫让论》、蔡友梅先生讲小说《京华故事》等。二来也可借机喝点开水。日久天长，我的知识增多了。以后又借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自己看，兴趣就更大了。后来又订一份《白话时事报》，这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我和关、蔡两先生虽没有接谈过，但他们是我真正启蒙的老师。我在说相声时，常常把他们所讲的东西掺进去，听众很欢迎。

在“四海昇平”的时期

我十八岁那年春天，第一次离开北京，步行到通州、唐山等地，沿途落地卖艺，也勉强能顾住生活。后来到天津，就在三不管、北开等处亮地。十九岁回北京，仍在天桥、东安市场摆摊作艺。这一次因为我了解了一些乡村的事情，尝到了跑码头的甘苦。对人情世故较前练达了许多，也能说住人了。到夏天有件大褂可以上身，有时也能赶个堂会，生意逐渐好转。我二十二岁时，北京石头胡同“四海昇平”没有人上末场，我就和焦德海先生同去。后来我个人单上。演完后，每张票按价提取铜子两枚，每日就可得一百铜子左右。虽然必须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但全家老幼数口生活总算顾住了。更重要的一点，我得在这里提一下。那时“四海昇平”老板庄荫棠先生（刘宝全的鼓词，大部经过他修订）艺术精深，使我受益不少。他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东亚戏迷”。他不但能编，而且唱作俱佳，尤擅长二人连弹，为当时京华艺人所景仰。我很佩服他，时常向他请教。也可以这样说，我演出的东西，有十分之二、三的词，经庄先生改订过。

在天津站住了脚

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这段时间，我白天在天桥、东安市场作艺，晚上在“四海昇平”表演。到了二十六岁时，与李德锡先生合作并受业一年，在北京“大观楼”演出。其间去沈阳一次，继回天津“燕乐”，年底分开。直到二十七岁时，我才开始完全独立的演出，对于所学的东西又加以润色，在天津总算是站住了脚。自此以后，我就在天津各杂耍场，先后与陶湘如、侯一尘等各合作九年，与周蛤蟆合作一年，其余即个人单干。这一阶段，我人缘甚好，收入亦可自给；在相声界也有了一点虚名，应该说是我一生中较为顺利时期。但官府、流氓的欺凌勒索，亦随之加剧，仍然使我喘不过气来。

从改行说书到退休

1947年底，我改行说书（原因下文再说），演出场所在北门外宝和轩。先说《清宫秘史》，继说《水浒传》，前后共六年。

1953年孙书筠成立群声曲艺团，邀我参加，生意大旺。后来领导上知道我是说相声的，同年八、九月间，天津曲艺团骆玉笙邀我加入，乃又恢复我说相声的旧行当。1964年10月，我因年老多病，不能再坚持工作，经领导批准，遂即退休，这时我已经六十七岁了。

二、重重苦难话当年

在旧社会里，作艺人的苦难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回忆往事，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犯 讳 遭 打

我常听老一辈子的人说：咸丰年间，有人被叫在咸丰面前唱八角鼓。《万寿香》段子中有一句是：“手拿着一柱香儿来上寿”，被认为是犯了圣讳，发往云南充军十年。咸丰名“奕訢”，“一柱”与之谐音，故得罪。光绪年间说评书的王致元，曾在恭王府说《彭公案》，内中有一句带“疑心”二字，恭王认为与他的名字“奕訢”同音，即打骂轰出。袁世凯做总统时，李德锡到总统府说相声，内有“元宵”二字，被副官打了好几个嘴巴轰出。因“元宵”与“袁消”同音，认为是诽谤大总统。就我本人来说，民国十六年，我在北京三庆园和我老师焦德海合说相声，内中提到“黑狗白鼻子”字样，被警察打了一顿，立即带局。原来那时警察外号叫黑狗白鼻子，我们是无意中说的，他们却认为是对他们的讽刺。结果到局后，又打了我们无数嘴巴，罚洋十元轰出。经过这次毒打，我师徒二人三天没有上台。他们在背后还说，不给这些东西们点厉害的，怎么会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还有，唱太平歌词的王兆麟有一次表演《悻悻阵》段子，内中有一句“馅饼回营搬救兵”，被弹压戏场的宪兵用茶碗砍破了脑袋。甚至，那时卖馅饼的也不许喊馅饼，只能叫肉饼。因“馅饼”与“宪兵”同音之故。

在旧社会里艺人和穷人，人身是没有保障的，说话是没有自由的，随时都会出现无妄之灾。

恶霸和特务的暴行

民国二十七年，我在天津旧法租界小梨园和仁昌电台说相

声，生意相当不错，谁知又遭到恶霸袁文会的欺侮。那时南市“燕乐升平”由北京来了两个说相声的——戴少圃和于俊波，不知为什么他们得罪了恶霸袁文会，没有几天就被袁文会打跑了。这时袁的狗腿子李某来我家中，强迫我到“燕乐”补其缺。不容分说，立逼离家。到南市后，安置我在一旅馆中，每月仅给个人生活费少许，家中生活一概不管，并不准回家探亲。熬过了一年多，赶上民国二十八年天津闹大水，我才偷着钻电网回到了家中。举目一看，老幼缩卧床头，面有饥色。再一转视，家中什物、衣服当卖一空。不禁凄然者久之。

1940年，我在北京说相声。因为要钱时得罪了特务王某，当天他告诉内二区特务组向我和常连安要相声底稿，并传我们到局问话。我未去。第二天他又派人把我和常连安叫去。问了常连安一次，就放回了，可是不放我。接着晚上又过堂，他们问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总说不利皇军的段子。我说：“我们作艺的人只知道作艺吃饭，不懂什么叫共产党或国民党。”王某在旁大骂。又把我狠打了一顿。我说：“你们还让人说话吗？”坐在当中的一个人说：“可以。”我说：“你们打死我不要紧，可怜我一家数口就都得饿死。你们都是中国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他们大怒，让人把我按倒就用皮鞭打，不久我就昏迷过去了。后来，常连安托人花钱才把我保出。我经过这次折磨，几乎丧了命。半年多才复原。

敌伪强迫宣传

在日本强占天津时期，艺人的生活更是苦难重重的。有一次日本军队打到缅甸。当时日军强迫艺人在电台上替他们宣传，歌

颂皇军的英武。他们派我和侯宝林在北京天津两地，借电台传音说对口相声，内容是宣扬日军如何强大。事前侯宝林得到这个消息，当夜乘火车到北京和我商议，问我当如何应付。我说：“这好办，咱们给他来个一混二磨，三打岔，了事。”到了那一天，我们上台了。侯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今天是阴历几日，阳历几日，星期几，又加上许多俏皮话，就是不说是日军占领缅甸的日子。这么一来，时间到了，我们就下台鞠躬。伪电台人员责问我们。我们说，时间不够有什么办法？他们也就无可奈何。咳！关是过了。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比挨打还难受呀！

园主和流氓的剥削

在旧社会里，艺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一谈园主和流氓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在我年轻的时候，曲艺场有个害人的陋规，每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演完后即封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全体演员都白唱。第一天的收入，归前台经理所有；第二天的收入，归后台老板所有；第三天的收入，归三行掌柜所有。统名叫“抹台面”。正月初一那天演出后，园主每人给两角钱，用红纸包上，上写“黄金万两”四字，叫作“财神份”。就用这套把戏，把其余所赚的钱，完全独吞了。

在园子外面，也有抹台面之风。每年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本地大小流氓就要抓官差。他们佯为很客气地说是请帮忙，所得之款，统归流氓所有，艺人是不准拿分文的。倘不答应，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民国二十三年时，花四宝在天津“天晴茶社”作艺。因为误了给流氓请抹台面一次。一天下场后，路过东北角菜市，突然自附近胡同里走出一人，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上面

盖着一张报纸，向花四宝头部砍来。花急闪未击中，却落在她的身上。一看原来是一盆稀屎。这还是轻的，重的往往会乱抛砖瓦，打你个头破血流。

我个人虽没有受到过他们这种侮辱，但却受到他们无数次的金钱勒索。地面上大小流氓，不论是爹妈寿辰或是孩子生日娘满月，都要打艺人的主意。红帖飞来，就得拿钱。我每月接帖常达七、八份之多，数十元血汗之资，就化为乌有。接帖后，常是礼到人不到，这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因为你如果真的赴宴，当场就会接到更多的帖子，使你步入连锁式的陷阱。

改 行 说 书

至于我为什么又半路改业说书呢？我在这里也需要交代明白。日本占领天津后，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压迫，没有精神再说笑，当然生意也就随之下落。我留下胡子，打算绝迹舞台。但为生活所逼，有时也说一两场。不但听众觉着无兴趣，自己也感到索然无味。1945年日本投降，我又高兴起来，继续表演。谁知没有过了半年，国民党的老爷们胡作非为更使人伤心，于是我的情绪又低落了，感到前途没有一线光明。屋漏偏遭连夜雨，这年我又碰上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我在小梨园说了一段《山西家信》，其中有些是学山西方言的句子，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话。可是下台后，遇见一个蒋帮的山西籍军官，竟说我是侮辱山西人，举手就用皮带打人。打得我头破血流，还要带我去警察局打官司。我说：“你愿打就打吧，我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却被中国自己人打了。”后经观众劝开，那军人始扬长而去。伤愈后，一再寻思，这一行我决定不干了。从此，我即改行说书。

三、党给了我温暖

我今年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回想起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所受到的只有打骂、压迫、剥削和凌辱；名义上是一名艺人，实际上是受气鬼。解放了，我才翻了身。1950年，街道上送我到天津第三医院去戒烟，住院一个多月，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担负。我二十多年的烟瘾，得到根除，这是党第一次救了我的生命。1958年，我在天津总医院割胆结石，住院两月余，医药费用甚巨，全由政府负担，可以说党第二次又救了我的命。1964年，我退休了。政府发给我退休金，使我在衰病余年得以安心度日，一家七口，生活无忧。另外，党又安排我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我养病时，天津市文化局长还到医院来看我，安慰我。所有这一切，怎不让我感激涕零呢！最后我要强调地说：我是老了，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但我一定要教育我的三男二女，永远记住党的恩情，奋发图强，全心全意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1965年

相 声 的 起 源

张 寿 臣

所谓相声，最初就是摹仿各种声音，如摹仿人声、鸟声、兽声、风声、水声以及其他宇宙间各种声音等。我认为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学鸡叫以解其危，就是相声的先行者。厥后历代相传，能者辈出，渐形成一种艺术。比及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上《口技》一文中所写的表演者，已具有相声之雏形。再后表演者大部摹仿人声，又在其中掺上故事，于是相声艺术，乃告成功。现在舞台上的相声艺种，有单口、双口之分；后者较易，前者较难。

相声艺术，北京盛行较早，最初是设一布帐，一人坐于帐内，学兽叫、鸟叫以及各种单独的声音，听众在帐外围听。后来把它综合起来，掺进一个故事，成为较有系统的声音。这叫作“暗相声”。像当时一般流行的《醉鬼还家》、《五子闹学》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醉鬼还家》段子表演情况如下：忽听见帐内好像有一人在走动，接着打门声、开门声、小儿哭声、夫妻吵架声、摔碗声、鼾睡声，依次而至。听众捧腹大笑。再后，把帐子去掉，在地上摆一长桌，一人立于桌后，学各省方言以及各行各业的叫卖声。这就叫作“明相声”。

据我所知，咸丰年间，北京有一朱绍文先生（别号“穷不怕”），

是最早说明相声的人。他八十多岁时，我才十来岁，犹及见之。他原来是学京戏的，唱小花脸。后来因为照清朝规矩，不是天天能唱戏的，如斋日（祭天、祭地之日）、辰日（皇帝、皇后、太后之忌日），都必须停止动响器，当然更不能唱了。这些日子总算起来，每年多至五、六十天，各戏园就得一律停演。若再赶上所谓“国孝”（即皇帝、皇后、太后死了），便要规定二十七个月不准唱戏。我本人赶上过光绪、西太后的国孝，虽说是缩减了，但还须百日内不准动响器。百日后，不准化装唱戏，马鞭子只许用青、蓝、白三色，不准用红的。这么一来唱戏的就失业了。朱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拿白沙子撒地作字，以吸引观众。等到大家聚拢之后，他就在甬路旁边，手拿竹板（不禁止）两块作响器，唱几段小花脸数板，再说几段小故事，要钱。他还研究好了几个小段子，如：“悖悖名”、“百鸟名”、“百兽名”、“百虫名”、“青菜名”、“京戏名”等。另外，又自己编了五诉功——“胡不刺诉功”、“堆子兵诉功”、“棒子面诉功”、“夏布褂诉功”、“厨子诉功”；两本小书——《千字文》、《百家姓》等。这样他就绘声绘影地说起来了，很受群众欢迎。以后他又把京戏中《背娃入府》、《一匹布》、《打沙锅》等戏的内容，改编为小故事，在街头演唱，生意就更好了。于是每逢遇见辰、斋等日，他就以相声补缺，到咸丰国孝时，即正式以说相声为生了。国孝后，戏班再邀他去唱戏，均行谢绝。以后又带徒弟，即创出了这一行。

光绪 20 年，西太后六十寿辰。10 月 10 日那天，把北京城各行各业摊贩和一部分生意人，都集中于颐和园宫门外，开设临时摊子，供西太后观赏。朱先生也去了，被西太后封为八大怪之一。所谓八大怪，即：穷不怕朱绍文（说相声的），处妙高（学

各种唱腔),弦子李(一人班),赵瘸子(盘杠子的),傻王(大力士),万人迷(即李德锡之父,学唱二簧梆子的),胡胡周(学唱梆子的),楞李三(耍八大锤的)。由是名益著。

朱先生住护国寺并在该处设摊,恭王奕訢往游,见而奇之。审视地上沙字,真草隶篆俱备。恭王问:“你能撒多大字?”答曰:“小大由之。”恭王说:“你可到王府去,为我撒百尺见方大字一观。”先生答:“今日不成,明日再去,因为带的沙子少了。”第二天,朱先生背一口袋沙子到恭王府去。恭王命在花园院中撒一双钩“学”字,霎时立成。恭王在假山上遥观,结构风神俱佳。恭王大悦,当即拨给钱粮一份(即每月给三两银子,四季各给三石零三斗粮食),作为酬劳。后又在罗王府得到钱粮一份,算是当时艺人中最幸运的人了。

那末,为什么相声这一行会又在天津兴盛起来了呢?光绪初年,北京艺人玉二福因京城生意不好,只身来到天津,只说单口相声,颇负时誉。后来有人说,天津相声玉二福是开山人,这是对头的。另外,还有一段缘由,也应该提一提。光绪三十二年,北京禁止说相声。原因是:有一天肃亲王穿便衣到护国寺听相声,那一天朱先生未出场。有一说“暗相声”者借地搬演。一熟人见王,问何以有兴趣听此?王面红而去。盖“暗相声”有些低级趣味,当时自命为有身份者不听。过数日肃亲王接任了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在后门外帽儿胡同。一日,坐轿外出,前有仪仗,后有随骑,声势甚盛。后门为繁华之地,生意场子多摆于甬路两旁。王爷过来,书场、杂耍场都要停止。当时有一魏昆志者,在街上说单口相声,其词雅洁,听众最多。王在轿上问道:“这是干什么的?”随人答:“是说相声的。”王忽然想起数日

前在护国寺被窘事，立命轰走。看街的与魏有隙，遂大声喊道：“王爷有令，说相声的滚开！”魏站在桌子上大喊“冤枉！”王停轿询问。魏说：“说相声的也是人，为什么不准人说话？”王大怒，命人将魏按倒，打了四十鞭子，带枷游街示众三日。第二天，统领衙门通令全城，说相声的一律禁止。于是相声艺人只好改说评书糊口，北京相声由是衰落。直至光绪三十四年，肃亲王卸任后，始开禁。

不久，李德锡去保定，与张德全（艺名张麻子）搭夥来天津。起初，在西城根亮地，后在宝和轩、福来轩、昇平表演，时间很短就红了。北京相声到这时才算正式在天津盛行起来。李先生去世后，我接了他的班，继续在天津表演。以后我又教出一个徒弟叫常宝琨（艺名小蘑菇），活跃于天津各舞台，他对推动相声艺术，也算起了一定作用。

1965年

我的舞台生活（五）

——七年坐科生活（续完）

袁世海

三十七、演外串 顺利“夺鱼”

一天上午，我正在罩棚下吃饭，盛文哥端着饭碗从南屋走出来，到我身旁说：“你背背《浔阳楼》李逵的词儿，一会儿去演外串。”

“咱们到哪儿去演呢？”

“就你自己去给高大爷（指高庆奎先生）配戏。”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大班社串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只有已出科的师兄们才有资格呢，在科的学生只能演些《汾河湾》的薛丁山、《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二堂放子》的沉香、秋儿之类的娃娃生。其实，我并没听错，事情是这样的：平日与高先生配演此戏的马连昆师兄因事外出，而郝老师从不演这个角色，于是就到科班里来请人。科班中自刘连荣师兄随梅先生赴美后，此戏李逵这一角色一直由我来演，所以，师父决定让我去演这场外串。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师父、先生对我的信任，心中又惊又喜。但这回可不同于上次与马先生配演伊立，那是在马先生在科班演的堂会中串演，又有师父坐阵。这回是要我自己去大班社里串演，胡琴、场面(指锣鼓)等一切都是生疏的。高老先生演的这出戏，我是看过的，《李逵夺鱼》一场和我们科班演法出入较大，并且日场就要上演，说戏的时间有限，难处不小哇！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骆连翔师兄恳求师父不要派他去大班串演的情景。不久前，杨小楼先生主演《金钱豹》一剧，饰演孙悟空的迟月亭老先生年事已高，便来请年富力强的连翔师兄替演。师父满口答应，因为连翔师兄在科班演这出戏的孙悟空，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就是师兄弟们也都久看不厌。尤其是金钱豹与孙悟空交战，金钱豹三次投扔钢叉，连翔师兄(孙悟空)翻过“小翻堤”，接着摔“磕子”，同时接住扔来的钢叉，与饰演金钱豹的何连涛师兄配合得天衣无缝，表演极精采。

可是，连翔师兄在给杨小楼先生配演孙悟空时，这拿手的三次接叉却让人失望了。那天，我们在广和楼演出后，曾赶到华乐园看这场戏。第一次接叉，只见他刚翻过“小翻堤”，脚还未落地，叉已向他飞来，他来不及起“磕子”范儿，慌忙去接叉。说时迟，那时快，叉没接住，翻的“磕子”也如同旱地拔葱似地干摔、干落，重重地砸在台板上。观众哗然。我们真替他着急，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儿。第二次接叉，连翔师兄又接歪了。第三次才算勉强接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连翔师兄和少春们所演的，都是在悟空的“小翻堤”落地后，二人稍有停顿，对好目光取齐，然后再分别扔叉，起“磕子”范，二位前辈却是在悟空的“小翻堤”落地前，叉已准确扔出，待其双脚落地即连着起“磕子”范

儿，正好接着叉，“磕子”落地。这种技巧全靠心劲密切配合。

回科后，连翔师兄抱拳恳求师父：“您千万别再让我去大班串演这些戏了，给徒弟留命吧！”师父不解地问道：“你每次接叉都很保险，这次……？”“我不知道杨先生扔叉的范儿呀！他也没时间给我说，只问了我接叉时翻什么跟头就算对完了。大班演戏太难，全凭台上见，我算是明白‘搭班如投胎’这句话了……”。

我这次演出，也不知由谁扮演张顺，他若能给我说说戏，就保险多了！

盛文哥见我低头沉吟，似有难色，就鼓励我说：“李逵与张顺的戏最多，范宝亭先生扮演张顺，他为人挺热情，你可以请他给你说说戏，也没什么难的，不用害怕！”

听说是范先生演张顺，我放心多了。我对范先生并不生，他擅长摔打花脸兼武二花脸，乃著名的“三亭”中的“一亭”。（这“三亭”是迟月亭、范宝亭、何佩亭，均是著名的摔打花脸。）尤以甩发功见长，我拜许德义先生时，范先生与许先生同班，因此，我曾看过范先生与名武旦九阵风（饰陶三春）、王长林老先生（饰陶洪）合演的《打瓜园》，和他与朱桂芳先生合演的《演火棍》（《打焦赞》）。戏中的郑子明和焦赞别人演都是戴“发髻儿”，范先生却与众不同，他戴的是“甩发”、“耳毛子”和“葱瓜叶”。表演中“甩发”运用自如，与“耳毛子”、“葱瓜叶”互不干扰。摔“硬抢背”起来得麻利脆，“甩发”一丝不乱。他为杨小楼先生配演《恶虎村》的郝文，在夺刀开打一场，范先生的“甩发”左转右绕地飞舞，为武打增强了惊险气氛，观众无不齐声喝彩，我十分敬佩。在后台，我看许德义老师勾脸，也经常看范先生勾脸，我们虽没有过多的交谈，也是称呼过“先生”，见过面的。

中午，高老先生班社的管事陈信琴来社接我，我提着扮演李逵所需用的服装及靴包，随他到了华乐园。

我找到范宝亭先生，恭敬地行礼后，请他给我说戏。果然，范先生满口应承，戏说到一半儿我心里就直发凉。俗话说“十戏九不同”、“搭班如投胎”。同是《浔阳楼》中《李逵夺鱼》一段戏的台词，舞台调度、“插拳”变化很大，又很零碎，真不好记！全仗着那时年轻，接受能力强，平时戏听得比较多，脑子里都有印象，范先生只说一遍，我基本上都记住了。恰好压轴子是郝老师演头本、二本《忠孝全》，我哪儿舍得不看呢，赶快勾好脸，心中默背一次，估计问题不大，就站在下场门看戏。

在《浔阳楼》的演出中，我还算沉得住气吧！不慌、不乱，改动的地方没出什么差错。在我刚出场和唱完“垛板”后，竟有观众给我鼓了掌。戏演完了，我颇有石头落地的轻松感，这可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有了和范先生这次的交往，使我出科后得以跟范先生学了很多甩发功。

郝老师演《忠孝全》候场时，我找机会和他见了面。郝老师认出是我，挺高兴，还想要看看我的演出。可惜，中间隔着压轴的《坐楼杀惜》，时间较长，郝老师还有别的事情，不能久等，没能看我的演出。真遗憾！

三十八、为富社 侯老义演

富连成科班自1902年成立，到1932年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

有一位叫唐伯弢先生的文人，经常与肖老在后台聊天，唐先生

谈到科班成立将近三十周年应有所纪念的话题正触动了肖先生的心。肖先生和师父仔细斟酌后，决定出一本介绍富连成科班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册。唐伯弢先生主动承担执笔起草简介富连成科班的概况，书中需用的照片由设在琉璃厂的集萃照像馆负责。那里离科班很近，师父平素常与此照像馆的经理在一起打麻将牌，故一谈即妥。无奈出这本书的纸张、印刷、出版等一应费用，科班无力负担。最后，想到请已出科成名的师哥们为科班义演来筹经费。侯喜瑞大师兄义不容辞，在哈尔飞戏院（现西单剧场旧址）义演两场。其他师兄可曾义演，我记不得了。

第一场义演剧目是《丁甲山》，我站在下场门得以全神贯注地观摩学习了全剧，受益极多。

侯老年青时，身量并不魁梧，是中等个子，比较瘦，但扮演李逵之类的人物，分明又似一条大汉。原因是他用动作弥补了本身的不足，这就是艺术。看过演出后，我反复地琢磨了他“捋髯”等身段的特点，动作幅度大，舒展，优美，神气足。其中李逵接过家院送来的酒壶后，侯老演的身段是“踢腿”，“关门”，“插门”，“撕褶子”，“亮相”。较我们所学的“踢腿”，“插门”，左手反扬水袖搭头的动作的神情更饱满，非常符合李逵的粗、莽、勇的性格。待我再演《丁甲山》时，这些动作就全按侯老的演法，纠正过来了。

第二场义演剧目是《群英会》。侯老饰演黄盖。他当天还另在别的班社有演出，赶包应是来得及的，不想前场演出“马后”，而黄盖这个角色第一场就要上场“起霸”，他赶之不及，肖老十分着急，临时决定侯老换演曹操，可以开戏一个小时后再上场，我当即由曹操改演黄盖。我们科班和剧团不同，演出中现场有变

动，从不出牌告示观众。我饰演的黄盖刚要上场，观众仍以为是侯老，情绪极为高涨，碰头好也非常热烈，足见侯老当时声望之高。随后，观众们越看越觉此“黄盖”不像是侯老所演。“起霸”完毕，开口念白，观众才知道原来是我，台下虽有短促的议论，气氛尚好，我很顺利地演完了。下场后，苏雨卿先生对我讲：

“当时还真有点为你担心，观众们多花一倍的钱是为来听你师哥演的黄盖，忽然换了你演，若没些人缘，观众会起哄的，你还真压住了阵。”

侯老热情地为科班义演，我记得还有一次。那是广和楼改建后，侯老演第一场夜戏。

广和楼是个茶楼。富连成在此处演戏后，仍保留着原来的特点。戏园前面的一个长方形院子内设有：卤煮小肠、豆腐脑、爆肚、糖火烧等多种北京风味小吃。物美价廉，颇有小名气。四方来客往来不断。戏园内，大长桌子顺着舞台成行的摆放着，桌旁放着两大条长凳。观众们对面而坐，分别将头或左或右扭向舞台看戏，同时喝着茶水，吃着瓜子等零食。往茶壶添水时，观众自己前后传递。手巾把儿（供观众擦手、擦嘴的毛巾）从观众头上扔来扔去，满天飞舞。此时，戏院夜戏已很盛行，但广和楼历来只演日场。科班除每日在广和楼演日场外，每星期都要在哈尔飞戏院和吉祥园加演夜戏，营业也甚好。于是，广和楼主东王姓（号称白薯王）接受了肖先生的建议，改建广和楼。戏园内改换成一排排面向舞台的长椅（仍不对号入座）并开始上演夜戏。为了造声势，特请侯老助威，演出《法门寺》一剧。广和楼的老观众听说侯老回科班演出，都争先恐后地来看，场内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侯老扮演《法门寺》中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的太监刘瑾。他

身穿金地绣着黑龙的太监蟒，头戴荷叶盔，挂穗子耀眼夺目。他与郝老师演此角色时的服装和表演风格，各成一派。这对我很有启发，使我对刘瑾这个角色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我们每次看了他的表演都有很大收获。我至今对侯老的表演艺术都是很钦佩的。即便后来我正式拜了郝老师，也还是吸取了侯老的很多表演方法，得益非浅。

我记得改学花脸后，一次科班在什刹海富寿堂演堂会，侯老外串《青风寨》一剧，师父曾带我到侯老的化妆室，给我引见：

“这是你侯师哥！”又对侯老说：“这个孩子很有起色，你有功夫好好教教他！”是呀，我和侯老虽是一师之徒，但从艺术上来讲，侯老是我的老前辈，也是我学习的楷模之一。

三十九、济南行 垂闻逸传

山东省韩复榘的部下程希贤喜爱京剧，一九三三年将富连成约至济南演出。

演出在“进德会”的剧场里。“进德会”与北京的“城南游艺园”相似。里面种有花草树木，还喂养了一些动物供游人欣赏。天气虽寒冷，游人始终络绎不绝。我们每天都提前去剧场，顺便在里面游玩一番。比较吸引我们的是喂养老虎的地方，那里出售“非同寻常”的“长命锁”。看守老虎的人，手拿竹杆夹着这“长命锁”放在老虎嘴前，老虎听话地冲着锁吼叫一声，于是，锁就有了特殊“功能”，可与小儿镇惊压邪。价钱也不贵，一毛钱一个。看虎人不停地往老虎嘴前放锁，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吼叫，挺有意思。围观的人很多，买锁的人也很多，我和师兄弟们

都买了一、两个“长命锁”，准备携带回京馈赠亲友的小孩，这也算是此地的土特产吧！

那一年济南冬季奇寒。我们每天早晨在外边漱口，喷出的漱口水落地成冰；放在窗台上的磁铁牙缸转身就冻在窗台上了。我们住在一家本已关闭的货栈里，宋凤山先生（宋富亭师兄的父亲，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将我和一些所谓“能吃草的”——即能演主角的，安排在楼上住。其实和在楼下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都是睡在地上。屋里不生火，据说怕被煤气熏着。房间里到处都是冰冷冰冷的，师兄弟们相挨而睡，以取得一点热气。我的脚冻得很厉害。

提起冻脚来，话又长了。

当年的广和楼设备非常简陋。夏天，我们为了图凉快，将后台的窗户纸全撕掉。入冬后，西北风一刮，整个后山墙都透风，冷气逼人，我们都称广和楼为“五风楼”。直熬到数九，窗户才糊上纸，虽添了煤球火炉放在先生账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整个冬天的后台都是寒冷的。我每天在后台的活动量不大，除化妆外，不是在戏箱上静坐，就是站在那里“扒台帘”。天一冷，我的双脚就冻了。先红后肿，最厉害时，脚肿得很难蹬进厚底靴里去，我咬着牙，一闭眼，用手紧紧揪住长靴口，用力往里蹬，随着一阵钻心的疼痛，才算穿上厚底靴。过一会儿，两脚发木就不疼了，也不妨碍演出时在舞台上的蹦跳。可是演出后卸装脱靴这一关却使我发憷，忍痛将靴子脱下，那贴脚穿的大布袜早已被渗出的血水粘在脚上。再脱下大袜，脚后跟和脚小姆指也就露出了鲜肉。脚再伸到自己的那双冰冷的布袜、棉鞋里，疼痛的滋味真是难以形容。冻脚的病根一经留下，就年年如此。

这次到济南脚冻得比往年更厉害。每天难熬的疼痛真使我心烦。

令人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喝粥，就听宋凤山先生在楼下喊：“裘子电报！”盛戎放下碗，跑下楼去。我一碗粥没喝完，就传来他的哭声，我赶忙跑去看。原来是裘桂仙老先生病逝了，要盛戎速回京。盛戎哭得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先生和师兄们围在他身旁劝慰，我不知应该如何宽慰他，跑去将粥端来给盛戎喝，他哪里还有心思喝粥呢！连我也喝不下剩下的那半碗粥了。我似乎看到了裘老先生那宽宽的前额，清瘦的脸颊。老人家仿佛在慈祥地向我们微笑。似乎还听到了他那似沙非沙，苍劲、敦厚的嗓音，老人家又在给我们说戏呢……

小时候，母亲曾领着我去裘家的邻居串门，从此，结识了这位一代名净——裘老先生。入科前后我看了他不少戏，一直钦佩他的艺术。裘老先生也曾多次来科班义务教戏，我和他学了《铡美案》、《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锁五龙》、《洪洋洞》、《双包案》等戏。老先生回家后，还经常向母亲谈起我的学习情况，夸奖我聪明、肯用功。他对我母亲说：“在学《二进宫》中徐延昭‘怎比得’的唱腔（是裘老在当时创的最时髦的花脸腔）和《双包案》包公唱‘老夫的威名谁人不晓’的‘晓’字等较难学的三宕头唱腔时，他都是很快就学会了。”并说：“这孩子挺有出息，您熬着吧，将来有福享！”母亲也拜托他老人家多多费心。所以裘老对我还是很负责的。后来我之所以能将郝老师“架子花脸必须铜锤唱”的教导付诸实践，并收到成效，多亏了当年裘老先生的教导！

看着盛戎悲痛万分的情景，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感，眼

泪夺眶而出。

盛戎没能马上回家。他在主要上演的剧目《大破铜网阵》中饰襄阳王，戏的份量很重，大家都扮演着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替演，科班只得给他家复电，待演出结束后返京。

十几天后，即将离开济南的时候，我们为省政府演堂会，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场堂会对科班来讲，不是一般性质的演出。从师父到各位先生都格外提神。戏定为晚八点开演，师父和肖先生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早早来到后台督阵，唯恐出什么差错。突然有人传达，要将演出提前一小时，改为七点开演，师父当即应诺，低头看表已六点多，所剩时间不多了。“快去看看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先生们应声而去。一会儿，向师父汇报：“六立（盛藻）还没来！”压轴子是盛藻哥的《打鱼杀家》，他没来怎么成？师父很沉得住气：“六立没来，就把《雁翎甲》和《杀家》换换，让《杀家》压轴子。”可巧，主演《雁翎甲》的叶盛章师兄也没来，师父听说他们几个人去逛大街，脸一下就沉下来，怒骂“混蛋！”后台的气氛骤然急变，先生们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看着，师父不停地来回走圈，一言不发。我们都在暗暗猜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下意识地觉得有些自危。

十几分钟后，“他们来了！”这一声高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大家齐朝后台门口望去，盛藻、盛章、盛兰兴高采烈地走进后台。原来省政府在比较繁华的市中心，他们三人的剧目都靠后，迟来些再化装也误不了场，便相约去浏览市容。估计时间差不多，才珊珊而来。他们满面春风地叫了声师父，转身要去化装。

“过来！哪儿去了？”师父怒拍桌案，厉声斥问，使他们莫

名其妙。

盛藻哥懵懂地回答：“我们去大街转了转。”

师父又高声大喊：“我不到六点就来到后台，你们竟敢去踹大街！”说着抡起胳膊怒不可遏地照着盛章师兄的脸打去，啪的一记耳光，使盛章师兄红了半边脸。

肖先生、宋先生赶忙过来拉住劝阻：“他们没误场就算了……”

“咱们从来就没这个规矩，这么要紧的堂会，敢去踹大街！”师父满面通红，浑身发抖地骂个不休。

过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下来，大家无精打采地分头准备演出。

戏没演多一会儿，就听肖先生说，师父心里不好受、头昏，送回了住所。这更加重了大家的沉闷心情。这天的戏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第二天，请医生给师父看病。经检查师父患的是脑溢血症，立即送回北京治疗。

大家心里都压上了一块石头。师兄弟们攒三聚五地悄悄议论“《打鱼杀家》在前边，要说误场首先是盛藻先误了，师父却打了盛章！”……

接连发生两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心情很压抑。

济南之行，就这样地结束了。

四十、闹分裂 矛盾四起

返京后，在广和楼上演夜戏，营业依旧极好。《除三害》、《白马坡》、《北侠传》等戏一直受到观众的欢迎。我和盛藻哥酝酿

着要排《温酒斩华雄》一剧。戏从曹操献刀、刺董卓、捉曹、放曹演到关公温酒斩华雄止。安排好由盛藻饰演前陈宫、后刘备，杨盛春饰演华雄，还是由我饰演曹操，贯盛习饰演关羽。演员搭配齐整。我将本子归总改好，到盛藻哥家中将剧本和设想方案说给他听，他听后非常高兴。我胸有成竹地预想着演出结果定会获得全胜。就在我跃跃欲试着手排练的当口，盛藻经蔡荣贵先生介绍，离开富连成，应了上海之约，同行的还有连平师兄以及杨盛春、刘盛莲、陈盛芬、贯盛习等已出科的师兄共约三十多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故呢？虽然师兄们毕业后在科内演出一个阶段，就走向社会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象这样大批的人离去，主要还是师父不能躬亲其事所致。

自从师父在济南患了脑溢血症后，回京几经名医针灸调治，逐渐好转，但却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身心大受亏损，行动迟缓，不经常来社。即便勉强支持来社，也只是看看，坐一会儿，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对科班进行精心管理。群龙无首，师兄弟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暴露，逐渐激化，以致出现这种分裂的局面。我们要排的《温酒斩华雄》一剧夭折了，我很不甘心，恨不能随他们前去，同排此剧。怎奈我还差一年多才满科，赴上海是不可能的。只好留下，将剧本给了盛藻哥。他们有意排此剧，剧中曹操无人演怎么办呢？（盛戎也还有一年才出科）恰好王泉奎初上舞台，嗓子也很好，经人推荐，便让其将名字改为王盛奎（上海约的是富连成科班出科的学生），同去上海饰演曹操。他们在上海排演此剧，果然效果甚佳，并红了“关羽”——贯盛习师兄。

过了没多久，马连良先生又将叶盛兰、叶盛章两兄弟约到上海演出。肖先生也与梅先生在上海演出。这样一来，科班中有影响，

能叫座的师兄们基本上都走了。余下一部分没出科的小“盛”字科师兄盛戎、盛利、胡盛岩等人和“世”字科的师弟们，这些人中，有的正在倒仓，有的年龄太小，生、旦、净、丑各行人员搭配不齐，能挑梁唱的老生尤缺。沙世鑫在倒仓，一度培养的曹世嘉，刚演了一出《法门寺》，也倒了仓。余下的迟世恭、余世龙、刘世勋还小，科班中很多戏无法再演。

我除几出单头戏外，也无什么可演，甚有孤掌难鸣之感，只能和毛世来演演《浣花溪》的杨子林、《破洪州》的白天佐等角色。为了弥补不足，我利用演《取金陵》的基础，丰富了白天佐这个人物的开打，什么“大刀下场”、“三低面”都用上了。在穆桂英要临产退入城内，白天佐围城时，我选用了蹉步亮相，还编了骂城的一段“流水”板，舞台效果不错。当时的鼓师白登云大哥（他除在程砚秋先生班打鼓外，为了多实践，戏路的面宽些，也兼在富连成打鼓，既为练功，又帮助富社鼓师提高水平）对我说：“兄弟！我可没见过你这种演法的白天佐！真是好样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盛戎合演了《闹江州》。他饰李逵，我饰李鬼，但单靠花脸这一行当，无力支撑班社，起不了太大作用。我和盛戎也无能为力。眼看富社上演剧目的艺术水平比以前下降了，上座率一落千丈。能坐一千来人的广和楼，每天只卖得二、三百个座，最差时几乎才百八十个。广和楼前台大总管张广英进了后台就向苏先生一摊手，示意卖座不好。由此可见，在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和不讲自觉性的旧时代，师父在科班中严格管理，对犯错误的师兄责罚不贷，一声咳嗽就能使整个富连成鸦雀无声，具有那样的威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必要的。在济南，师父盛怒之下，责打己子，宽待他人，不仅体现了他的美德，也体现了他维护他

所创办的事业的一番苦心。

四十一、挽衰局 初见成效

面对科班的青黄不接的局面，大家的心情都很焦虑。

此时，李世芳、毛世来舞台上的表演进步很快，扮相、嗓音都很好，有潜力可挖。经多日的思索，想到若能排几出质量好些的旦角戏，可能会有些转机。又想起前一度盛兰经常去张彩林老先生家学些小生戏，很不错。张彩林老先生的艺术很精湛，旦行、小生是全能。荀慧生、雪艳琴（黄咏霓）二位名家也都是他的学生。老先生教戏认真，待人热情，很是可亲。于是和盛利哥商量，是否能请他父亲——张彩林先生给世芳等排几出质量高的大戏，重创局面。张老先生慨然应允。经科班同意，订下给世芳排《花田错》，穿插着给世来排《悦来店》、《十三妹》和《虹霓关》。

老先生教得非常仔细，如：丫环春兰和小姐赶制绣花鞋一场，春兰捻麻绳、穿针、纳底、扎手等表演，手势、眼神和音乐节奏配合协调，动作逼真，细腻传神。我在旁先是入神地看着，随后心悦诚服地也跟着学了起来。

《悦来店》中十三妹发现二驴夫不是好人，念到“我不免紧紧地赶上前去便了！”的台词时，从“紧紧”开始，都念在“大大八 仓 仓 另仓”的“软夺头”里，同时完成用马鞭打里踢右脚，里踢左脚，外踢右脚，外踢左脚，垫步转身，小蹦子，勒缰绳，亮相等一连串动作，真是干净、利落、漂亮。且将十三妹的急切心情，体现无遗。

《花田错》这出戏，李世芳扮演丫环春兰，江世玉饰卞济，

我扮演鲁智深，盛戎也没什么戏演，他主动饰演周通，并说，洞房一场准让它热闹。他这个周通演得可称“官中活，私房唱”，也就是说，演一般的配角，用不一般的表演，获得特好的效果。盛戎演的周通在台上一句念白、一句引子、一句散板就能唱得开花（得到掌声）。给这出《花田错》增加了不少色彩。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演出此戏时，嘻闹了“洞房”。盛戎在后台和我约好，洞房一场，当周通要“新娘子”（鲁智深假扮的）与他安歇时，鲁智深借机要戏周通，向周提出要先打三拳、亲一亲的条件。盛戎要我只念打三拳，余下念白留给他周通。仓促间，我也没来得及多想他那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就被挽入了“洞房”，演到此处，我提出要打三拳，不料盛戎竟接念：“打三拳成，可是咱们还得Kiss！”这个词，我听不懂，脱口问他：“什么叫开斯？”“Kiss就是接吻！”“哟！你怎么连洋文也上来啦！”台下观众大笑不止。

过去在舞台上即兴抓哏、逗趣，插科打诨的风气颇盛行。就是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也会让其他演员在台上抓了哏。有一次高庆奎先生和郝老师合演双出，前演《托兆碰碑》，高先生饰老令公杨继业，郝老师饰杨七郎。后一出演《法门寺》《大审》。高先生饰郡郿县令，郝老师饰刘瑾。在贾桂请刘瑾封赏郡郿县令时，刘瑾念白：“还没奏明皇上哪！”本应贾桂念：“干嘛还奏明皇上啊！您说了就行啦！您就封吧！”饰演贾桂的慈瑞泉先生（慈少泉之父）却当即抓了现哏，他将二位在《碰碑》中饰演的父子关系，给拉到《法门寺》一剧中来了，说：“嗐！谁叫你是杨七郎，他是老令公呢，您就封吧！”闹得台下捧腹大笑。但也有因一句抓现哏、惹出大祸的。我曾听肖先生和郭春山先生聊天时提起过某前辈名

丑也是饰演《法门寺》中贾桂，也是刘瑾念，“还没奏明皇上哪”以后，他影射现实地说到：“唉！如今哪儿还有皇上啊！他们早靠边了，你就封吧！”台下笑声连片，但突然从楼上包厢飞来一个茶杯，全场大乱，那时，正是民国初期，皇上名义没有了，但仍有权势，包厢里一位王爷听了这句台词，哪里容得，大骂不止，戏无法再演。这位老先生当即到前台向那位王爷请安赔罪。还险些吃了官司，后又费好一番周折，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再说《花田错》、《悦来店》等戏的演出效果，诚然比前一段有所提高，上座率遂见好转。李世芳的扮相雍容大方，表情自如，嗓音甜美，很受观众赞赏，他的才华已脱颖而出，前途大有希望。演出时，张彩林老先生看后夸赞他：“扮相真有点像嘛——梅先生。”最初，我们只当是一般夸奖，也没太注意，过后仔细一想，这才排出了当时轰动京剧界的《霸王别姬》，使富连成科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

四十二、演《别姬》 轰动一时

李世芳师弟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李子健是山西梆子著名旦角，艺名牡丹红。母亲李翠芳也是山西梆子旦角演员。世芳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八岁入科学艺，聪明、伶俐，很受师父和肖先生等的喜爱。先后学演过《六月雪》、《樊江关》、《拾玉镯》等戏，很有人缘。自排演《花田错》，张彩林先生夸奖后，我们仔细地观察，世芳不仅容貌，就是身段、嗓音也真有点像青年时代的梅先生。我们就想给他排几出梅派戏，以便更能施展他的才华、特色。有的人主张排《西施》，有的人主张排《太真外传》，我想到

《霸王别姬》一剧。这个戏，我既可帮他排，又可以帮他演。我将此想法和张彩林老先生一讲，他很支持。当时科班刚将叶龙章大哥从东北唤回，一应事务仍由二哥叶荫章支撑。他也同意我们的想法，决定排《霸王别姬》一剧。世芳演虞姬，我饰项羽，盛利饰李佐车，于世龙、迟世恭、刘世勋等饰韩信，李世璋、沙世鑫饰张良和陈平。并将排演《别姬》的重任——“导演”委派给我。

从此，我和盛利带着世芳天天到张彩林先生家去学习。老本子的《别姬》中虞姬在听到兄弟虞子期报信说霸王不听劝阻，要出兵与刘邦交战，有一段“二簧慢板”，其中还有个三跌宕的行腔，我帮着世芳学、记。回科班后除帮他加工，还要给琴师张老九说腔。世芳很聪明，念白、唱腔很快就都学会了。待学舞剑时，因张彩林老先生年事已高，只能说而不能示范，只好请张老先生口述要领，我按此做动作，世芳照看我示范的样子学，我再反过来给他纠正动作。并根据张老先生所教，进一步要求他舞剑和抖袖等动作的手、眼、身、法、步的配合运用。特别强调舞剑时，眼睛要看准剑尖，跟着剑的舞动而转动，才能使舞姿优美而传神，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帮世芳一次次练这套剑舞时，我感到“二六”唱段：“富贵穷通一刹那”的舞剑动作若能再花一点就更好了。前边的四句唱，正好在舞台的四个角的部位亮相（俗称四门斗）。于是在这一句就编了“左涮剑”、“右涮剑”往前趋步，缓剑后退到中场成“金鸡独立”，直到蹲下的姿势，这个动作很新颖、别致。后来居然受到梅先生赏识，被承认了。

在帮助世芳提高艺术表演的同时，我也在抓紧一切时机为演项羽做好充分准备工作。杨小楼先生对于项羽这个人物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我反复听、学科班不惜重金购买的长城公司录

制的梅、杨二位先生合演《别姬》的选段、选场的唱片。唱片共六张、十二面，我从中学了杨小楼先生的唱法和念法，再用花脸的声色来体现，并结合其唱念，搜寻、回忆以前看梅、杨二位先生合演此剧时所留在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动作特点。同时，我认为项羽虽未最后统一中原，但也号称“西楚霸王”，动作应相当稳重而又有气魄，所以，我又适当吸取了周信芳先生演关羽时的一些动作。如：在舞台上不到关键时刻不睁大眼睛，出场时抓袖子亮相等等也都融会到项羽的表演之中。

合排日子到了。晚饭后，师兄弟们主动地集中到单棚下等候排戏。盛利哥拿着总讲本子，耿世忠提前贴出各场出场人员名单。这时，大家都有同舟共济之感。排好《别姬》，重振旗鼓，已成为在社的全体师兄弟们的行动指南。大家齐心协力地奋斗，就连演“龙套”、兵将的师弟子们在排练中也都异常精神。人人服从指挥，整个排练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我按照张老先生的要求，继续给世芳在表演上加工，还要给韩信、张良及所有的配角说戏，给文武场提要求，指出不足之处。叶荫章二哥亲自司鼓督阵，盛利哥全力相帮，再有张彩林老先生“遥控”，大家密切配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虞姬、霸王、霸王兵将的服装都是各有特点，需要新定制。在紧张的排练之余，我还要挤出时间去珠市口草市里九春戏衣庄。虞姬的服装完全仿照梅先生所用的样式，根据情况适当做了些小改动。像虞姬穿鱼鳞甲上原是大红穗子，我觉得太耀眼，改用桃红穗。杨先生饰霸王穿鹅黄蟒，我们没条件，只定制了一件平金黑蟒，在黑靠上面也和兵士们所做的铆钉甲一样，镶上亮铆钉。此外，还定制了霸王专用的大枪，枪头上画龙，加大的霸

王鞭，上面系着鹅黄彩绸，以前只有关公的马鞭才系绸子。又到大李纱帽胡同的靴子高（戏靴店）特制一双黑色虎头靴和虞姬穿的彩鞋，彩鞋穗子也由大红改为桃红。虎头靴在南方较流行，北方称其为“海派”。我当时不管它是“山派”还是“海派”，只要看着好就先学过来。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渐地鉴别，学对了的一直用到如今，像黑马鞭上系彩球等。也有的学得不太合适，自然就改了。如：“靠”上镶的铆钉，看上去亮闪闪地挺好看，可是铆钉都是用线缝上的，霸王不同于兵士站在那里不动，霸王动作多，还要开打，线缝的铆钉经不住互相摩擦，才演几场铆钉就掉许多，最后只好统统取消。虎头靴因与人物不太协调，也不用了。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从虎坊桥（科班地址）步行到珠市口的路上，就是我背台词的好时候。我将原剧中霸王劝虞姬在他败后可去投靠刘邦的念白删去，就是在这路上想“明白”的。原词是这样：

霸王：孤此番出战，若不轻骑简从，焉能闯出重围？看来，不能与妃子同行这、这……便怎么处？……呜，有了！那刘邦与孤虽是仇敌，乃系旧友，不如你随了他去，免孤挂念也！

虞姬：大王啊！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岂嫁二夫，大王今图大业，岂肯顾一妇人？也罢！愿借大王腰中宝剑，自刎于军前，喂呀……以报深恩！

我反复地咀嚼这段台词，觉得这霸王只顾自己，无情无义，虞姬颇有霸王让其改嫁而走头无路才自尽身亡的味道。我认为像霸王这样血气方刚的大丈夫虽然刚愎自用，不纳忠言，以致失败，但焉肯让自己的爱姬去投靠自己的敌人呢？回社后，与盛利

哥谈了想法，他转告了张老先生，张老先生也认为我说得有理，便将项羽这段念白删去，强调了虞姬、项羽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经过几个月的齐心努力，《别姬》一剧，首演于广和楼。

往常科班在广和楼演出，从不贴海报，也不挂戏牌子。剧场里上演什么戏，剧场外只需放件有象征性的道具，熟观众一看就能明白。比如外面放一把大石锁，就是说里面上演《艳阳楼》；若放几对锤，就代表演《八大锤》；若放一把青龙刀，肯定上演关公戏。也有一些人，从后台搞出第二天上演的剧目单，给一些戏迷们透露消息，借此赚钱。

首演《别姬》，我建议要贴海报，科班没有木戏牌，就在一张大纸上写：“今日上演《霸王别姬》，李世芳饰演虞姬，袁世海饰演霸王。”贴在广和楼门口。《别姬》一剧是科班没演过的戏，比较容易吸引观众，再一贴出海报，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广和楼终于又恢复了热闹的局面。长凳上互相拥挤着坐了最多的人，两边的廊子、中间的过道都加满了凳子，三面的墙根也都站满了人。

我出场时，观众热烈的气氛就别提了：兵将一“站门”就掌声四起。起“四击头”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在震耳的南堂鼓和热烈的掌声中上场了。这南堂鼓在以前的演出中，只有舞剑奏“夜深沉”的曲牌时才用，我为了造气氛，在我发点出场和后面开打都添用了。这清脆的鼓声，还真为我这个“霸王”壮了声势，长了威风。我亮相后刚一抬腿往前走，观众中又响起了一片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我不禁有些茫然，难道我出了什么差错啦？稍定神才明白，原来观众给我新制的虎头靴也来了“碰头好”，表示支持我们科班里的新生事物呀！世芳的演出更受到极

热烈的欢迎，“二簧慢板”、“南梆子”、“二六”等唱段和舞剑的姿势、剑花都赢得了掌声和喝彩声。整个广和楼自始至终处于热烈、欢腾之中。

演出的成功，再加上报刊的赞扬，富连成声势大振，实是令人兴奋。梅先生的好友齐如山先生闻讯而来，观剧后欣喜地到后台对肖老夸奖说：“世芳很像梅先生青少年时的模样，身段、动作、嗓音也极像！”从此，报上就出现了“小梅兰芳”的美誉，我也被赞为“花脸杨派霸王”。我们风借火的威，火借风的势，轰动了当时的京剧界。

就在这时候，我们结识了一个由初中和高中学生组织的“韵石社”。他们之中有十几个人经常到广和楼后台和我们交谈。我们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很快就熟识了。“韵石社”还开辟了专刊，刊登富连成已出科和未出科的学生演出的剧目、评论和后台“花絮”等。除为富连成做了极好的义务宣传外，在交谈中也给我们灌输了一些文化知识。记得有一位学生对我讲：“楚汉相争，鸿沟割地。刘邦占西，楚占东，你们台词上念得却是：汉占东来，孤霸西，不太对吧？”我那时文化知识太少，又不懂查查书，所以没敢改动，直到以后方知确是错了，才加以纠正。不知“韵石社”的朋友们是否还有人健在？我们若能再见见面多好啊！（我和戏剧家吴祖光同志也是此时结识的。）

《别姬》每天演出日夜两场，卖座经久不衰，场场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日场未散，夜场看戏的人已将戏园门及门前街道堵塞了，形成了出不去，进不来，难以疏散的场面。由于《别姬》一剧的影响，科班上演的别的剧目的上座率也大大好转了。

尚小云先生从上海演出回京了，齐如山先生急切地约了尚先

生来看富连成的戏，向他介绍了富连成当时的情况和这个“小梅兰芳”。尚先生看戏后，赞不绝口：“这些孩子们有出息，都是些好材料！”他为人极其热情，曾亲自给把场子，在舞剑时，亲自登场打“南堂鼓”，这可说是太罕见了。观众为此都狂热到极点，掌声、喝彩声，压过了舞台上的音乐声响。

四十三、紧排戏 富社振兴

尚先生在看《霸王别姬》的演出之前，和富连成科班就已有了交往。盛藻师兄赴上海后，叶盛兰师兄曾一度改演旦行，演出了《花木兰》、《南界关》等剧，并请尚先生给排演了《秦良玉》。尚先生一直对富社有着好感。这次观看了《别姬》一剧后，他主动地热情相助，帮我们连排了几出戏。那时，时近旧历七月，科班内在赶排七月初七的新戏《天河配》，尚先生亲临指导。演出时海报上写出尚小云先生亲授，真是锦上添花。《天河配》一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尚先生正式给我们排的第一出戏是《昆仑剑侠传》，他演此戏时剧名是《红绡》或《青门盗绡》。剧情是写一位姓昆仑的侠客隐身某府当管家。府中公子在给大将郭子仪祝寿的寿宴上，看上了郭府中的歌姬红绡，红绡也属意于公子，于是以手势相约三天后见面。公子回府解不开手势之谜，忧思成病。昆仑奴问明情由，解开手势谜，深夜入府，将红绡背出，成其二人的婚姻。后郭闻之，与昆仑奴相见，欲留，同保大唐，昆仑奴不肯为官，要回山修道。临别之际，公子、红绡设宴饯行，红绡又舞双剑以助雅兴。全剧载歌载舞，虽是一出旦角为主的戏，但花脸占了很重要

的地位。尚先生看到我当时在科班中的具体情况，丰富了昆仑奴的唱、作、念、舞，遂将戏名改为《昆仑剑侠传》。李世芳扮演红绡，叶盛长（师父的第五子）扮演公子。迟世恭、沙世鑫扮演郭子仪。我扮演昆仑奴。此角色揉黑脸、粘眉毛、虬髯。当年在化妆粘虬髯时，需在脸上涂胶水，再用剪碎的黑绒线往上粘，方法十分落后。

我演此戏的效果极佳。在我饰演的昆仑奴进府盗绡，打死相府护院犬，踢倒二更夫窜上围墙（桌子）时，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接唱“胆大的二更夫还敢逞能！”再亮相。前后总要四次“满堂彩”，才将我送下场去。这也是郝寿臣老师和侯老二位前辈在社会上创出了良好的局面，我才能在科班中受到如此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

紧接着，尚先生又给我们排演了《娟娟》。此剧由河北梆子《马武下山玉虎坠》移植而来。由毛世来饰娟娟，李世芳饰冯伏氏，肖盛萱（肖长华先生之子）饰娟娟父王腾，我饰马武，叶盛章师兄从上海演出回来参加助演，饰禁卒。

第三出戏给我们排的是《金瓶女》即梆子戏《佛门点元》。李世芳饰演金瓶女，叶盛长饰金钱元，我饰假扮和尚的强盗。

这些剧目的接连上演，都获得观众的赏识和欢迎，大大壮了富社的声势。较前“盛”字辈的演出盛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龙章大哥回京后，在科班已熟悉了一个阶段，决定举行正式接任富连成科班的社长职务的仪式。所有“世”字科的学生均改字据，为龙章大哥的徒弟，因我原是“盛”字科，且又只一个月左右就要结业出科，肖老提议我不应再改字据，便以师弟名义参

加了祝贺。

四十四、阖家喜 结业出科

七载光阴如白驹过隙。想当初，母亲乍听我要坐科七年，觉得时间是那样的漫长。她一年一年地盼着，一个月一个月地数着，一天一天地想着。我结业出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母亲的心哪，该有多么高兴！我在科班里就仿佛听到了母亲那欢快跳动的心声。

为了我的出科，妈妈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忙碌起来。她借来一笔数目较多的钱——她想着我出科就能挣钱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借，所以妈妈笑着将钱借来，人家也是笑着将钱借给她的。母亲还将院里空着的三间南房租了过来……

1935年农历腊月初五，我七年坐科期满结业。早晨，我按惯例首先给祖师爷神像上香叩头。再请肖先生上坐，磕头行礼。然后又去师父家中，给师父、师娘行谢师礼。就算办完了手续。

午饭后，照常去剧场演出，那天演的是《娟娟》。

腊月天黑得特别早，《娟娟》演完，天已擦黑。我想母亲此时盼我回家的心情会有多急切呀！我匆匆卸了妆，跑着回家了。哥哥、姐姐们轮流在门口张望，探听着我的消息。有了他们这几位“情报员”，待我走到门口时，不用说妈妈，就是隔壁西屋的李大妈，以及张六叔、张六婶、还有住临街铺面房开小杂货铺的李大伯，都在门口列队欢迎。

大家欢欢喜喜地将我送进南屋。原本破旧的南屋，现在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贴南墙放着一张新添的绿色单人床。中间的四方

桌上摆好了碗、筷，窗户上刚糊过的高丽纸，白花花的，将屋里映衬得分外明亮。

妈妈、哥哥、姐姐们和我团团围坐在桌旁。我尝一块香喷喷的炖肉，吃一口凉丝丝的豆酱，喝一碗热乎乎的“鱼钻沙”。心里感到甜滋滋、暖烘烘的。

饭后，妈妈将给我新添制的衣服拿出来，衬衣、衬裤、棉袍等，从里到外整套全新，还有一双在观音寺内丰泰隆鞋店买的上海时髦的呢子面棉鞋。我一件件穿上试试，很合身。妈妈看着我穿上这套新衣的精神劲儿，高兴极了，坚持着不让我脱下来，我可舍不得！还是脱下来，待需要时再穿。

夜深了，邻居早就走了，哥哥和姐姐们都睡了，我们母子俩坐在那张单人绿木板床上，谈着眼下的打算，将来的生活，我还将尚先生约我到他班社演出的大喜讯告诉了妈妈（已接了排《汉明妃》的剧本，我饰演毛延寿，春节前要演出）。妈妈一直在笑，笑得那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我仿佛看到妈妈的心也在笑，笑着飞向美好的未来。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妈妈含辛茹苦，熬过了十五个秋冬，才算有些盼头，怎能不笑呢！

可是，步入社会意味着踏上了一条更加坎坷的道路。美好的理想要变成现实，还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才行啊！

（袁菁整理）